



ISBN 7-5602-1948-9



9 787560 219486 >

ISBN 7-5602-1948-9

D·100 定价: 12.00 元

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

东北师大博士生导师  
文库

30年代

# 朝鲜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东北

李鸿文 著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D331.253/001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李鸿文 1930 年生，黑龙江牡丹江人。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出版的著作有《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研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略》、《现代东北史》(合著)、《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合著)、《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合著)等，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论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东北地区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述略》、《东北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概述》、《论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前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战争》等。





(吉) 新登字 12 号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库

30 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

30 NIANDAI CHAOXIAN GONGCHANZHUYIZHE ZAI ZHONGGUO DONGBEI

李 鸿 文 著

责任编辑：侯文富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王 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8.5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5 千

印数：001—500 册

ISBN 7 - 5602 - 1948 - 9/D • 100

定价：12.00 元





#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一、朝鲜人迁居中国东北概况 .....                         | 5  |
| 二、朝鲜共产党被解散及其满洲总局的解体.....                    | 15 |
| (一)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及其被解散 .....                      | 15 |
| (二)朝共满洲总局的建立及其解体 .....                      | 18 |
| (三)共产国际决定重建朝鲜共产党,朝鲜<br>共产主义者重新建党失败 .....    | 24 |
| 1. 在中国东北的朝共上海派重建工作 .....                    | 29 |
| 2. 在中国东北的朝共火曜派重建活动 .....                    | 30 |
| 3. 在中国东北的朝共 ML 派重建工作 .....                  | 31 |
| 〔附〕在上海的朝共党人重建朝共活动 .....                     | 32 |
| 三、旅居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面临的选择.....                  | 34 |
| (一)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朝鲜<br>共产主义者的选择 .....       | 34 |
| (二)中国共产党就朝共党人加入自身组织<br>问题进行调查工作 .....       | 45 |
| 四、中共中央、满洲省委关于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br>加入中共的方针和工作原则..... | 54 |
| (一)中共哈尔滨市委代表同朝共满洲总局<br>代表关于临时关系的确定 .....    | 54 |





|                                                   |            |
|---------------------------------------------------|------------|
| (二)中共满洲省委同朝共满洲总局的会谈 .....                         | 60         |
| (三)中共满洲朝鲜群众组织党团的报告和<br>中共中央关于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的方针的确定 ..... | 68         |
| <b>五、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br/>    中国共产党行列.....</b>  | <b>77</b>  |
| (一)中共满洲省委为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br>加入中共组织进行的工作 .....          | 77         |
| 1.《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宣言》的发表 .....                        | 77         |
| 2.中共满洲省委向各地派巡视员加强调查工作，<br>拟定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初步办法 .....   | 86         |
| 3.成立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 .....                             | 87         |
| 4.满洲省委总结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工作经验，<br>进一步明确工作方针和办法 .....      | 91         |
| (二)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各地<br>审查、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入党 .....         | 100        |
| 1.东满方面 .....                                      | 100        |
| 2.南满方面 .....                                      | 109        |
| 3.吉林及其附近 .....                                    | 114        |
| 4.北满方面 .....                                      | 115        |
| 5.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状况的变化 .....                            | 120        |
| <b>六、中共协助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建党的活动 .....</b>                | <b>125</b> |
| <b>七、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境内的朝鲜族和侨居农民的政策 ...</b>               | <b>137</b> |
| (一)中共东北党组织对朝鲜族和侨居朝鲜农民<br>作用的评价.....               | 137        |
| (二)中共对东北境内朝鲜居民和朝鲜<br>共产主义者的政策.....                | 150        |
| 1.中朝民族联合抗日，建立朝鲜民族自治区 .....                        | 150        |
| 2.建立朝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                            | 153        |

|                                                 |     |
|-------------------------------------------------|-----|
| 3.建议组建“朝鲜民族革命军” .....                           | 155 |
| 4.建议参加中共组织的朝鲜同志可单独成立<br>党小组和党支部 .....           | 162 |
| 5.关于在中共东满党组织内部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br>内部开展反“民生团”斗争 ..... | 164 |
| 〔附〕活跃在华北抗日战场的朝鲜义勇军 .....                        | 169 |

|                                         |            |
|-----------------------------------------|------------|
| <b>八、中朝抗日战士并肩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b>        | <b>173</b> |
| (一)金日成参与或指挥的抗日部队在吉辽两省地区<br>的抗日武装斗争..... | 174        |
| 1.九一八事变前延边地区反日斗争 .....                  | 174        |
| 2.中朝反日游击队时期的斗争 .....                    | 182        |
| 3.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在汪清、宁安地区的<br>抗日斗争 .....  | 194        |
| 4.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六师和第二方面军的斗争 .....            | 207        |
| 5.抗联第一支队时期的斗争 .....                     | 216        |
| (二)崔石泉参与或率领抗日武装在虎饶地区的斗争.....            | 222        |
| 1.饶河反日游击队时期的斗争 .....                    | 222        |
| 2.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和第二师时期的抗日斗争 .....        | 230        |
| 3.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时期的斗争 .....                 | 234        |
| (三)金策参与或指导抗日武装在北满地区的斗争.....             | 238        |
| 1.参加中共前后的革命工作 .....                     | 238        |
| 2.在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抗联第三军时期的战斗 .....             | 241        |
| 3.在中共北满省委时期的工作 .....                    | 251        |
| <b>后 记.....</b>                         | <b>263</b> |



1930年前后，一批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国共产党，还有相当数量的旅居中国东北的朝鲜爱国者、朝鲜共产主义者先后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同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共产主义者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一道，反对中国封建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种参加旅居国革命的现象在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

当《共产党宣言》刚一发表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便遭受到各国所有反动势力的联合反对。这一“共产主义幽灵”对比当时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的确势单力孤，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来，当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取得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幽灵”才在世界上唯一的国度里化为活生生的现实。长时期以来，社会主义的苏俄仍然为世界各种反动势力所仇视。为此，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当时，各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和被压迫民众，都把苏俄看作自己的“祖国”。中国的一些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曾经纷纷前往苏俄寻求真理，汲取知识，参加过苏俄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运动，为旅居国的革命事业而献身。当时，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革命事业，凡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参加所在地的革命运动，这样做，既是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献身，也是为本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同样，过去有不少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因他们的国家长期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而被迫流亡中国





时，其中也曾经有相当一批人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以及抗日战争事业。他们同样抱定一个崇高的信念：参加旅居国——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抗日战争事业，同时也是为争取祖国朝鲜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献身。对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切反动势力极尽挑拨之能事，诬蔑这些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是所谓“中共的走狗”。这在过去韩国的或别国的一些出版物中，在某些人的言论中，是屡见不鲜的。

当然，一切共产主义者对于这种现象，本来是可以不屑一顾的，因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它刚一出现在欧洲时即遭到一切反对势力的攻击，然而，这一“幽灵”并未因此消失。如果反对势力仅仅限于这种谩骂式的攻击倒还罢了，他们还用出版物和传播媒介对历史事实加以明目张胆的歪曲和篡改，这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些出版物可以留传后世，混乱视听。一些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的老一代共产主义者，当然可以不置一顾，无所畏惧；而对于当代一些不谙历史的年轻人和未来人，却仍有予以澄清和交代的必要。

实际上，中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史学家迄今为止所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的著述，对于上述历史的事实，还很少予以全面的揭示和记述，致使这一问题的历史真相仍然鲜为人知，使一些反动势力在这一问题上对各国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恶毒攻击和肆意歪曲还有某些市场。

经历过 20 年代和 3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老一代共产主义者，今天在世者为数已经不多了。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能够实事求是地揭示和记述这一历史现象，不仅可以直接得到他们的指教，而且相信他们也会由此而感到欣慰。

只是著者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识所限，不可能全面地揭示和记述过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有这一类历史事实。因而只

能根据本人多年的探索和研究，仅就本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一批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组织，一批朝鲜革命者、抗日战士曾经在同一地区参加过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考察和记述。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用这一研究成果，在批驳和澄清一些反对势力就这一历史问题所进行的歪曲和攻击方面，做出一点贡献。

为便于澄清历史，著者在记述中使用了较多的历史资料以为佐证。

其次，关于历史上在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中国的朝鲜族居民和作为朝鲜国移居中国的侨民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至今学术界还在探讨。著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殖民统治以前大致可以划为一个时期。在此时期内，凡祖居中国和长久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朝鲜族居民，以及近代朝鲜移民中业已加入中国国籍者，都属中国的朝鲜族居民；此外的大量朝鲜移民仍属朝鲜侨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 14 年时期，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日本殖民统治者不仅将大量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给予双重“国籍”（即既有日本国籍，又有“满洲国籍”），而且将东北地区原有的朝鲜族居民和大量被迫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也一律给予双重“国籍”（即既是“日本国籍（朝鲜半岛）”，又是“满洲国籍（鲜系）”）。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所实施的这种“国籍法”，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当然不予承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建立、统一的国籍法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朝鲜国家已获独立，民族已获解放，大量过去被迫移居中国的朝鲜侨民回归朝鲜故土的情况下，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对待东北地区的原有朝鲜族居民和在此之前已加入中国国籍的朝鲜移民，当然视为中国的朝鲜族居民，与中国各族人民一道享有一切权利和义务；业已长久定居在中国东



北地区的朝鲜居民，事实上也被视为中国的朝鲜族居民，同中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中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同样分得了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在解放战争中许多朝鲜族居民或参加人民军队，或承担支援革命战争的战勤义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部分朝鲜居民经过一定的手续，正式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同原有朝鲜族居民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的成员。

## 一、朝鲜人迁居中国东北概况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山水相连，两国人民自古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友谊。自 17 世纪中叶以后，两国边民往来渐多，各自政府为避免纠纷曾屡下禁令。19 世纪 70—80 年代，中国政府相继解除了延边地区和东边道地区的禁令，朝鲜政府随之也正式废止国境封禁令。此后，朝鲜边民大量拥入鸭绿江和图们江沿岸中国一侧地区定居开垦，中国政府还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长约 350 公里、宽约 25 公里的地区划为朝鲜移民专垦区域，允许朝鲜移民在此定居，租给土地，开垦耕种。不久，自朝鲜迁来的居民日众，中国指定的这一专垦区已无法容纳，朝鲜移民遂越出这一区域，自行深入延边地区和东边道地区以至其他各地。

据不完全统计，1909 年，延边地区有朝鲜定居农民 184 867 人<sup>①</sup>；1911 年，迁入东边道地区的朝鲜农民达 58 950 人<sup>②</sup>。

1910 年，朝鲜完全为日本吞并之后，朝鲜人民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更大量迁居中国东北。据统计，1920 年，朝鲜人在中国东北地区已达 459 427 人；1926 年，达到 542 185 人；1930 年，增至 630 982 人<sup>③</sup>。

关于这一时期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数量，还有下列统计可供参考：

- ① 《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 页。
- ② 《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第 5 页。
- ③ 《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第 47 页。



1930年6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区域全国代表会议的东北代表团，在向会议提交的《关于在满洲的高丽人问题提案》中认为：

自1910年日韩合并以来（朝鲜移民）其数（量）急激增加，而每年达五六千至一万人之多。现在……移住者总数已过百万人以上。<sup>①</sup>

1947年1月10日，前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在中共吉林省委群工会议上所作的《延边朝鲜民族问题》的报告中认为：

九一八以前，中国官方统计在满朝鲜人数为120万人……

1929年7月25日，前朝共党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任上海中共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洪南杓，曾以江宇的化名向中共中央提交的《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中认为：

1910年—1919年3月1日韩国独立运动大示威以前，这十年间……移住总数130万多人。<sup>②</sup>

1930年1月30日，在一份《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中写道：

①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页。

②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页。

朝鲜人散居满洲各地的数目，无处寻得可靠的统计……但据我们向各地询问的综合起来，统共不过为130万上下之数。<sup>①</sup>

1930年5月24日，在一份《中共满洲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对在满韩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决议案草案》中认为：

在满洲的韩人共计有130万余众，除其中50余万密居<sup>②</sup>于延边四县——延吉、琿春、和龙、汪清以外，其余则分居于南北满各县……<sup>③</sup>

在江宇的前述《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中认为：

今据1928年2月，我们满洲总局和正义府之调查，则在满韩侨总数为193万多人，这亦是不很严密的调查了。如果施详密的调查，在满韩侨总数，实超过200万以上了。<sup>④</sup>

1930年在一份《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满洲有韩国农民将近200万人，这是满洲一个基本革命队伍……<sup>⑤</sup>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集，1989年刊行，第379页。

② 密居，即密集居住之意。

③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02页。

④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13页。

⑤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6集，第377页。



1930年6月1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东北代表团中的朝鲜农民代表李浣，在向会议提出的《关于满洲农民情势及满洲一般情势的报告》中说：

（在东北的朝鲜人）一般韩人间推定的数目，认为约有300万上下。<sup>①</sup>

上述各种统计数字，众说纷纭，是由于当时东北当局缺乏认真调查统计而造成的，多数都是一种约略的估计而已。著者经研究认为，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朝鲜族人口总共有1 763 800余人，其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居住的共达1 750 300余人，占绝大多数。因此认为距今50余年前在东北的朝鲜居民即已达100万、200万、300万的数字，显然是不可信的。据推定，1930年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约有63—65万人，可能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强占中国东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日本殖民统治者更有计划地强迫向这一地区移居大量朝鲜农民，以便让出朝鲜土地，容纳由日本向朝鲜迁居的众多日本移民。因而，朝鲜农民被迫背乡离井移居中国东北地区者急剧增加。据统计，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数量逐年变化如下：

1934年          717 213人<sup>②</sup>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6集，第425页。

② 玄圭焕：《韩国移民史》（上），第168页。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122页。

1936年          875 908人<sup>①</sup>  
1939年          1 065 523人<sup>②</sup>  
1943年          1 200 000人<sup>③</sup>  
1944年          1 700 000人<sup>④</sup>  
1945年          1 692 342人<sup>⑤</sup>

从上述统计数字可见，朝鲜居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数量在日本占领时期急剧增加，1939年突破百万大关，日本战败前夕达到170万人左右。这一数字几乎占当年中国东北全境人口总数约3 900万人的4.4%左右。

这些自朝鲜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除多数定居于靠近中朝边境的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林、辽宁两省毗邻的旧东边道地区外，还广泛散布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地区。

周保中在《延边朝鲜民族问题（草案）》报告中说：

朝鲜居民在东北分布状况：延边的延、汪、和、琿、安图5县最多，且密集居住年代极久，其次为鸭绿江西旧东边道——通化地区。再其次为桦甸、永吉、蛟河、舒兰、五常，以及沿牡丹江流域、松花江哈尔滨下游迄乌苏里江左岸。

这些地区，恰恰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东北地区农

① 玄圭焕：《韩国移民史》（上），第168页。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122页。

② 《满洲年鉴》（1939年），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138页。

③ 朴昌昱：《试论朝鲜人的迁入及其历史上限问题》，《朝鲜族研究论丛》第1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1页。

④ 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草案）》。

⑤ 松江省政府编：《东北统计汇编》，1947年刊行，第4页。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140页。





江  
大  
海  
草  
史  
代  
北  
《  
著  
《  
示  
响  
苏  
日  
述  
统  
国  
争  
际  
等

民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广泛开展地区，同时也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最为活跃的区域。

历来迁入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他们到达东北各地后，有90%的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其中75%是贫苦农民。

周保中在前述《延边朝鲜民族问题(草案)》中说：

九一八以前，在满朝鲜居民90%以上是经营农业，特别是高度农作的水田，而农民绝对多数是小佃农和赤贫佃农，工人与季候工人及经营商业和其他事业的是极少数人……

仅以延边地区为例，据1933年伪间岛省对迁入的朝鲜农户的统计：

| 阶 级   | 户 数                 | 比 例   |
|-------|---------------------|-------|
| 地 主   | 5 114               | 0.5%  |
| 自 耕 农 | 12 832              | 25%   |
| 自耕兼佃农 | 13 280              | 25.5% |
| 佃 农   | 25 456 <sup>①</sup> | 49%   |

这些贫苦的农民在朝鲜，除遭受本国地主残酷的封建剥削以外，还因亡国而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黑暗的民族压迫，只好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和久居的家园，迁入中国东北。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早在中国清代政府开禁招垦时期迁入的贫苦农民可享受某些优待以外（诸如提供住房、粮食、种子，代购耕牛，

<sup>①</sup> 《间岛农业机构概要》，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314页。

延期纳租等），后来历年陆续迁居东北的朝鲜移民虽然也已长期定居中国，由于其中多数并未加入中国国籍，依然不能获得中国公民的权利，生活十分困苦。

周保中在前述《延边朝鲜民族问题（草案）》报告中指出：

九一八以前，朝鲜居民中有入中国籍的，但为数非常少，绝对多数是侨民，这些朝鲜居民大部分是从朝鲜逃避日寇而来的。

据1919年6月中国政府就吉林省珲春、汪清、和龙三县的朝鲜侨民和已加入中国国籍者状况的调查，列表如下：

| 朝鲜侨民<br>居住县份 | 朝鲜侨民<br>总 户 数 | 加入中国<br>籍 户 数    | 百 分 比 |
|--------------|---------------|------------------|-------|
| 珲 春          | 4 774         | 1 025            | 21.5% |
| 汪 清          | 2 846         | 336              | 11.8% |
| 和 龙          | 13 458        | 417 <sup>①</sup> | 3.1%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中国东北长春附近，一手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并借机动员媒介大肆鼓噪，歪曲真相，掀起反华浪潮。当时，国内报刊也针锋相对，严正地揭露事实真相，予以反击。《中央日报》曾载文指出：

据1931年上半年南京政府统计，东北朝鲜侨民入中国籍者总数为51 858人。其中，辽宁省为8 310人；吉林省为36

<sup>①</sup> 参见吉林省档案馆档案第2949卷6-4号，转引自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86—87页。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160人；黑龙江省为7388人。如依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侨民约有65万人计算，加入中国籍者则仅占约8%左右。<sup>①</sup>

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朝鲜之后，为进一步染指中国东北，便利用朝鲜人向中国移民的机会，将朝鲜移民当作其侵略中国的工具。据1924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日本国籍法》规定：日本国民可以脱离日本国籍，但并不适用于朝鲜人。凡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即使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者，却仍然被视为“日本国民”。此即所谓的“双重国籍”。日本政府借口管辖侨民，强迫中国政府承认其外交特权，即所谓“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东北有朝鲜侨民居住的地方强行派驻领事机构，将侵略的触角伸入中国东北的一些地方，以便随时挑起纠纷，扩大事端。为此，日本极力阻挠朝鲜侨民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同时，中国政府为避免与日本发生纠葛，也拖延或拒绝审批朝鲜移民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并时或强迫他们出境。结果，朝鲜移民不仅未能完全摆脱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压迫，而且增加了中国军阀政府的又一民族压迫之苦。

由于朝鲜移民大多数仍为侨民身分，依当时的中国法律规定，凡外国侨民未取得中国国籍者，一律不得享有中国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得充任各级政府之职员和公立学校的校长、教员，不得享有土地所有权、矿业开采权等等。因此，占朝鲜侨民中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便不得不租入土地耕种，或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农。租入土地又必须有人为之担保，于是一些乡约、牌头或早已“归化入籍”的朝鲜居民出头，向地主租得大量土地，然后再行分租给朝鲜移民，从中盘剥渔利。朝鲜移民不但备受封建地主的剥削，还要遭受中间人的剥削。朝鲜移民将这些中间人称为“二房东”，即二地主。所以，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贫苦农民所

遭受的封建剥削，较之其他各族贫苦农民更加深重。后来，在朝鲜农民广泛开展的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将这类“二房东”式的地主分子当作首要的对象，绝非偶然。

1928年2月29日由中共满洲省委制定的《东边道工作决议案》中指出：

东边道和吉林省东南各县百余万的朝鲜农民都是从日本殖民地——朝鲜逃来的。他们比中国的农民更有难形容的痛苦。在政治方面，中国官僚对待他们的残暴，较之对待本国农民，可谓“赏赉有加”，并且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他们在那一带大小各县中专设“大日本帝国警察出張所”去“看管”或“压迫”他们。在经济方面，除去饱尝一般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而外，还有丧失耕地的危险。东边道朝鲜农民对土地的关系，与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关系完全不同。第一，因为他们未入籍，无论贫富不能享有土地权。第二，朝鲜农民多种稻田，将荒田变为水田较之变为旱田，所费资本当然多得多。因之水田比旱田的地价更高，并且水田所收获的米，比较旱田所收获的高粱等要多值一倍以上的代价。因此种种，所以中国地主不断的〔地〕夺回朝鲜农民（开垦）的土地，转租给他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自朝鲜移居到这一地区的居民，同东北原有的中国各族人民一样，全部沦为亡国的奴隶，同被视为伪满洲国的“国民”。虽然此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被视为具有双重国籍（即“日籍”与“满籍”），但实际上仍然被当作殖民地的奴隶对待，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沉重的殖民剥削以及封建剥削。广大朝鲜贫苦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悲惨命运，并未得到任何的改善。

总之，历年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其中的大多数是

① 《满洲韩侨人数与职业》，《中央日报》1931年8月6日。





贫苦农民和其他劳苦群众。他们在政治上先后遭受中国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在经济上一贯承受殖民主义者和封建地主的沉重盘剥，因而同东北各民族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一样，具有强烈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封建军阀、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剥削制度的要求，能够而且必然会加入东北人民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压迫和剥削的革命斗争行列中去，而且后来同东北各族人民一道又投入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洪流中去，还成为其中的重要革命力量和抗日力量。

## 二、朝鲜共产党被解散及其满洲总局的解体

### （一）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及其被解散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侨居苏俄远东地区的朝鲜先进分子酝酿组建社会主义团体。1918年6月26日，李东辉等在俄共（布）远东宣传员贾列格鲁诺夫的支持下，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成立了“韩人社会党”。翌年8月，李东辉到达中国上海，参加“韩国临时政府”，该组织的重心随之移至上海。1921年1月，韩人社会党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改称“高丽共产党”。后人即称之为“上海派”。

1919年9月5日，金哲勋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舒米亚茨基的支持下，也于伊尔库次克成立了“全俄韩人共产党”。这个组织是由已经加入苏俄籍的朝鲜人组成的。该组织在1921年5月改称“全俄高丽共产党”。后人即称之为“伊尔库次克派”。

上述两个组织相互歧视，矛盾日增，甚至还发生过武装冲突。

高丽共产党和全俄高丽共产党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中，都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并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其中，高丽共产党组织在延边、东边道和饶河地区建立了区域性的本部和若干基层组织。据有关资料记载，由朱健等人在1921—1922年建立过“间岛朝鲜共产党”；由韩彬、朴允瑞（朴衡世）等建立过“满洲高丽共产主义青年会”，人们称之为“满共派”。全俄高丽共产党在饶河、宁古塔（宁安）、敦化等



地建立了组织，金哲勋也到达北满一带开展活动；张时雨、全龙洛等在延边地区于1922—1923年间建立过“满洲朝鲜共产党”等等。

上述高丽共产党和全俄高丽共产党组织，都还不是独立的统一的朝鲜共产党，而是类似各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的共产主义小组式的组织。其中，高丽共产党曾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全俄高丽共产党则是俄国共产党（布）的分部，是隶属俄共（布）领导的俄国朝鲜族的共产党组织。当时，在苏俄，在俄共（布）中央的领导下，曾经建立了一些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以便于组织苏俄各民族共产党人的活动和开展工作。虽然这些苏俄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都负有帮助他们各自的祖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任务，但是它们是俄国共产党（布）的下属组织的性质却是确定不移的。

1922年底，共产国际决定解散上述两个党的组织，并重新在朝鲜组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不过，上述两个组织却名亡实存。不久，“上海派”在朝鲜建立了“无产者同盟会”，人们称之为“汉城派”或“汉上派”。1923年5月，“伊尔库次克派”在朝鲜建立了“新思想研究会”，后改称“火曜会”，人们称之为“火曜派”<sup>①</sup>。

1924年2月，由朝鲜留学日本的学生组建的“北星会”，在朝鲜成立了“新兴青年同盟”。“北星会”后来改称“北风会”，即人们称之为“北风派”。

1925年4月18日，上述三派朝鲜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在汉城召开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并选举金在凤为委员长。随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然而同年冬，朝鲜共

<sup>①</sup> 马克思诞生日是星期二，朝鲜和日本皆称星期二为火曜日。该派以火曜会为名，标榜信仰马克思主义。

产党中央即遭到日本占领者的破坏。

1926年2月中旬，由姜达永、洪南杓、金缀洙等又组成了朝鲜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姜达永任书记。这一届朝共中央于同年6月再遭敌人破坏。在此期间，朝鲜共产党在中国东北、上海和日本建立了海外总局，作为朝共中央的代表机关。

而后，由于党内意见分歧，北风派中的“一月会”部分成员安光泉、金世渊、韩伟健（李铁夫），上海派的金缀洙、吴义善和汉城派一部，联合组成“列宁主义同盟”（后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盟”），即后人所称“ML派”。1927年2月，由金缀洙等组成的朝共第三届中央，1928年3月，由车今奉等组成的第四届中央，又连续遭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大破坏，朝鲜共产党从此陷入瓦解状态。

关于朝鲜共产党的这种状况，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委员会奉中共满洲省委之命派出代表，同朝共满洲总局代表会谈时，朝共代表就朝鲜共产党的历史作了简要介绍。现将1929年9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共中央转抄哈尔滨市委关于朝鲜共产党报告中有关部分摘记如下：

韩共是1924年<sup>①</sup>成立的，本来不甚健全，经过1926（应为1925）年新义州大检举及六四（应为六十）事件（借韩王之死扩大宣传），重要干部捕捉逃亡殆尽，从此以后，韩共就没有正式的中央了。但是共产主义的团体是有的，并有许多派别，其主要者有：（1）京城青年会——此派完全建筑在学生教员基础上，不作群众工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组织，在全国各地都有组织，后分为两派；（2）ML派，此派取名ML，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以联共逐出无政府主义化合者朴允世

<sup>①</sup> 应是1925年。





(朴允瑞)等为首领,联合京城派青年会新派所组织的。自主中央,曾到国际去报告,遭驳斥。有韩人青年大同盟即彼辈领导,没有群众,不过400余人;(3)一月会——此派在韩国本部无甚势力,为韩人留东京的学生所组织,亦以共产主义相标榜;(4)上海派——此派发生在上海,但在上海并无势力,主要是沿海一带,其首领金哲洙,曾联合京城青年会、一月会组织中央,金为第一次中央候补委员,报告国际也遭驳斥,亡命海外的同志,也反对他们这样乱七八糟搅合在一起。国际叫他们召集第三次大会,由国际派赵世武为代表参加指导。以后赵在上海被捕,金哲洙又自己召集会议,国际当然不承认的。并且他们的各派并没有放弃小组的活动,内部纠纷,同志现已无形解体;(5)火曜派——即第一次党的正统派,新义州、六四(应是六十)事件出狱同志皆属此派,现在韩(国)本部作复党运动。满洲总局从来和这一派有密切的关系。最后我问他与国际派别的关系,他说:我们同国际没有直接联系,只知托洛茨基派已经国际严重处罚,我们当然要反对。至于右派的发生他们还不知道。

## (二) 朝共满洲总局的建立及其解体

1926年4月6日,朝鲜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在中国上海的该党海外部负责人金灿(火曜派),令其负责筹建朝共满洲总局,作为朝共中央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代表机关。金灿当即选派曹奉岩、崔元泽等赶赴中国东北,4月下旬抵达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前称珠河县)一面坡镇河东的前“伊尔库次克派”负责人金哲勋处,进行筹建工作。5月16日,召开了有曹奉岩、崔元泽、尹滋英、金河球、全龙洛、金哲勋等人参加的会议,选出9人组成执

行委员会,由曹奉岩(火曜派)任责任书记,崔元泽(火曜派)任组织部长,尹滋英(上海派)任宣传部长,正式建立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会议决定总局机关设在今黑龙江省宁安,下设东满、南满、北满3个区域局,其中东满区域局是总局的核心组织。

1926年10月28日,在延吉县勇智乡三里村(龙井附近)组建了朝共满洲总局东满区域局,选出全龙洛为责任书记、金仁国为组织部长、李淳为宣传部长。东满区域局机关设在龙井,下有龙井、平岗、和龙、局子街、铜佛寺、明月沟、汪清、罗子沟、珲春等19个基层组织。

北满区域局开始设在依兰,后移宁安、阿城。先后由姜和仁、禹龙善、李炳世担任责任书记。下设阿城、珠河、宁安、汤原等4个基层组织。

1927年秋,组建南满区域局,先后由金露海、李九浩担任责任书记。区域局机关设在磐石,在吉林、桦甸、蛟河、清原、伊通、辑安、兴京、沈阳、安东、通化等地设有基层组织。

朝共满洲总局组成人员变动频繁,至1927年9月,总局干部为:责任书记吴义善(上海派)、组织部长崔元泽(火曜派)、宣传部长金在明(火曜派)、军事部长朴允瑞(满共派)。机关设在宁安县花脸沟。

1927年10月3日,朝共满洲总局代理书记崔元泽和东满区域局责任书记安基成等在召集东满区域局干部会议时被捕。时值朝共第三届中央时期,ML派取代火曜派掌握中央领导权,各派仍纷争不已,党内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朝共满洲总局名存实亡。此后,火曜派、ML派、汉城—上海派各自建立起各派的满洲总局。

有关朝共满洲总局的成立和活动情况及其最后的解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在中国活动的朝共党人加入自己的组织以前,曾进行了一定的调查和了解,写出了几则报告。



在1929年7月27日由中共法南区韩国特别支部书记玉贞写的一份《东三省韩侨状况报告》中说：

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和共产青年会组织当时在国际党承认之下，组织这个（满洲）总局，总局之下有东满、南满、北满3个区域局，区域局又分各支部，各支部又分小组。他的当面任务<sup>①</sup>，是组织农民群众，领导青年运动，总愿各民族团体，向着反日本帝国主义协同战线进击。翌年12月已经组织的党员总（共）有157人。但是1927年10月东满区域局代表大会，在延吉开会，被日本警察侦悉，百余同志被捕，送到韩国京城受讯问，除证据不明（者）外，重要分子30余人被处役刑……重要的同志一个一个继续地被拘捕幽禁，就不成组织，所以满洲总局自然成了没有系属的另一机关……<sup>②</sup>

1929年7月25日，在前述由同一特别支部成员所写的关于《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中说：

总局组织以来，工作很敏活，活动很积极，所以1927年已登记党籍的C部同志<sup>③</sup>至365人。不幸于1927年10月3日东满区域局全体大会时被捕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间岛领事馆警察毒手，护送京城者百余人，其中27人的指导分子现投狱服役……至翌年2月第二次被检举25人，遭此二度惨祸，

① 当面任务，即当前任务或目前任务。

②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4页。

③ C部，即共产党的代称，亦称CP，共青团的代称为Y部，亦称CY。

（从此）内部疮痍……<sup>①</sup>

1930年6月，由东北代表团向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提出的《关于在满洲的高丽人问题的提案》中指出：

1925年朝鲜共产党创立以来，在第三国际指导之下设置了朝鲜共产党的满洲总局，而多数共产主义者的热诚活动的结果，民众运动的组织非常发展了。各个乡村里组织了农民会、农民青年团、妇人会、革命者济援会及反日本帝国同盟等，各种团体组织了各自的中央机关，而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口号之下坚决斗争。可是，朝鲜共产党以党内无原则的小组织之斗争的继续及没有产业群众里的基础而遂破灭了。同时在满诸革命团体亦被无原则分裂而消灭了运动之统一性，现在陷于无力之状态。<sup>②</sup>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遭受敌人的极大破坏以后，朝鲜共产党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统一组织呈现瓦解局面，各派另行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机关。同时，由各派自行组织和领导的群众组织，也各自为政。

1927年10月，朝共满洲总局和东满区域局被破坏后，火曜派在阿城改组了原有的满洲总局，选举李东星为责任书记，由金灿任顾问。改组后的朝共满洲总局，实际上是火曜派满洲总局，并且金灿从此成为火曜派的实际领导人。1929年，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再行改组，由金圣德任责任书记，张时雨任宣传部长。后来相继由朴有德、金弘善、金白波、张时雨、金海王等人负责总局

①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11页。

②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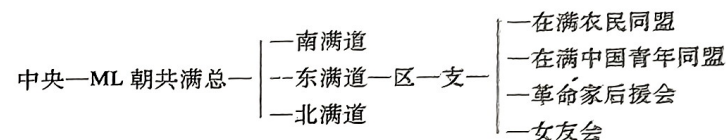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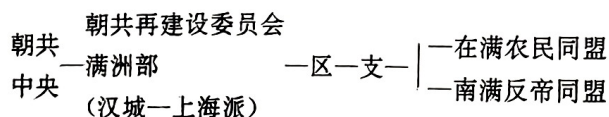
的工作。金志刚（崔石泉、崔庸健）曾任该总局的军事部长。火曜派满洲总局建立了东满、北满黑龙江、南满等道一级组织和基层支部，还建立了青年同盟、反日同盟、劳动同盟和农民组合等群众团体，创办了《喷火口》、《火焰》等刊物。该派在北满、东满地区影响较大。

1928年3月，ML派在吉林省磐石建立了本派领导机关——朝鲜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满洲总局，选举李庆镐为责任书记，委员朴允瑞等。后来，ML派的主要领导人相继为孙京镐、金万善、吴成仑（全光）等。他们还建立了农民同盟、青年同盟等群众组织，创办了《赤旗》、《共产青年》等刊物。该派在南满、东满影响较大。

汉城—上海派满洲总局设在敦化，即后来的朝共再建准备委员会及其满洲部、“满洲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同盟”。总局机关后来迁至瓮声砬子（今安图县明月镇），主要领导人先后为金缀洙、尹滋英、朱健等。该派组织在东满、北满和南满建立起区域组织和基层支部，并建有农民同盟和反帝同盟等群众团体，创办《满洲劳动者新闻》等刊物。

当时，朝鲜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机关处在瓦解的状态之下，它的海外组织相继分裂，呈现派系林立情势。朝共各派满洲总局自成系统，由其领导的群众组织也同样处于分裂状态。

关于这种情况，在中共满洲省委于1930年上报的一份《北满农民调查表》中，可见一斑。



朝鲜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机关在屡遭日本殖民当局摧残和党内派别斗争的作用下，虽然呈现瓦解局势，在国内的党员和基层组织所余无几，但是，它的海外组织却还保存了一定的力量，其中以在中国东北地区保存下来的有组织的力量为最多。当时，朝共满洲总局尽管业已分裂为各派，但是，他们还是各自团结了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力量，组织了群众团体，坚持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宣传和斗争，对于推动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职务的廖如愿在1930年9月20日向省委提交的关于巡视东满的工作报告中指出：

延边朝鲜各派共产主义团体的发展，领导了朝鲜群众的组织，普遍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帮助群众斗争的许多经验。当

然对于延边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推进，起了伟大的作用……<sup>①</sup>

### （三）共产国际决定重建朝鲜共产党，朝鲜共产主义者重新建党失败

自朝鲜共产党中央及其满洲总局解体之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曾多次就朝鲜共产党问题作出了专门的决议，指出朝鲜党屡次遭受挫折的原因和今后改进的途径。

1927年12月，共产国际在《关于朝鲜共产党的决定》中指出，朝共过去遭受挫折以至组织解体的自身原因，在于党内存在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派别斗争。指出，产生这种派争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朝共组织中，工人、农民出身的党员比较薄弱，而只是知识阶层同学生的狭窄的结合。指出，今后应深入工厂、农村，建设产业支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掩护下进行工作，防止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和警察的破坏和迫害。<sup>②</sup>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检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工作，总结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确定共产国际今后的方针。

大会对于朝鲜的革命运动和朝鲜共产党的状况曾予以讨论，决定由佐野学、瞿秋白、米夫和禹伊鲁达念等人组成朝鲜委员会，对朝鲜共产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建议。<sup>③</sup>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205—206页。

<sup>②</sup> 摘译自村田阳一编译：《共产国际资料集》第4卷，日本大月书店1981年版，第264—266页。

<sup>③</sup> 参见〔日〕《现代史资料》第29卷，みすず书房1982年版，第218页。

不久，共产国际曾专门作出《对于朝鲜共产党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只有在确认具有唯一的指导权及成分的朝共党的建立，并在物质上事实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为止，对在朝鲜进行斗争的共产主义各派中的任何一派，拒绝承认其为共产国际支部。指出，共产国际本身及其各支部和少共国际、职工国际、农民国际，对于正在进行派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各种集团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予以丝毫的物质援助。指出，联共和共青团及其他国际党同少共国际支部，对于已被除名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各派成员，要绝对拒绝其加入自己的队伍。<sup>①</sup>

同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又作出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致朝鲜革命工人和农民书》及有关决议（简称《十二月提纲》）。该决议认为，鉴于朝鲜共产党连续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鉴于朝鲜党内存在长期持续的派别斗争，业已很难担负起领导朝鲜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的任务，因而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必须总结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派别斗争的恶劣倾向，极大地增强内部的团结，以对共产主义事业热诚的态度，重新组织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真正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统一的坚强的朝鲜共产党。

兹将该项决议的有关部分摘译如下：

过去，在朝鲜共产党的队伍中，几乎都是知识阶层和学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党，欲使其成为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坚强的党，是不可能的。据此，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强化党自身的队伍，全面地改善党的社会基础。由小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组成的党，并且同工人

<sup>①</sup> 摘译自村田阳一编译：《共产国际资料集》第4卷，第486页。





阶级缺少联系，这是迄今为止造成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朝鲜共产主义者为完成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任务，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增强团结，执行委员会要求在朝鲜迅速重新组建共产党，并寻求使其发展壮大的方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信：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的这一特殊事情上，要以对事业的真诚热心的态度，克服过去的错误，站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的立场上，重新组建起强有力的朝鲜共产党。<sup>①</sup>

关于共产国际撤销对朝鲜共产党的承认，并令其重建的指示，在日本所获取的情报资料中也可查到有关的记载。现摘录如下：

昭和三年（1928）12月，共产国际以政治书记处的名义发出撤销承认该党的指示。指出：“朝鲜共产党，由于他的成员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层，所以一再陷入持续不断的极为激烈的党内派别斗争中，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极不得力，因此我们不承认它。今后，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应遵守本决议，立即清算派别斗争，以工农阶级为基础，在斗争实践中组织起能够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唯一坚强的共产党。”（《十二月提纲》）。<sup>②</sup>

那么，共产国际是否具有这种解散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权限

① 摘译自村田阳一编译：《共产国际资料集》第4卷，第492—495页。

② 转引自李铸等译：《关于东北抗日联军资料》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页。

呢？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共产国际关于解散朝鲜共产党并令其重建的决定呢？

1919年3月，第三国际正式建立。它是为推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结成的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大联合组织。它在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在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是有其重要的贡献的。

共产国际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反对改良主义；组织上强调集中统一，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是，由于这一国际组织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浪潮正在波及欧洲，苏俄正处于各个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紧急时期诞生的，更多地吸取了俄国共产党（布）的经验，因而过分地强调了参加这一国际组织的各国共产党，不仅本身必须保持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而且对于共产国际的要求也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以至共产国际将各国共产党仅仅视为它的一个支部组织，忽视了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党内事务的原则。虽然，列宁在世时，曾经要求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必须考虑到各国党在本国的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不过，后来共产国际在实际工作中却忽略了列宁的这一要求，而且形成了凡属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所作出的一切决议或指令，所有加入这一国际组织的各国党都必须无条件地予以执行的不正常的状态，甚至后来还出现共产国际有权决定某一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组织的取消或重建等关系一个党的生命的重大问题的现象。至于共产国际随意改组一个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或更换其主要负责人的人事，更属常见。实际上，这是一种越权行为，是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的。该《章程》第15条规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将违反共产国际纲领和章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程,或违反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的整个支部、部分成员和个别成员开除出共产国际。”<sup>①</sup>但是,上述条款的前提是违反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章程,或违反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才有权予以开除。然而当时的朝鲜共产党,据共产国际的批评,却仅仅因为在组织上党员多数是知识阶层和学生,缺少工人、农民的成分,仅仅因为他们同工人、农民缺少联系,仅仅因为党内存在派别斗争,并未发现朝鲜党有违反共产国际纲领和章程,或违反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决议的过失,便被勒令解散和重建。联系 1922 年底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解散“高丽共产党”和“全俄高丽共产党”这两个组织的决定,共产国际这种行为显然是不恰当的,明显的是一种超越权限的行为。本来,共产国际理应协助朝鲜共产主义团体和朝鲜共产党不断地克服各派的宗派主义错误,注意改善党员的成分,使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内部团结和统一,使之在牢固的工人、农民的社会基础上健康地成长壮大,而不是简单地采用组织手段予以解散了事。结果是十分明显的,只能延迟了朝鲜共产党组织的重新建立和朝鲜革命运动的进展。

自共产国际决定朝鲜共产党必须重建以后,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朝鲜共产党的代表于 1929 年初即行返回当时朝共的两个活动中心——中国的东北和上海,分别向当地的朝共领导机关传达共产国际的《十二月提纲》,酝酿重建朝鲜共产党组织。

有关这一历史情节,下列资料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摘录如下:

1928 年末,参加第三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朝共代表金圭烈(旧上海派)等携带共产国际的《十二月提纲》返回(中国)东北,向以金缀洙为首的朝共重建委员会传达共产国际指令的精神,协助金缀洙开展重建活动。另外,梁明和韩海(ML 派)二人则去上海,向 ML 派领导人韩伟健提交了共产国际的《十二月提纲》。<sup>①</sup>

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 1929 年春又作出决议,认为朝鲜共产党的重建工作,必须在由共产国际组成的有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等所派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然而,由于朝鲜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机关在朝鲜国内业已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某些重要领导人已经避往海外,无人统一负责朝共的重建工作。朝共海外组织又早已解体,分别建立了小的派别组织,无力统一进行朝共的重建工作。因此,朝共再建工作便只能由海外组织的各派自行其是,在中国的上海和东北的朝共各派也不例外。所以,朝鲜共产党的重建工作一开始便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

从此,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 and 上海的朝鲜共产党人,便分别开始派人回国,或在旅居所在地,开展党组织的重建工作。

### 1. 在中国东北的朝共上海派重建工作

1929 年 1 月,身居中国东北的朝共汉城—上海派金缀洙、金荣万、尹滋英、金圭烈、朱健等人发起,为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有关决议,在敦化建立了朝鲜共产党再建准备委员会。会上选出金缀洙为这一组织的委员长。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返回朝鲜重建朝鲜共产党。1931 年 1 月,金缀洙带领 20 余名经过训练的党员潜回朝鲜,同时将朝共再建准备委员会本部也移至汉城。但是不久,相继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几次大破坏,其组织备受摧残,以致这一派的朝共重建活动也处于停顿状态。此后,由金一洙继任

<sup>①</sup>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 1965 年版,第 77 页。

<sup>①</sup> 译自〔日〕《现代史资料》第 29 卷,第 218 页。





该组织的委员长，并将其本部转移至朝鲜咸兴。

在该组织本部迁回朝鲜之前，1929年9月，由朱健负责建立了朝共重建准备委员会满洲部，作为这一组织的海外分支机构。满洲部曾在东满、北满和南满设立了地区组织，试图重建朝鲜共产党，均未成功。

## 2. 在中国东北的朝共火曜派重建活动

关于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朝共满洲总局（火曜派）的重建朝鲜共产党的工作，从下列资料中可见一斑：

1929年3月，张时雨<sup>①</sup>通过金丹治把共产国际的《十二月提纲》带到东满，首先给韩别儿（韩星）、金昌一、金勋等人传达，征询过意见。尔后，他又来到吉林召集南满道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听取大家意见。……会上……在几个重要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一、在满朝鲜人应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并援助朝鲜革命；二、应本着一国一党的原则，加入中共；三、朝鲜国内的朝共重建问题，应让朝鲜国内的同志去解决，也应相信他们能够解决。因此，我们不参加其他各派的再建活动，反对他们在满洲进行再建活动。会后，张时雨立即到北满海沟总局传达《提纲》，并转达了东、南满同志的意见。

1929年6月12日，朝共满洲总局在海沟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改变过去以争取朝鲜革命的胜利和民族独立为目标的路线，制定出以在满朝共党人参加中共，投身中国革命，求

得自身解放，解决朝鲜农民的土地问题为目标的新的路线。<sup>①</sup>

同时，也有如下资料认为，朝共满洲总局（火曜派），或该派的某些党员也曾从事过朝共的重建活动，还建立过“朝鲜共产党重建准备委员会”一类组织。但是，最终都未能获得成功。有关资料如下：

1929年6月29日，火曜派洪南杓、元达民、金永哲、韩明瑞、金万海等人在吉林成立朝鲜共产党重建准备委员会，进行朝共的再建活动。<sup>②</sup>

朝鲜共产党解散以后，“火曜派”挂起“朝鲜共产党重建准备委员会”或“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招牌。<sup>③</sup>

此外，1929年7月，火曜派高丽共产青年会执行委员会金丹治曾带领7名从苏联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结业的学生，潜回朝鲜，在釜山、元山、咸兴、清津、雄基、新义州等地建立组织，发展朝共党员。1930年3月，它的成员全部被捕，组织尽遭破坏。

## 3. 在中国东北的朝共 ML 派重建工作

关于朝共 ML 派在东北重建朝共工作，摘录几段资料如下：

① 梁焕俊：《20年代后期在满朝共党人的活动》，《延边文史资料》第4辑，政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第3页。

② 译自〔日〕《现代史资料》第29卷，第218页。

③ 《朝鲜现代史》，平壤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① 张时雨，朝共满洲总局（火曜派）负责人之一。



1929年4月，在磐石县东响水河子召开了旅中朝鲜人青年同盟代表大会。……池喜谦曾说，那次大会……实质上是朝共满洲局（ML派）的代表大会。大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朝共问题的十二月提纲，韩彬（朝共满洲总局委员，ML派）作了国际形势报告……。至于一国一党问题，没在大会上论及。从后来各报刊上发表的资料得知，在1929年5—6月间，韩彬曾派崔正浩、金洙日等人潜入朝鲜咸镜北道，从事朝共再建活动。不久，49名成员被捕，再建活动被停止。<sup>①</sup>

1929年5月20日，在中国东北的朝共ML派韩海、高光洙、李庆镐、韩彬等人，在吉林成立新朝鲜共产党，开展重建朝共活动。韩彬被派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组织状况。但是不久，都因被破坏而遭受失败。<sup>②</sup>

朝鲜共产党解散以后……“ML派”挂起“朝鲜共产主义者协会”的招牌。<sup>③</sup>

从上述资料可见，在东北地区活动的朝共ML派也成立过朝鲜共产党重建组织，并开展过某些工作，但同样尽皆失败。

#### 〔附〕在上海的朝共党人重建朝共活动

上海在本世纪20年代初，便成了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海外活动的据点之一。朝鲜共产党正式建立后，1926年建立

了朝共上海总局，是朝鲜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海外总局之一。

1928年秋，朝共第四届中央被破坏后，由朝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韩伟健主持朝共中央的工作。但因无法在朝鲜立足，便转移至中国上海开展工作，并由ML派正式选举为朝鲜共产党主要领导人。1929年，韩伟健在上海接到由梁明、韩海转交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十二月提纲》后，便积极开展朝共的重建工作。为此，从1930年至1931年冬，他曾选派几名工作人员潜回朝鲜，并于1931年2月27日，在朝鲜京畿道金浦郡建立了朝鲜共产党再建同盟。同年4月10日，又改称朝鲜共产党协议会。但是，翌年4月下旬即遭受敌人大破坏。此后，韩伟健便决心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另寻朝鲜革命的出路。

朝鲜的著名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金山，在向美国著名记者尼姆·韦尔斯（曾是著名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斯诺的夫人）介绍朝鲜革命和自身经历时说：“1927年以后，在中国的朝鲜人中间只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独立的朝鲜共产党组织。”<sup>①</sup>这一说法，当然不很确切。不过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许多在中国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后来都纷纷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其中的一些前朝鲜共产党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这种情况说明，在上海的朝鲜共产党人已经为数不多了，他们的重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业已默默无闻。

上述情况说明，无论在中国东北的朝共各派，还是在上海的朝共党人，尽管他们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分别在朝鲜或在旅居所在地区开展了重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的残酷迫害，由于各派步调的不一致，力量分散，相继失败。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

① 梁焕俊：《20年代后期在满朝共党人的活动》，《延边文史资料》第4辑，第2页。

② 译自〔日〕《现代史资料》第29卷，第218页。

③ 《朝鲜现代史》，第23—24页。

① 尼姆·韦尔斯、金山：《在中国革命队伍里》，香港南粤出版社1977年版，第200页。





### 三、旅居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面临的选择

#### （一）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选择

1929年，对于朝鲜共产党的重建工作是关键性的一年。朝共党人各派虽然经过一再的努力，不怕牺牲，分别多次派遣得力人员返回朝鲜，开展重建朝共中央和基层组织等工作，最后仍然相继失败。实践证明，根据当时朝共党人的现状，继续依靠各派自己的努力在朝鲜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将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企图在短时期内实现这一愿望也是难以成功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对朝鲜共产党和朝鲜独立运动残酷镇压和迫害，使之在朝鲜开展活动十分困难，组织屡遭破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几乎损失殆尽，幸免者大多避往海外，很难继续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在于朝鲜共产党内部派系林立，互不信任，长时期以来未能形成一个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关和团结一致、步伐整齐的党的队伍，而是各派各自奋斗，甚至相互削弱。朝共党人的这种状况，当然无法重建党的组织，结果一一陷于失败。

在朝鲜共产党业已呈现瓦解，重建工作又面临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分散在中国上海和东北地区的朝共各派小组面临着严重的历史选择：或者承认失败，不再继续朝共的重建工作，或者另辟蹊径。

当时，旅居中国各地的各派朝共党人都在积极寻求一种既适

应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又能继续为祖国朝鲜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新的途径。

其实，早在20年代就已经有了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中国革命运动的事例。著名的革命画家韩乐然便是其中之一。他是192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在中国，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有直接参加朝鲜共产主义组织的。据后来曾是川东红军游击队著名领导人的王维舟回忆，他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以前，于1920年5月在上海直接参加朝鲜共产党组织<sup>①</sup>，并去苏联学习，1925年春返回汉口后才转入中国共产党的。<sup>②</sup>

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批朝鲜革命青年和革命者约800余人集中于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根据地，其中许多人投入黄埔军校或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为争取朝鲜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铺平道路。当时，朝鲜共产主义者杨林（毕士第）、金山等就是在1925年于黄埔军官学校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后者还参加过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和海陆丰苏维埃运动。

不过，朝共党人到中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事例，在此以前尚不多见。只有从1928年开始，原为朝鲜共产党人，在中国参加中共组织的事例才明显多了起来。

1928年9月，旅居上海的朝共党人吕运亨、洪南杓、玄鼎健、金元植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洪南杓曾经是朝鲜共产党自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组

<sup>①</sup> 据考查，当时在上海只有李东辉组织的“韩人社会党”。后来改称“高丽共产党”。

<sup>②</sup> 王维舟：《我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织部负责人。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

1929年初，旅居上海的朝共党人在接获共产国际的前述《十二月提纲》后，便酝酿着各自的选择。一部分人坚持朝共的重建工作（如韩伟健等人），一部分人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被编入中共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

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也已了解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关对于朝鲜共产党决议的原则精神，即朝鲜共产党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没有派别组织的、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统一的党；或者再建无望时，在朝鲜和海外的朝共党人，可以按照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经过重新修订的《共产国际章程》的第2条和第37条款的规定，分别在所在地就近加入日本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党。

下列资料披露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有关处理海外朝共党人的具体意见。

周保中在前述《延边朝鲜民族问题（草案）》报告中说：

1928年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对朝共整个组织作了决定：因派别分歧，是非难解，一律解散。按该规定，在朝鲜内地的党则由日共照顾，在满洲的则以个人资格，经中共简选重新加入中共组织，海内外派别复杂的朝共便结束了。

关于共产国际的这一令朝鲜共产党解散，朝共党人分别在所在地加入日共、苏共和中共组织的决定，应当如何看待，必须作一番历史地考察。

1920年8月4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第17条规定：“共产国际每一成员从一国迁至另一国

时，应受到共产国际当地成员的兄弟般的帮助。”<sup>①</sup>但是，共产国际的每一成员从一国迁至另一国时，同所在国的共产国际所属的共产党的组织关系的处理，该《章程》中却未有明确的规定。到了1924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对上述问题开始有了原则的规定。这一《章程》的第3条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每一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组织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该《章程》第35条规定，共产国际各支部成员移居他国时，必须参加所在地国家的共产党组织<sup>②</sup>。不过，共产国际的这一规定，除少数例外，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支部并未立即予以执行。因此，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在处理由其他国家移居来的共产国际成员时所采取的方式和办法，在20年代的前期和后期便有所不同。

下列一组有关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共党人在旅居苏俄（苏联）和西欧、美国时，如何解决党的组织关系的历史资料，可以对这一问题得到一些了解：

第一种情形：

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共党人，开始时是组织了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共旅莫支部，同苏联共产党不发生组织关系。后来则一律参加了苏共组织，不过，仍然保持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身分。

肖劲光（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回忆说：

旅俄支部是东方大学<sup>③</sup>总支部的一个支部。我们进东方

① 珍妮·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页。

② 珍妮·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

③ 东方大学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简称，亦简称为“东大”。校址在莫斯科，建立于1921年5月。





大学的时候，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没有党员。1921年冬，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等人，他们先转党和我们这些团员组成了旅俄支部。以后我们这些人是陆续转党的。弼时是1922年初转党的，我在他以后，是1922年底转党的。团员转党时要由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支部大会党团员都参加……。旅俄支部早期负责人是彭述之、罗觉、刘少奇、卜士奇等。旅俄支部是东方大学总支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我们是联共（布）党员，同时也是中共党员。发的是联共（布）党证。此外，还有俄罗斯东方少数民族支部、日本支部、朝鲜支部，也都隶属在东方大学总支的领导之下。<sup>①</sup>

著名经济学家张仲实回忆说：

1925年“中大”<sup>②</sup>成立前，在“东大”学习的中国同志成立了“旅莫支部”，直接由我党中央领导，支部书记也由我党中央指定……。“旅莫支部”的特点是抓思想教育多，抓学习少。……听说，努力读书或努力学俄文的同志，都被认为是“学院派”，都要挨批。1925年“中大”成立后，有一些人反对“旅莫支部”的办法。据说有两个理由：其一，是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组织，一个国家的党员到了另一个国家，应该受这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不然，就是享有“治外法权”。这既不合国际主义精神，也不合“国际惯例”。其二，是说中国同志到苏联学习的任务，就是要学习革命思想，如果不是

有系统地啃理论，何必到苏联来呢？结果，“旅莫支部”就给反掉了。从1926年起，中共党员到苏联学习的，就转为联共党员。到“东大”学习的党员，也照此办理。我于1926年11月到了“东大”，进校后一个星期，就给我发了“东大”学生证和联共党证。……在“中大”，情况却不同，中共正式党员都要转为联共候补党员。……像吴玉章、林柏渠、徐特立、何叔衡这些“老”，当时在“中大”也都是转为联共候补党员的。<sup>①</sup>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回忆说：

旅莫支部先在东大成立。1925年中大开办后也成立了旅莫支部。这是从西欧勤工俭学学生中的旅法支部和旅欧支部学来的。旅莫支部对第三国际和联共没有正式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不公开的，但不是不知道……。因为学校中的苏联领导人并不懂中国话，中国党员的党籍联共也不承认……。学校的苏联领导人在了解情况以后，大概经过向联共和第三国际的请示报告之后，就下令解散了旅莫支部。中大的中共党员不论是正式党员或候补党员，新党员或老党员，甚至像俞秀松这样中共发起人，都成了苏共中大支部的一个分支的候补党员，都只发给了一张苏共候补党员证。……当时解散旅莫支部的理由，除了批评旅莫支部不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错误以外，还根据第三国际的一条组织原则：凡是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就参加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和所在地的工人运动，不得另外成立小组织。这条原则好像第一国际和第二

<sup>①</sup> 《肖劲光回忆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114页。

<sup>②</sup> 即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或“中大”，成立于1925年9月。

<sup>①</sup> 张仲实：《20年代赴莫斯科留学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2期，中国革命博物馆1981年版。



国际时代就成文或不成文地存在的。<sup>①</sup>

吴玉章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赴苏，后在东方大学特别班学习，同班学习的有何叔衡、林伯渠、叶剑英等，参加联共为预备党员，后来转为正式党员。<sup>②</sup>

朱瑞述及1926年在苏联学习时加入了“苏少共”，1928年又加入联共党，候补期二年。<sup>③</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外交家伍修权曾回忆，他在1925年去苏联设立的中山大学学习，后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12月在伯力（即哈巴罗夫斯克）参加苏军工作时，由共青团转入苏联共产党。<sup>④</sup>

李伯钊回忆，1928年入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都转入联共党、联共团组织。<sup>⑤</sup>

#### 第二种情形：

在欧洲和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共党人，情形较为复杂。有的人先是直接加入了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有的保持中共党员的身分。不久，中国共产党在欧洲建立了由自己直接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在欧洲各国设立中共旅居该国的小组。原来直接参加旅居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转入“中共旅欧

支部”下属的西欧各国的小组。只有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才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中共党人分别加入了旅居国共产党组织，并被特别编入各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在美国的中共党人同样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但是，无论如何变动，他们都一律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者。

下列资料充分说明了上述情形：

1922年秋（冬）在巴黎成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是以当时的10多个党员组成的（这些党员中赵<sup>①</sup>、周<sup>②</sup>、张申府、刘清扬是中共党员。若飞<sup>③</sup>、延年<sup>④</sup>、乔年<sup>⑤</sup>等是法共党员，熊雄、王×是德共党员，以后根据第三国际规定，照章改为中共正式党员），对外名称是“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是张申府……<sup>⑥</sup>

著名诗人肖三回忆：

在参加这些运动中<sup>⑦</sup>，我们认识了阮爱国（胡志明主席），他曾来过我们住的地方，因语言隔阂，同我们笔谈。后来，他介绍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和我五个人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在巴黎十七区过组织生活……<sup>⑧</sup>

① 孙冶方：《关于中共旅莫支部》，《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见《吴玉章传略》，《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见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④ 见《伍修权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

⑤ 见李伯钊：《我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① 即赵世炎。

② 即周恩来。

③ 若飞，即王若飞。

④ 延年，即陈延年。

⑤ 乔年，即陈乔年。

⑥ 赵世炎：《关于旅欧支部活动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6页。

⑦ 指法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⑧ 肖三：《回忆赴法勤工俭学和旅欧支部》，《“一大”前后（二）》，第515页。





1924—1925年，李富春、蔡畅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西欧存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中共留法组”，又说有“旅欧党团组织”。同时，在苏联存在“旅莫党团组织”。<sup>①</sup>

1927年7月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滞留在西欧的少数党团员，分别加入了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为其“中国语言组”。原来那种独立的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由此不复存在。<sup>②</sup>

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旅德支部转为德共中国语言组。廖承志、王炳南同志相继为语言组的领导者。

九一八事变后，才有英共中国语言组。

美共中国语言组，是在冀朝鼎同志参加布鲁塞尔反帝反殖民地压迫大会，与旅欧总支部发生联系后，才与施晃同志（保定师范暴动的组织者……）、徐永瑛同志组织起来的。<sup>③</sup>

1930年10月……我加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我们的党小组是柏林小组，共有8个人……石厚生<sup>④</sup>……谢用常（谢唯进）……章欣（章文晋）和我……。廖承志和董

① 见阎永雪：《李富春、蔡畅由法国赴莫斯科时间考》，《中共党史资料》第28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王永祥、孔繁丰、刘品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③ 廖焕星：《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一大”前后（二）》，第508—509页。

④ 石厚生即成仿吾。当时是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组长。

璧是汉堡组。<sup>①</sup>

九一八事变后，胡兰畦再赴德国，同年11月下旬路经法国时，法国尚有法共中国语言组，该组书记何以端（何溪畏），还有章伯韬（司马，章伯钧之弟）、曾庶凡、刘树德（林铁）等人。

各国因存在党及中央，所以，同时各国党语言组成员又是各国党员。<sup>②</sup>

从上述资料可见，中国共产主义者和中共党人在苏联、西欧和美国，在解决组织关系的方式方面是不完全一致的，并且在20年代的前期和后期也有变化。这种情况说明：

（1）在20年代前期，或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前，在国内尚未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到苏俄（苏联）、西欧各国后，加入共产党组织都是采取直接加入俄国共产党（联共）和西欧各国共产党的方式；而中共党员到这些国家去，一般地都是建立独立的支部组织（如中共旅莫支部、中共旅欧支部），隶属中共中央，同所在国共产党组织不发生组织关系。当然，个别中共党员同时参加旅居国的共产党组织的情形也是存在的。

（2）在20年代后期，中共党员旅居外国者，除中共中央派驻共产国际、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等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外，几乎一律都参加了所在国的共产国际所属的共产党组织，成为该党的党员。在苏联，甚至中共党员无论新老党员，参加联共（布）时还必须要有候补期。但是，这一时期，各国共产党对待中共党员或其他非本国的共产党人加入他们的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和革命工

① 《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页。

② 《胡兰畦回忆录》，第235页。



作的方式却不尽一致。在苏联，中共党人加入联共(布)组织后，一般是直接参加所在地、所在单位的联共(布)支部的工作和活动，而不再另行单独编组支部。在西欧各国和美国，则凡是参加各国共产党的中共党人，一律编入各国党的“中国语言组”，参加组织生活并参加革命工作。

在20年代后期之所以发生了不同于前期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新的世界革命战略，并且通过了经过修正的《共产国际章程》，各国共产党支部都开始严格履行这一《章程》中的有关条款的规定，处理在本国活动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党籍问题。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的第2条款规定：

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定名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每一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sup>①</sup>

该《章程》第37条规定：

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成员，须经所在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批准，方能移居他国。

共产党员移居他国后，应即加入该国的支部。未经原支部中央委员会批准擅自出国的共产党员，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不得予以收容。<sup>②</sup>

<sup>①</sup>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74页。

<sup>②</sup>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80页。

上述规定，便是通称的所谓“一国一党”的原则。

(3) 待旅居外国并参加所在国共产党的中共党人返回祖国或又迁移另一国家时，各国党又负责照转组织关系。因为《共产国际章程》明确规定了它的“世界性的共产党”的性质，认为“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从而说明，在苏联或西欧加入所在国共产党组织的中共党人，他们既是所在国共产党的党员，同时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者。

从中共党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外参加所在地共产党组织和工作的可见，当时共产国际规定的“一国一党”的原则，后来都为各国共产党所一律执行，并非仅适用于旅居外国的中共党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者。因此，当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接到共产国际关于旅居中国各地的朝鲜共产党人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必须同样按照“一国一党”的原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的指示之后，中国共产党便毫无例外地开始了接受朝鲜共产党人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工作。

## (二) 中国共产党就朝共党人加入自身组织问题进行调查工作

1929—19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处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使旅居中国上海和东北的数以千计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共党人顺利地加入自己的队伍，中共中央和有关地区的党组织都把这一工作当做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即行开始探讨这一工作的进行，以便寻求一种较为妥善的解决方式和方法。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曾于1929年7月，就朝鲜共产党的重建或执行“一国一党”原则，使旅居中国各地





的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讨论。他们一致同意：在中国各地活动的朝共党人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应一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提出建议，认为对待加入中共组织的朝共党人，“应取特别组织的方法”，即建立类似中共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的方式，将加入中共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单独组织起来，参加中国革命工作，并支援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他们还整理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侨居者、朝共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系列资料，一并上报中共中央作为参考。

上海中共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江宇在他起草的关于《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中说：

假使朝共复兴，照一国一党的原则，应当系属中国中央，恐是当然。然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故非一朝轻忽解决的问题，（应由）中国中央和国际代表及朝鲜重要同志们会合一席长时间圆满讨论后决定（的）问题了。

上海中共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书记玉贞在关于《东三省韩侨状况报告》中说：

……而朝鲜党的复兴，还要些时日。假使朝鲜党复兴，照现在情势，这个满洲总局似没有直属于朝鲜党之必要，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编入于中国党的组织，恐是当然。但是照民族的特别关系，虽为中国党的所属，也应取特别组织的方法……①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曾分别派遣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

①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5页。

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兼北京市委书记的金山，和1927年9月加入中共组织并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前朝共党人吴成仑（全光）等作为特派员，经过中共满洲省委，到达吉林等地，同各地的朝共党组织和朝鲜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进行调查工作和有关旅居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征询他们的意见。由于他们过去在朝鲜革命组织或朝共组织中已有的领袖人物的地位和重大影响，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

下面是金山对于这一段活动经历的记述，摘录如下：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sup>①</sup>，朝鲜人获准这种加入，在我们中只有6人（当时在广州有800朝鲜革命者），根据决定，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党指示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内的朝鲜组织，于是我成了它的5位成员之一。<sup>②</sup>

在1926年暮春举行一个会议，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代表朝鲜各党各派的中心联盟——朝鲜革命青年联盟。马上拥有了300名成员。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sup>③</sup>，多半是共产党员。<sup>④</sup>

我到北京后<sup>⑤</sup>，成为北京共产党的书记，同时也是华北组

① 金山于1925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

② 尼姆·韦尔斯、金山：《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第77页。

③ 金山曾被选为朝鲜革命青年联盟的组织委员会委员。1927年又被选为该组织的中央委员。

④ 尼姆·韦尔斯、金山：《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第78页。

⑤ 金山在1929年到达北平，曾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负责人。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织委员会委员……我的特定职务是协调华北和东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一切革命活动，并执行我作为北京党的负责人的职务。

中国党派我到东北去，在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之间进行联系，因为那时候他们了无联系。同时，我也是出席朝鲜革命青年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大会1929年8月在吉林召开。

（在沈阳与中共满洲省委联系人接头后——引者注）我们讨论了我们的事情。主要的问题是朝鲜共产党应当不应当同中国的党分开。我希望东北的朝鲜共产党成为东北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部门，并且尽量密切地一起工作。

三天后，我同一位中国党代表一道前往吉林，出席代表大会，为将来党的工作拟定计划。我们要走80里路，到一个山区村庄去。在那里，我们遇见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张一镇，1926—1927年在广州我已认识他了。

在这次大会上，我们指出并讨论了所有的错误，决定在东北采取一条新的路线，在这条新路线指导下，朝鲜人和中国人将进行合作。我们朝鲜人判定，我们在东北的战斗只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从来不针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或地主，这是一种错误。东北有100万朝鲜农民，他们受到中国封建阶级的压迫，并且多半为中国地主干活。因此，我们决定根据当时在别处的党的一般路线，同中国农民联合，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又领导农村斗争，反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新的“朝中农民协会”。……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条新路线。……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合作和团结的精神却是极好的。我感到惊奇和高兴。我认为，经过许多年时间，派别活动终于克服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朝鲜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它对我有着非常深刻

的影响。……我对朝鲜的信心不可计量地恢复了，而且我前所未有地感到祖国有希望。……

这次代表大会是由共产党人而不是由民族主义者支配的——这是革命觉悟提高的表现。领导人是张一镇、丁公木<sup>①</sup>和马辰穆<sup>②</sup>，他们是广州公社起义的三位老战士——其中张和马两位翌年就因过劳而去世了。

大会和随后进行的讨论结束后，那位中国代表就回沈阳去了。我在吉林多留两个月时间，目的是调查研究当地的各方面情况。

离乡背井这么多年的老农民，像在梦中一样地听我说，但年青人则热切地问怎么办。他们都赞同，指望回到朝鲜去是没有用的，他们一定要在东北打下永久的基础，同日本人进行斗争，为此目的并且为了打破地主制度，同中国的贫苦农民建立同盟。

冬天来临时，我到朝鲜边界上的丹东去，在当地的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

对我说来，丹东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不得不在1930年初离开……回到北京去。<sup>③</sup>

在金山到达吉林省磐石县的同时，吴成仑也到了磐石，他们一同参加了旅居中国的“朝鲜革命青年同盟”的代表大会，进行关于朝共党人根据共产国际决定加入中共并参加中国革命事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当时，在磐石活动的朝鲜共产党ML派的领袖人物马天穆、陈

① 即陈公木。

② 即马天穆，亦名吴海秋。

③ 摘自尼姆·韦尔斯、金山：《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第133—143页。





公木等，过去曾在广州活动过，参加过广州起义。此时，朝鲜共产主义者朴允瑞（朴衡世）也在磐石。他们同中国共产党派来的金山、吴成仑等一起，开展了有关朝共党人参加中共组织的工作，收到显著成效。其中，朴允瑞于1930年3月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此期间，于1930年1月由关内返回东北的中共党员朴根秀（朴凤）等人，也经中共满洲省委派到磐石，参加了这项工作。

下列资料，即是有关他们在磐石活动的记述：

当韩彬一派派人潜入朝鲜国内进行朝共重建活动时，以上海为中心，在关内活动的马天穆、吴圣胤、陈公木、朴根植等人来到磐石县进行活动。

同年9月，ML派在磐石县东响水河重新召开了旅中青年同盟大会。吴海秋（马天穆）代替了原负责人金万善，吴海秋、吴圣胤、陈公木等人掌握了ML派满洲总局的实权。<sup>①</sup>

中共中央还在1929年秋派吴成仑和朴进（镇）到满洲，和朝共ML派协商结合之事。

吴成仑是个活跃人物，曾在东满赤旗团里活动过，1926年去广东，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那时已是中共党员，之后到海陆丰苏维埃，1928年7月到香港，10月潜回上海。他在广东时是朝共ML派中国本部韩人青年同盟的中央委员，当时叫吴咸声。<sup>②</sup>

据此，满洲总局<sup>①</sup>第十次扩大会议（1929年9月20日）作出决定，要求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运动应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运动的一部分重新组织起来。<sup>②</sup>

其实，早在金山、吴成仑等到磐石以前，这里的朝共党人（ML派）便已经同中国共产党组织有过联系，并且对于共产国际的《十二月提纲》和加入中共的问题业已有了酝酿。下列有关这一派的工作委员会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即可从中看到他们工作的进展状况。

对于今后满洲工作的建议：

1. 即须召集大学<sup>③</sup>的大会。

为具体的讨论、决定今后工作的进行方针，为选举新的指导部……即需要召集大学的大会。已由3个月以前起着手筹备之中。对于全体大会时是无论有（否）重要同学<sup>④</sup>（与会时），也需要由省的指导机关指派中国同志来参加指导。

2. 即须召集农民同盟及青年同盟的大会。

3. 即须设置翻译出版部。

……须把中央及省的重要决议案、通告书及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的小册——八七紧急会议告全体同学书<sup>⑤</sup>、六次大会议决案，最近议决案及通告、瞿秋白同志的《三民主义》（特为打破韩人对国民党的信念）等等紧急的译成韩文，

① 指朝共满洲总局（ML派）。

②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ML派）解体宣言》（1930年3月20日）。转译自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满洲共产匪的研究》附录。

③ 大学指共产党，系共产党在反动统治下进行地下工作时常用的代号。

④ 指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用“同学”一词为地下工作时的隐语。

⑤ 原文件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① 梁焕俊：《20年代后期在满朝共党人的活动》，《延边文史资料》第4辑，第6页。

② 《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转引自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译文资料。



遍布满洲各级的同学，务使一一讨论及研究参加中国革命的理论，并努力使理论现实化及群众化。

4. 即须开办短期的政治讲习班。

5. 即须更动指导机关的位置及指导人员的服务地点。

为组织的秘密化，第一需要把大学、中学<sup>①</sup> 指导机关的位置，搬移到吉林或哈尔滨去。<sup>②</sup>

上述文献说明，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工作人员同朝鲜共产党ML派满洲领导机关之间，在寻求合作并使朝共党人参加中国革命运动方面已有成效。

除此以外，中共中央还派遣上海中共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的洪南杓，到东北地区进行同样的工作。洪南杓如前所述，曾经是朝共火曜派的代表人物，担任过朝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据前记日本和朝鲜有关记载，洪南杓曾于1929年6月到吉林参与过“朝鲜共产党重建准备委员会”，开展朝鲜党的重建活动。同年秋，他又到北满的朝共满洲总局（火曜派）所在地，开展工作，并吸收了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关资料如下：

1929年6月，法南区韩人支部负责人洪南杓带中共中央指示，为中韩共产党的结合被派到过满洲。<sup>③</sup>

中共上海朝鲜人支部的洪南杓（李克和），受中共中央派

① 中学指共青团，系共青团在反动统治下进行革命活动时常用的代号。

② 《工作委员会对于今后满洲工作的建议信》（1929年7月），摘自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室有关资料。

③ 《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转引自中共延边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收藏的有关译文资料。

遣来到北满。洪南杓以反日会（反日同盟，即统战团体）会长的身分住在阿城县二层甸子（今玉泉）。他首先把朝共满洲总局内的优秀人士个别地吸收到中国共产党里。但由于没有敞开大门，加入中共的为数不多。<sup>①</sup>

由此可见，自1929年春至同年秋，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的有关规定，为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在准备接纳旅居中国各地的朝共党人方面，主要是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派出工作人员同朝共党人取得联系，听取意见，进行思想、宣传等酝酿工作，为今后正式的和进一步开展这项重要工作，做了一些必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① 梁焕俊：《20年代后期在满朝共党人的活动》，《延边文史资料》第4辑，第4页。





## 四、中共中央、满洲省委关于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的方针和工作原则

### (一) 中共哈尔滨市委代表同朝共满洲总局代表关于临时关系的确定

1929年夏，中共满洲省委获得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朝共党重建和朝共党人在旅居所在地加入各国党的决定的精神。在同年6月—8月便接待了由中共中央特派到东北的金山、洪南杓和吴成仑等人，共同商讨了有关的问题。从此，中共满洲省委即将此项工作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下记资料即可说明：

在农运上应特别与韩国党建立关系。<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即行指示中共哈尔滨市委就近同设在哈尔滨附近阿城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取得联系，进行商谈。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会马上派出市委书记张洛书作为代表，于1929年9月12日前往阿城同朝共满洲总局代表举行会谈。

关于这一接触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在接到哈尔滨市委的报告后，立即向中共中央转抄了哈尔滨市委的有关报告，内容如下：

<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计划（8月中旬—9月底）》（1929年8月2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集，1988年版，第259页。

韩党问题：哈尔滨市委最近报告如下：

阿城（系约定与韩国党接头的地址）洛书于上礼拜六去了一次，与韩国同志见面，但他不是满洲总局的代表，他（们）的代表早已派定，因为我们没去，所以他没来，这次与他约定下礼拜与他们总局代表会见。……他们曾说：满洲总局的第十二（次）大会，决定加入中国党，但是因为同国际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做到。下次会见，洛书想进一步地知道他们的政治路线组织状况，为什么不到韩国本部去发展……再来同他们确定今后工作上的关系，组织上的临时关系，然后报告省委批准。<sup>①</sup>

这一会谈于同年9月15日正式开始。中共哈尔滨市委派出张洛书，朝共满洲总局派出代表是该总局宣传部主任张时雨，双方对话由崔忠浩翻译。地点设在阿城的朝鲜人私立小学校。会谈双方首先各自通报了本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主要是由朝共满洲总局代表介绍了朝共满总过去“多偏重民族独立的方面”，与中国革命运动脱节，因而无法解决业已长期定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所迫切需求的土地问题。同时，朝方代表还向中方代表通报了朝共满洲总局在本年6月12日召开的第十二次委员会会议的决议内容，决定改变自己的政治路线，即“满洲韩共应尽力参加中国党，努力参加中国革命，以解决自己的土地问题，间接解决民族独立问题”。

下列由中共满洲省委于1929年9月24日转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简要地记述了双方会谈的内容：

<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19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集，第308—309页。



我<sup>①</sup>已经与韩共满局代表接见了。他们的代表是满局宣传部主任张时雨，过去在海参崴党校当过教员，另外翻译一人；地点在阿城韩国人学校；时间是9月15日上午10时。阿城韩共负责者石同志介绍后，开始谈话。我先声明中国党是属于国际的一个支部，韩共与国际没有直接关系，中共是执行国际的政治路线；在我们今天的谈话，首先需要知道你们党的历史及派别的纠纷，你们的政治路线及工作路线，对于组织的现状及影响所及的群众，你们对东路事件<sup>②</sup>的分析及任务。现先把同他们谈的几个问题的经过写在下面：

#### 政治路线工作路线

他说中国六次大会决议有许多可供韩国的党参考的地方，国际所决定的口号：“保卫苏联”，“反对大战”，“保护中国革命”，我们是毫无疑问地接受执行。在韩国本部我们革命主要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因为现在中央还没有成立，所以没有很明确的政纲。现在的政治口号不外是争取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自由及最高工时最低工资的规定。韩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口号等于零，革命的动力主要的是工农，但上层小资产阶级还有参加革命的需要和可能，政权的组织形式是工农专政。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但现在还没有成为群众普遍的口号。在满洲的韩共以前多偏重民族独立的方面，自本年6月12日大会决议改变路线。满洲韩共应尽力参加中国党，努力参加中国革命以解决自己的土地问题，间接解决民族独立问题。

① 即张洛书，当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② 即中东路事件。

在此次会谈中，双方同意在最终解决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组织以前，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会同朝共满洲总局建立临时的合作关系，决定统一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在中国革命斗争中采取一致行动。

为此，中共满洲省委将这一会谈的经过和所建立的临时关系问题上报中共中央，请求中央迅速制定“解决韩国党加入中国党问题”的决策，并派遣已加入中国党的得力的朝鲜同志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下列文献即是1929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有关内容：

据闻韩国党从前在满洲有1000多同志。目前省委决定与韩国党的关系如下：（1）双方各派负责代表一人定期会见。（2）出版物及政治通告可交换。（3）在政治路线上需韩国同志执行中国党的路线，如在政治上有不同的意见，即以友党的方式发生关系。（4）在技术方面各就其可能互相帮助（如印刷等）。（5）中国派同志（韩国人）到韩国群众中活动，韩国党须从各方帮助，中国党并提议派一负责的韩国同志参加韩国党的组织及工作，对中国党负责。（6）韩国整个组织加入中国党问题，需经中央及国际的允许。上列各项已由秋<sup>①</sup>、孟<sup>②</sup>到哈尔滨与他们作负责的会见。这件事我们请求中央解决的是：（1）韩国党加入中国党的问题，（2）请中央派一在政治上比较好而诚实可靠的韩国同志来负责。（3）对于上述暂时关系请求批准。<sup>③</sup>

① 秋，即陈潭秋，时任中共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派赴满洲巡视员。

② 孟，即孟坚，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

③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集，第310页。





前述 1929 年 9 月 24 日由中共满洲省委转抄哈尔滨市委有关朝鲜共产党的报告中写道：

先由哈市委与韩共满洲局代表联系，并且确定的关系是合作关系：“今后两方的关系问题：（1）交换政治文件；（2）交换工作意见；（3）发出通讯关系；（4）互派代表；（5）工作上一致行动。”

但对于在东北的韩人，韩共要求“韩人务应写韩侨”，中共代表亦表同意。此事应注意。

不久，中共满洲省委在同年 9 月 29 日给中共中央的另一份报告中写道：

与韩国党的关系：已会见一次，决定了几项办法；关于这问题：

（1）请中央解决韩国党加入中国党问题。

（2）派一得力韩国同志来负责。……

我的意见：

中韩党的关系应重新规定，他们的规定在工作上关系很少。<sup>①</sup>

此后，中共哈尔滨市委便同朝共满洲总局时常联系，以便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或声援朝鲜国内革命斗争中相互配合。例如，1930 年 1 月 2 日在《中共哈尔滨市委致朝共满洲总局》信中说：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 集，第 341—342 页。

指示朝共针对朝鲜内地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事件组织斗争。

第二天，在中共哈尔滨市委给满洲省委的第十二号报告中说：

据说朝鲜内地最近已捕去千余人，关于这一事件，市委曾给他们<sup>①</sup>一封信，同时（将）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日、中、韩民众宣言亦已转去。<sup>②</sup>

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后，十分慎重地研究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及时地作出原则的决定：（1）朝共满洲总局应予撤销，朝共党人按一定手续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2）参加了中国党的前朝鲜共产党人应参加中国革命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应将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工作纳入自己的工作计划。

1929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即将上述决定下达满洲省委。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混战给满洲省委指示》中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省委关于韩国党问题的指示，纠正他们政治上的错误是对的，不过在组织上工作上还嫌不够。关于此点中央上次信中已提及。（1）在组织上，他们满洲总部的组织应当取消，韩国同志个人，经过一定的手续加入中国党，完全在中国党指挥之下工作。（2）在满洲的韩国同志，不应仅仅注意韩国农民群众，而是应注意满洲各方面的工作；在另一方面中共满洲党部应注意满洲全部工作，不应放弃韩国农民群众工作，不

<sup>①</sup> 指朝共满洲总局。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2 集，1990 年版，第 59 页。



应将韩国农民群众的工作，只看作是韩国同志的工作。自然如情形熟悉工作便利，可以派韩国同志到韩国农民群众中去工作，不过这只是工作人才的分配，而不是工作界限的划分。

## （二）中共满洲省委同朝共满洲总局的会谈

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朝鲜共产党自主的重建工作前途渺茫，同时，朝共党人在所在地分别加入各该国家共产党的工作也无大的进展，便指派不久前到共产国际报告朝共ML派在吉林重建朝鲜共产党工作、现正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韩彬，和中共党人李春山一道返回中国，到上海同中共中央磋商在满洲的朝共党人迅速加入中共。

韩彬等二人马上从苏联到达上海，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向中共中央转达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并研究了如何开展这一工作以及工作方针等问题。决定在满洲的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中国革命事业，发展满洲的革命运动，以利于朝鲜的独立和解放。

1930年1月，中共中央特派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苏文同韩彬、李春山一道到达哈尔滨，由中共满洲省委召集旅居中国东北各地的朝共满洲总局及其各派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到会共20余人。会议内容是协商如何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使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共党人尽快加入中国共产党。

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提议解散在满朝共满洲总局及其各个团体，使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中国革命运动，支援朝鲜革命事业”这一“转换革命方向”的重大问题的指示。会上，“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和在满朝共各派代表大部分人表示赞成”。

但是，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的主要负责人金灿等少数人在会

上却表示不同意共产国际的上述提议，“坚持认为应支持在满朝共党人直接参加朝鲜革命，支援中国革命”的主张。这种意见，在会上遭到与会各派朝共党人的激烈反对。

有关此次会议的具体情况，可见下列资料：

昭和四年（1929）10月，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的朝鲜人韩彬和中国人李春山二人，接受第三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到达上海，同中共中央密商，决定在满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实现满洲的赤化。翌年1月，中共中央派中国全国总工会常委苏文同他们一起到哈尔滨，召集中共满洲省委干部14人和在满朝共火曜派、ML派、重建派等高级领导人和宣传员10余人，举行在满中朝共党人联席会议。会议提议解散在满朝共满洲总局及其各个团体，使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中国革命运动，支援朝鲜革命事业，提出了转换革命方向的必要性问题。对此，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和在满朝共各派代表大部分人表示赞成。但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责任书记金灿等二三人表示反对，坚持认为应支持在满朝共党人直接参加朝鲜革命，支援中国革命，否则就是违背朝鲜共产党的纲领和主义。会议经过争论，临散会时，火曜派满洲总局干部张时雨等和重建派领导人尹滋英、朱健，ML派的韩承牛、朴允瑞，高丽共产青年同盟金基洛等人，认为总局责任书记金灿的主张是他的一派或他个人的主张，而不代表满共总局全体成员，表示反对他的意见，并发表了在满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直接参加中国革命为宗旨的声明。由是，同年2月，总局干部分为两派：金灿一派继续其总局的原有主张；张时雨、尹滋英、韩承牛、朴允瑞等另一派则不承认满洲总局，开始着手进行在满各派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的宣传工作，要求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进行革





命活动，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建立各级地方党部，在哈尔滨、间岛、吉敦路沿线各地发动暴动，表明在满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的决心。<sup>①</sup>

关于旅居中国的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革命的问题，并不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而是由朝鲜共产党及其在中国的上海总局、满洲总局的现状和共产国际所决定的。当时，朝共中央及其设在中国的上海、满洲两个总局，因多次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其严重的破坏，组织完全陷于瓦解，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和战斗的集体，已如前述。同时，以朝共满洲总局为例，该总局机关虽存，实际却已解体。原来的满洲总局已由朝共火曜派把持，朝共其他各派也都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导机关。各派之间，以至各派内部，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不但时常发生斗殴现象，而且甚至相互间还发生“暗杀与告密”<sup>②</sup>，借敌人之手损害对方的现象。朝共的现状表明，它业已名存实亡。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令其解散重建。后来，又视依靠现有在朝鲜的和海外的朝共各个小组织重建朝共组织为不可能，便又决定按《共产国际章程》中有关“一国一党”原则，令朝共党人分别在所在地加入各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便是按照共产国际的上述决定，开始接纳朝共党人的。

当然，朝共党人旅居中国东北和关内，不同中国共产党组织发生联系，不参加中国革命斗争，专门从事朝鲜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众所周知，在中国东北的朝共党人，

除少数职业革命家外，绝大多数党员是身居东北的朝鲜农民，他们业已长期定居东北，同其他在东北的朝鲜农民一样，业已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他们不但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双重民族压迫，而且，因长期不拥有土地所有权，遭受加倍的封建剥削，痛苦不堪。他们希望祖国朝鲜早日独立，民族早日解放。不过，他们首要的却是迫切地要求在现居住地——中国东北，解除现时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和中国军阀的民族压迫，同中国农民一样取得土地所有权和土地，解除沉重的封建剥削。为达到这一目的，旅居中国的朝鲜农民仅仅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则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必须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农民及其他革命群众一道，参加旨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求得人民民主、民族平等和“耕者有其田”的斗争。中国革命事业早日成功，才能获得最终的解决。正如前述，金山在访问过的吉林农民中的一些朝鲜农民和革命青年时所得到的回答一样，他们认为，“指望回到朝鲜去是没有用的，他们一定要在东北打下永久的基础，同日本人<sup>①</sup>进行斗争，为此目的并且为了打破地主制度，同中国贫苦农民建立同盟”<sup>②</sup>。金山出席在吉林磐石召开的朝鲜革命青年会议，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我们朝鲜人判定，我们在东北的战斗只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从来不针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或地主，这是一种错误。东北有100万朝鲜农民，他们受到中国封建阶级的压迫，并且多半为中国地主干活。因此，我们决定根据当时在别处的党的一般路线，同中国农民联合，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又领导农村斗争，反对中国的统治阶级。”<sup>③</sup>

① 《在满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的经过及其状况》（1930年9月18日日本驻局子街领事馆副领事田中给币原外务大臣的报告），摘译自日本外务省资料 SP100。

②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陈德森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月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141页。

① 原文如此。意同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

② 尼姆·韦尔斯、金山：《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第142页。

③ 尼姆·韦尔斯、金山：《在中国革命队伍里》，第139页。





因此，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共党人如果不参加中国革命斗争，将会严重地脱离长期定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广大朝鲜农民群众，势必也影响到多数朝共党人的积极性和斗争的持久性。事实上，在东北的朝共党人同在东北的朝鲜独立党人一样，已经日益成为很难得到朝鲜农民支持的小组织。这是身在中国东北的朝共党人及其组织长时期以来所面临的一直无法解决的矛盾和危机。

所以，1930年1月在哈尔滨召开的上述会议上，旅居中国东北的朝共党人各派代表的多数人和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均同意解散在满朝共总局及各个团体，使其成员加入中共组织，直接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同时支援朝鲜革命事业。唯有朝共满洲总局（火曜派）的少数负责人等坚持“在满朝共党人直接参加朝鲜革命，支援中国革命”的立场，并且理所当然的被会议上的大多数人所否定，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不久，他们也只好放弃了这种主张。

当然，旅居中国的朝共党人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后，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身分。他们中除了已经决意永不离开中国，并且将自己的命运同中国革命事业永远联结在一起的共产主义者以外，他们在中国时，按照《共产国际章程》有关规定，参加中国党并参加中国革命斗争；同时，还要继续为朝鲜的革命事业和祖国的独立事业而斗争。中共党人在苏联和欧美各国学习和工作时，参加了各该国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工作，他们原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也并未放弃，他们仍然关心自己祖国的命运、支持中国革命的事业。何况，中朝两国国界相连，在中国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和中国封建军阀的统治，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民主制度的斗争，必将直接和间接地削弱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统治势力，有助于朝鲜的革命事业，为朝鲜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准备条件。

事实上，前述朝鲜共产主义者金山等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中

共党组织并未限制他继续参加朝鲜革命组织和为朝鲜的革命事业奔波。甚至在1936年8月，当他被“朝鲜民族解放联盟”选为中央委员后，还前往延安成为被中共中央所承认的该组织驻中国西北苏区的代表。

1930年1月的旅居中国东北的朝共党人各派代表参加的哈尔滨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为在东北的朝共党人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波折还是存在的。

此次会议后，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的少数领导人又经研究，于同年1月30日向中共满洲省委提交了一份《朝共满洲总局报告》。这一《报告》由林山交到中共满洲省委，继续陈述意见。纵观《报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下述两个问题上：第一，说明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再次举行扩大会议并一致决议：认定满洲的朝鲜人运动，乃是全满运动之一部分，并且包括在中国全部革命运动之内，因此应当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要求仍然暂时保留原有在满朝共全部组织，并使其成为中共组织的一部分组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同时，朝共组织还要派出代表参加中共领导机关，参与指导满洲革命运动。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要求在东北地区继续保留朝共组织，实行中共组织与朝共组织的合作，共同从事中国革命运动。

下面将林山交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朝共满洲总局报告摘录如下：

在满洲朝鲜人的实况，如上所述的复杂。所以，马上把全满洲朝鲜人特殊的运动及组织急激解散是不可能的。那么，以为如是而持续像现在的独立状态吗？那是更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先从党问题要解决，原则上满洲朝鲜人的组织，是应





当归管为中国党部的一部分。<sup>①</sup>

我们对中国中央提议的见解：

满洲朝鲜人运动，既不是孤立的、排他的、不能做下去的特殊的运动，乃是全满洲运动之一部分，而且是中国全体运动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最近满洲的情势（过去的民族对立显著的转变（为）阶级的对立）更明显的、具体的证实他。自中东铁路瓜分发生以来，我们便痛切地感觉着。

那么，会后我们应采取的方针如何？我们接到中国中央的提议后，即召集满洲总局的扩大委员会讨论之结果，全体委员对于“认定满洲的朝鲜人运动，乃是全满运动之一部分，包括在中国全体运动之体系内。那么，终究应当受中国组织的支配”的见解，一致可决。其他主要的讨论为关于时期及方法之问题：

有一部分的见解是“在最短时期内，把从前的组织根本更换，是由现在的情势上不可以的。那么，暂时对于党问题，应依照去春在赤色国际所决定的方法，暂时保留固有的组织，而由中国、朝鲜、日本所派代表组织起来联合委员会，以实行广泛斗争和解决全满洲的问题”的主张。对于这个见解，大多数的主张是以为组织联合机关来指导，则不免头绪繁多，耽误日期，又因种种的关系，指导不能敏活。既认为满洲运动是中国运动之一部分，无须经过如此繁杂之手续，而即将全体组织不妨归中国组织直接指导之下。

其次讨论的是关于改造的方法及时期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時候，最有力的见解，是暂时在中国组织之下，须要有改组的特别组织——如临时委员会。因为如上边所说，在没

到某一定时期以前——中国同志明了朝鲜人里面的实际情形以前——满洲朝鲜人的斗争，事实上还是不可不由朝鲜同志去指导。须中国同志对于朝鲜人内部的情（形）要有详细的观察及彻底的理解，同时朝鲜同志对中国的运动，亦须要有十分明了的。由如此情形看来，急激的改组却不是容易的。那么，我们同志参加中国组织之内，进行改组，同时须先要设一研究朝鲜人事情的专门的临时机关。

但对于这个见解的大多数解释，是从今着手组织起来，一到改组完了，须费相当的时日。我们从今着手研究讨论中国事情，中国同志从改组及改组以后，也可以研究朝鲜事情。如我们参加中国组织的指导机关，则也可没有什么障碍，那么无须经过临时的组织而延长时日的必要。只有东满在特殊情形之下，不可不考虑的，和只以朝鲜人既成的现在所有的表面团体，在短时期内不必解散。除会说中国话，在中国工场、矿山、学校的同志和可以做中国方面工作的同志以外的下级组织，是暂无须混合之必要。对于这个解释，全体委员的意见一致，并没有异议。

最后决定的见解如下：

依照中国中央的提议，须在短时期内，将我们的组织改组为中国组织指导之下的组织。但现有的农民同盟、青年同盟等的表面团体，是暂时不必解散（第一步我们同中国农民及青年群众，要展开广大的共同斗争，同时扩大的宣传：（1）满洲运动为中国运动的一部分；（2）中国劳农革命成功之前，不能得到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由满洲的现在的情势看，朝鲜人在中国革命中部分的任务非常重大。因满洲处于特殊情势之下，依照中国方面的提议，朝鲜同志须参加于中国组织的指导机关中，暂时除在中国工场、矿山、学校的同志，和懂得中国话并能作中国方面的工作的同志以外的下级

<sup>①</sup>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1930年1月3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集，第395页。



组织，不必混合。由各方面的情势看，东满四县仍归朝鲜党部直接领导，而与南北满运动须要有特别的联络。满洲运动的指导机关，虽必属于中国组织的支配，但由特殊的情势而看——满洲为中、韩、俄、日四民族杂居的关系上——指导机关应参加韩、俄、日的同志来组织，以促进在各族中的阶级分化和联系各民族间的阶级团结运动。这一段是我们满洲总局扩大委员会决定建议中国中央的议案。

同时，附带的决议：（1）将中国中央对我们的提议，及我们对于该提议的态度和其他附带的详细情形，报告于朝鲜中央，请予批准。（2）为与中国中央详细讨论一切对于今后满洲运动起见，决定派△△同志前去接洽。（3）即将中国八七会议及以后到最近的各重要决议案，译成朝鲜文出版，颁与各地党部及每个党员，讨论研究中国的事情。（4）指令各地方党部，急速编制地方同志的详细调查表（特别查明同志中会说中国语言、会写文章的数目和在中国产业机关及其他同志数目等等）。（5）准备改组的各种事务，暂委满总常委执行。<sup>①</sup>

### （三）中共满洲朝鲜群众组织党团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的方针的确定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共满洲省委也派出了东北代表团前往参加会议。代表中的李青是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当时是满洲朝鲜

<sup>①</sup>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1930年1月3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集，第395—399页。

群众组织中的中共党团的成员。他在同年6月22日，代表该党团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在满洲朝鲜人组织的报告》一件，认为中共满洲省委吸收几名前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组织，没有通知该党团，是妨碍了该党团统一“执行关于韩人入党”和“指导韩人革命斗争”的工作。建议应成立朝鲜人特别的机关，隶属于中共满洲省委，由这一“朝鲜人特别的机关”统一解决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组织问题和指导朝鲜人在东北参加革命斗争。同时，建议这一“朝鲜人特别的机关”的人选，仍应任用前朝共党人。

现将李青的《报告》录下：

今春3月初，由中央派几个同志来到哈，推定江宇、李振民、李青、全光等同志组织了领导全满韩人的党团，同时给他们几件策略，是把全满韩人的团体或个人，劝诱加入互济会。

马上开始群众的革命斗争（如反帝，农工斗争，青少年、妇女运动等），提高一般的政治意识。

排出韩人反动团体的首领名单，吸收一般的青年群众。

党团同志们，依准以上的策略，努力党的发展及领导群众的斗争（如阿城的农民斗争），成立在满韩人反日同盟，自北满一直到东满（间岛）已经成立了十数个支部，开始了以前没有过的激烈的反日斗争（在五一示威时，破坏了在哈日领署，打杀了日探乐某等）。而且对于党的发展，把各种斗争中勇敢的青年介绍入党，已经成立了许多的支部，党的发展在质量上有一跃千里之势。寂寞无闻的北满地方，爆发了革命斗争，狂风怒涛似的高涨起来，使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豪绅们发抖。但是南满呢？比不上北满情形。本来在满韩人情形很混乱的当中，又有我们管不着手的事情发生。即今春以来满洲省委把曾在上海由党除名的几个投机分





予与其他三数人加入党内，以后（又）没有指示过，没有通知过我们的党团同志们，而他们依然散在磐石县一带，做了桌上空文的文字运动，而没有一点实地的斗争，完全出于机会主义的路线。那么我们哪能发挥党员的本能，哪能统一在满韩人的革命斗争？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党没有通晓我们很复杂的情形而招来的错误。所以把在满韩人的政治的局面大略列于下面，以资参考。

本来满洲内，有三个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是原有“朝共”的满洲总局（由国际承认过）。第二是1926年的“朝共”破坏之后，同时“满总”亦受破坏，几个投机主义辈，乘机野合了各派的首领辈（即所谓七七派）篡造了“朝共”及“满总”（由国际没有承认过），散在于吉林磐石等地，假装了革命的面具，没有一点的实际斗争，做了桌上空文的文字运动，而欺骗群众，捣乱地方。因此，在于同样情势下的南满地方，寂寞无声，而没有过革命的声浪。第三是在海参崴除名出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十数人，1929年由上海到满，滥称“朝共”再建设委员会，而住了吉林城的一隅，以各种怪术欺骗社会的耳目，欺骗群众，助长派党的行动，而在满韩人的情形很乱七八糟的。

我们想，如此极混乱的在满韩人的政治局面，把他任其自由，一定将来也没有统一的一日。那么我们怎么办？如果不把格外的方法指导他们，很难（取）得成功的。所以我们党团同志们提出下列几条意见，要解决重要的问题，望须从速指示一切，统一将来在满韩人的政治斗争是盼。此请，中央兄鉴校

6. 22 李青 谨启

左开<sup>①</sup>：

一、对于在满韩人的组织问题，因为言语、习惯、风俗的不同之关系，成立特别的机关，直隶于省委，或称韩人总局或称民委，而指导全满韩人的革命工作。

二、规定机关的任务，即执行关于韩人入党的问题，指导韩人革命斗争（如反帝、反日、反国<sup>②</sup>、农工斗争、青少年、妇女运动等）的问题，关于韩人反动团体对付的问题等。

三、机关工作人选的问题，任用原有的党员。

同年6月29日，中共中央针对李青以及朝共满洲总局少数人的报告中表露出的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共党人的思想状况，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十分明确的指示。中共中央在这一指示中，除通知满洲省委，中央业已当面批评和说服李青外，关于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党的方针和原则的阐述，比较以往的历次指示，都更为明确无误。现将这一《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有关的内容摘录如下：

## 二、关于满洲韩国同志加入中共的组织上的问题和他们中间派别纠纷问题

中国党承认韩国同志加入，只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即是，不承认韩国党过去一切派别小组织，因此不是团体的加入，而只是个别的加入，不是凡是从前韩国党员都可以加入，而只是承认中国党的党纲党章，服从中国党的领导，不仅口头上如此，而且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来才可以加入。

<sup>①</sup> 原文为自上而下的竖写方式，自右向左排列。故以“左开”表明将陈述下文之意。

<sup>②</sup> 意指反对国民党政权。



加入了中国党的韩国同志便是中国党员，并不是在中国党内有什么韩国同志的独立特别组织。按照组织系统，编入各地支部，在没有中国同志的地方，韩国同志的支部一样受各级地方党部指挥，并没有什么特别机关来管理韩国同志。党团的组织只是在非党的韩人团体中起党的领导作用的组织，满洲的党团无条件的是应当在满洲省委指导之下，各地党团应当是在各地方党部指导之下的。党团绝不是党内（一种什么）特别组织，省委下的少数民族委员会（是省委本身的）一部分，它与党团绝不是对立的東西。

出席苏代（会）的韩农代表李青同志，向中央提出三个要求：一，“对于在满韩人组织问题，因为言语习惯风俗不同的关系，成立特别机关，直隶于省委，或称韩人总局，或称民委，而指导全满韩人的革命工作”；二，“规定机关的任务，即执行关于韩人入党的问题，指导韩人革命斗争（如反帝、反日、反国<sup>①</sup>、农工斗争、青少年、妇女运动等）的问题，关于韩人反动团体对付的问题”；三，“机关人员人选的问题，任用原有的党员”。

同时他们说出省委承认了几个曾在上海被开除了的韩（人）入党，和省委不明白韩人复杂的情形等等作为要求的理由，我们认为这些要求完全是不合理的。

第一，他们把在满非党的韩人组织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混而为一，事实是想保存在中国党内韩国同志独立特殊的组织。这是不合乎我们承认韩国同志加入的原则的。

第二，他们想把党团变成特别的党的机关，如果他们不是不懂得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团与党的关系，那末他们就是某一派想把持着党团排挤另一派，继续他们小组织派别的斗争。

<sup>①</sup> 指反对国民党政权。

我们认为这是极严重的组织问题，除了和李青同志面谈时严格指出这些错误外，还认为必须写这封信给你们，希望你们根据上述的原则纠正这一些错误，解决他们的一切纠纷，根据正确的路线发动斗争。

1. 确定党团与省委的正确关系。

2. 极严格地按照原则吸收韩人入党，特别要注意行动上斗争中的表现。

3. 消灭韩国同志中派别小组织斗争，特别是斗殴等形式，并防止加入中共后他们继续小组织活动。

4. 不能积极斗争，不放弃小组织成见，绝不能让其加入，已加入者亦须开除。

韩国同志中历史上派别斗争情形复杂，所谓一二三派，其间是没有是非的，所以在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必须特别审慎，不仅听他们话，而主要是看他们行动与斗争中表现如何，绝不可听某一派的话以为根据。解决的情形如何，望你们以后有详细的报告。<sup>①</sup>

中共中央在上述指示信中，关于旅居东北的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原则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点：第一，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党只能个别地加入，不是团体地加入，即只能吸收那些承认中共党纲、党章，参加党的工作，符合中共党员标准的人入党，而且重在表现。并非所有前朝共党人都能加入中共组织；第二，加入中国党后，即行编入各地基层支部，同原有中共党员一起工作，共同战斗，而不单独成立朝鲜同志的特别组织，也不设立专门管理朝鲜同志的特别机关；第三，中国共产党不承认前朝共党的任何派别组织，反对宗派主义和派别斗争，决不允许党的

<sup>①</sup> 杨昭全等：《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46—748页。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某些组织由一派把持而排斥另一派的现象存在。

中共中央为什么规定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党,只能个别加入,而不允许团体加入?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所担负的任务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战斗的司令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同共产国际这一各国共产党的联合团体不同。为了保持它的先进性、组织性和战斗力,同其他各国共产党一样,对于凡要求入党者,必须承认中共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并且个别履行入党手续,经过支部大会的审查和决定,认定符合中共党员标准,经过相应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和一定的考查候补期,才能成为党员。因此,不能允许以任何的团体方式加入。此其一。

当时,朝鲜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机关、上海总局、满洲总局等业已完全解体,朝共在中国各地(包括东北地区)的组织实际上都是派别组织,已经不能保持它的先进性和组织性。中共不能承认任何朝共的派别组织,否则将会造成党中有党的现象,使党失去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和战斗力,陷于组织瓦解的危险。因此,中国共产党还从没有允许团体加入自己组织的先例。此其二。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党员旅居外国学习或工作,曾经有过加入所在国共产党组织的现象。但是,他们都是以个人身分加入,而非以中共组织的身分实行团体加入。否则,接受中共党人的各国共产党也是不允许的。中国共产党吸收旅居中国的朝共党人加入自己的组织,当然也不能例外。

关于朝共党人加入中共后不成立朝鲜同志的特别组织,也不设立专门管理朝鲜同志的特别机关问题。共产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基层支部并在其中工作,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对自己党员的起码要求。基层支部通常都是按党员所在的产业或部门设立,如在每一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和学校设立支部,便于党员共同工作、战斗。因此,不按民族差别设立支部,

否则将会造成组织上的混乱,无法开展革命工作。至于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欧美国家共产党因各国共产党人的加入而分别按语种划分设立的各个“语言组”,以及在数量较多的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组织以前,于1926—1929年曾经在上海设立的“中共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等现象,则是因为他们人数较少、居住地较为集中、语言隔阂等而暂时设立的。而且,它们又都是基层支部性质,归区委以至县委、市委的层层管理,并非超支部的特殊组织。既然中国党内不允许设立朝鲜同志的特别组织,当然也无须设立专门管理他们的特别机关了。当时,旅居中国各地的前朝共组织和党员,其中不少早已形成派别组织和染上派性,如果将一地、一部门的朝鲜同志单独组成特别组织,或设立专门机构予以管理,势必无助于克服或解决他们之间的派争现象,甚至出现这些专门管理机关有被某一派所把持而排斥另一派的可能。这种状况势将造成党内有党的混乱状态,使党组织无法形成一个集中统一的战斗集体。

当然,关于不单独成立朝鲜同志支部问题,这是根据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具体情况所作出的规定,并非绝对不可改变。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对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派别斗争问题,更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各国共产党通用的组织原则,并非中国共产党的独创。共产党不是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也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俱乐部,而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觉悟的部队,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它是服从统一领导、指挥和纪律严明的战斗集体,决不允许党内存在任何派别和引进派别组织,损害自己的组织肌体。中国共产党自接受共产国际决定、开始接纳朝共党人之初,便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调查了解,深知朝鲜共产党之所以最终陷于瓦解状态,除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的野蛮残酷的镇压之外,其自身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派别组织林立和相互斗争、自相削



弱，则同样重要原因。因此，不能不引以为戒，不能不采取预防措施，坚决反对朝鲜共产主义者中的宗派主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反对自己队伍中的宗派主义的优良传统。

## 五、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 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列

### （一）中共满洲省委为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组织进行的工作

#### 1.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宣言》的发表

1929年末至1930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东北各地相继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它是东北地区各阶级、各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组织。在此前后，在满朝共各派也都各自成立了朝鲜反帝同盟组织。1930年3月，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协助下，朝共党人各派代表在吉林举行联席会议，经协商一致同意决定组建全满朝鲜人反帝大同盟筹备会，共同开展反帝斗争。

同时，中共中央派遣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朝共党人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哈尔滨组成了领导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各种革命团体的中共党团组织，并指定江宇（洪南杓）、李振民、李青、吴成仑（全光）等人为该党团成员。这一党团组织在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主要的任务是动员在东北的各种朝鲜革命团体、民众组织加入反帝同盟和革命互济会，共同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救济被迫害的或被捕入狱的革命者和被难家属。

同年3月中旬，在中共满洲省委的主持下，在东北的朝共党人各派代表，在吉林再次举行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落实本年1月哈尔滨会议的决定，撤销原有朝共各派满洲总局组织，正式开展吸收朝共党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关于这次会议情节有如下记述：

同年<sup>①</sup>3月中旬，在吉林省城召开了东北地区中、韩共产党联合执行委员会，研究了有关合并的具体方案。<sup>②</sup>

随即，同年3月20日，朝共ML派满洲总局首先发表了《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宣言》。全文译载如下：

全满的工人、农民诸位！

全满的共产主义者同志们！

我们在此代表党内430名党员全体的意愿，向亲爱的诸位宣布如下宣言：一直就是我们唯一的组织“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从此革命地解体了。

诸位同志！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是1926年春当朝鲜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支部时，由中央委员会在满洲组建的。此后的5年间，满洲总局在党组织的指导下，英勇地和步调一致地向凶恶的反革命白色恐怖的暴力镇压实行反击，始终一贯地忠诚地坚持了革命的斗争。由于日中统治阶级及民族法西斯蒂（××、×××、×××、×××<sup>③</sup>）等一伙反动势力的进攻，付出了近200名入狱、31名战死和其他不少的牺牲。在此种情势下，满洲总局仍然坚持同资产阶级、地主强盗般的压迫剥削相对抗，申张工人、农民的真正利益，并且为其最终的胜利和当前的利益，能够比任何人都更彻底地代表他们

进行了斗争。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在满洲的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党自身的布尔什维化不够成熟，也犯过不少历史性的错误。在活动中总伴随着宗派主义的偏见，对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在同国民府、韩族联合会等民族法西斯势力斗争时，未能使之与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地主）的斗争联结起来，尤其是当去年强夺中东铁路战争爆发时，未能发动拥护苏联的群众斗争等等，都是这种错误中的重点。

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朝鲜共产党的组织延伸到满洲，同中国共产党公然并立，坚持民族的组织”。我们觉悟了，就必须明白地予以承认。因此，绝对地承认这一错误的事实，坚决地为抛弃它而斗争，应是我们现在的最紧急的任务。

诸位同志！共产党的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组织，一向是以“一国一党”作为自己的原则的。只有如此，才能保障从最初到最后夺取决定性的胜利。

而且，满洲是半殖民地，是中国之一部，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在满洲的朝鲜工人、农民，为了能继续居住在满洲，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资本家、地主、高利贷者的无限制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的遭遇之所以如此悲惨，决不是由于他们是朝鲜人，而是因为他们为工人、农民才处此悲惨境地。他们的这种不幸，绝非他们所独有，中国的工人、农民也同样遭此不幸。在此种条件下，在满朝鲜劳苦者大众，如欲使自己从这一凶顽的资本家、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夺下解放出来，仅靠“朝鲜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道理是最为明显的了。与此相反，他们只有通过中国土地革命的胜利，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这种必要的认识也更加清楚了。因此，在满朝鲜工人、农

<sup>①</sup> 1930年。

<sup>②</sup> 《满洲共产主义运动概史》，满洲东亚出版社油印本，转引自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有关译文资料。

<sup>③</sup> 因所指责的人物不确，故从略。



民同中国工人、农民之间没有牢固的团结是不行的。在中国，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政权，为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不进行共同的斗争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在满朝鲜工人、农民大众唯一的斗争途径和解放道路。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上，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不按一国一党的原则，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是行不通的。所以，从朝鲜延伸来的各派组织必须彻底解体。我们并非从来没有这种觉悟，特别是我们主张过直接参加中国革命，我们从1927年以来，对朝鲜延长论举起过反对的旗帜。那可是极观念性的，反对朝鲜延长论也是从“朝鲜共产党运动的特殊地带满洲”这种说法的规定下出发的。我们没有觉醒到自己组织应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环。其结果，必须在同一旗帜下集合起来的中国、朝鲜共产主义者，在组织上依旧继续分裂下去，使唯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实际上处于分散状态，从而造成本应团结一致的中国、朝鲜工农大众之间，存在着民族隔阂和国民偏见。特别是最近在满洲频繁发生的城市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农村朝鲜农民的抗争中，未取得均衡的发展，显示出最大的缺陷。

因故，最近在满洲随着客观情势的紧迫和对运动内部发展要求的加强，以“民族区别”的组织，以朝鲜延长为原则的组织，业已没有存在的余地，现已陷入全然不能前进的停滞状态。

据此，满洲总局第十次扩大委员会议（1929年9月20日）作出决定，要求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运动应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的运动的一部分重新组织起来。我们应继承这次会议的根本精神，依据全体党员的热切要求，解散我们的组织，开始向着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重新组织起来的既成事实前进。

诸位同志！在满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不能不实行转

换了。在此严重关头，我们看到了如下的各种论调正在抬头。

一是时间尚早论。即是说，在朝鲜未重建共产国际支部以前，不必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在满洲的势力微弱，现在加入不利。如果真像他们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微薄，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我们就负有予以扩大加强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反而把它当成反对的条件，其结果会犯机会主义错误。而且，在满洲已有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情况下，就是在朝鲜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任何影响。这种时间尚早论的主张，除了是机会主义的盾牌之外，别无他物。

二是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继续尽可能地保存原有组织。这是未抛弃以民族为区别的资产阶级观念的非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我们对这种反动的理论，不展开无情的理论的政治的斗争是不行的。同时，我们的一切事业都要无条件地交给中国共产党，所有的共产主义者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严格的战斗的检阅和审查，各自以个人资格加入它的队伍，撤销原有组织。在朝鲜没有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又不提携任何一派的情况下，我们不采取这种方针，通过严格的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行不通的。

诸位同志！分属各派的共产主义者诸位！我们用如下的口号，向诸位发出布尔什维克的前进号召，望诸位果敢地响应！唯有这一条是诸位前进的途径和必须采取的态度。

一、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从朝鲜运动中脱身出来！

一、放弃从朝鲜延长来的组织！

一、解散各派组织！

一、以个人的资格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用斗争支援朝鲜革命！

一、在满朝鲜工人、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





能获得解放！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  
1930年3月20日<sup>①</sup>

朝共ML派满洲总局能够较快地宣布组织解散，是长期充分酝酿的结果。如前所述，一些曾参加中国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朝共党人，在这些斗争失败后，为躲避反动势力的迫害，从南方到达了东北。他们对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曾经寄予过很高的期望，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为祖国朝鲜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光明的前景。中国革命暂时失败，他们又来到中国东北地区。这里是其中的一些人过去活动过的地方，他们准备在这里继续寻求出路。不过，他们参加中国革命队伍的时间虽然短暂，却了解到中朝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中朝两国革命者并肩作战对于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争取朝鲜独立的事业将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们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这支队伍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及他们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革命气概。因此，这些朝共党人到达东北后，毫未气馁，仍然积极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这些人的主要代表有马天穆、陈公木、张一镇等人。此外，还有来自苏联沿海州的朴允瑞等。

不久，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金山和吴成伦等，被中共中央派到上述朝共党人集聚的地区——吉林省磐石一带，开展对朝共党人的宣传动员工作。因而早在1929年9月20日，朝共ML派满洲总局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便决定参加中国共

<sup>①</sup>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宣言》，转译自《满洲共产匪的研究》附录（一），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

产党和中国革命运动。随后，朴允瑞、陈公木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当1930年3月在东北的朝共各派代表在吉林举行的前述联席会议，作出关于撤销朝共各派满洲总局组织的决定以后，朝共ML派满洲总局便立即发表宣言，予以响应，正式宣布该派满洲总局解体，要求“所有共产主义者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严格的战斗的检阅和审查，各自以个人资格加入它的队伍，撤销原有组织”。

当时，全东北的朝共ML派满洲总局所属党员共有430名，不久即将全部名单交给了中共满洲省委，接受审查。

中共满洲省委随即向中共中央发出报告，现摘录如下：

韩国党的ML（派）已找到，他们有430个同志，即时可加入中国党。满洲总局手续即可移交省委，省委组织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管理韩人工作。<sup>①</sup>

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执行《共产国际章程》中规定的“一国一党”原则，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作，也比较迅速。早在1929年6月，该派满洲总局在阿城海沟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便制订了在满朝共党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的新路线。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指派专人对朝共ML派进行工作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便派人并指定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和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代表进行对话，达成建立两党临时关系的协议。这一派，仅在中东铁路的哈尔滨至绥芬河路段的道南、道北地区，便有党员300余名、团员380余名。不久，中共中央派遣已经加入中共组织的前朝共党人洪南杓到北满对火曜派进行工作，并陆续发展了一些人

<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三十四号报告》（1930年3月2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集，第283页。



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参谋长的许亨植（李熙山）等人，就是这时由朝共党人加入中共组织的。后来，因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的实际领导人金灿等人的思想不通，这一派的满洲总局的撤销被拖延下来。

关于在东北的朝共火曜派的现状在前述 1929 年 9 月 24 日《中共满洲省委转抄哈尔滨市委对韩国党的报告》中说：

满洲总局之下，有东满道北满道，统共党员 300 余人、团员 380 余人、农民组合 4 000 余人、青年会 2 万人，（中）东路沿线大部多半有我们的组织，各处韩人子弟学校大多数都是我们的机关，现在国民党完全给我们封闭，我们机关经费皆受影响。韩国独立军本是民族主义者所组织，分散于南北满，有武装 500 余，还有徒手的所谓在乡军，集中队伍 300 余人在韩满交界之山中，时常到韩国内地去杀日本警察官吏。他们的军事技术训练很好，并非常勇敢，我们在里面已有相当的工作，内部有主要分子与我们有联系。

但是，朝共火曜派满洲总局机关的不少成员和各地区组织中的许多朝共党员，却不同意火曜派满洲总局中的少数领导人的消极态度，急切地盼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以该派东满道委员会及其所属朝共党人最为积极。这是因为，1930 年 2 月，中共满洲省委便派遣在省委秘书处工作的中共党员王耿（朝鲜人，亦名文碧涛，不久前由苏联共产党（布）转入中国共产党），前往延边地区，恢复了曾经遭受破坏的延边地区中共党组织，并开始对这一地区的朝共各派进行工作。同年 4 月，已在南满加入中共的朴允瑞被中共满洲省委自南满调到延边，协助王耿对朝共各派进行了大量工作。同年 4 月 24 日，中共东满特支书记王耿还同朝共火曜派东满道负责人金槿、全汉峰等人达成协议，组成了在中共

东满特支领导下的有朝共党人参加的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掀起了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封建军阀和地主剥削制度的“红五月斗争”，并要求在这一斗争的实践中考察所有申请加入中共组织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因此，同年 5 月 29 日，朝共火曜派东满道委员会便首先发表了解散宣言。随后，该派满洲总局也于 6 月中旬发表了同样的解散宣言。

朝共上海派组织的朝共再建准备委员会满洲部，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令朝共党人各在所在地加入该国共产党的指示，一直持消极态度，他们仍然将希望寄托于朝共的重建。但是，事与愿违，该派在朝鲜进行的共产党再建活动一再遭遇失败，力量损失严重，影响日益缩小。在旅居东北的朝共 ML 派、火曜派的满洲总局相继宣布解散之后，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组织改称为“满洲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该派朝共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共组织之前的过渡性组织。直到 1930 年 8 月，这一组织才最后解散。

关于上述情况，日文出版物的记述如下：

3 月下旬，首先是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中的 ML 派发表解散宣言，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 6 月上旬，火曜派也这样做了。其他派别也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唯有一开始就表示拒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汉上派<sup>①</sup>中的重建朝共满洲部的一派，以“中共不允许以团体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而在全体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共以前，应有一个执行过渡阶段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的过渡性组织”为由，组织了满洲朝鲜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样一个非党组织。直至 8 月上

<sup>①</sup> 即朝鲜共产党汉城—上海派。





旬，这个组织才全部解散，其成员分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

## 2. 中共满洲省委向各地派巡视员加强调查工作，拟定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初步办法

由于1930年3月20日朝共ML派满洲总局解体宣言的发表，旅居中国东北的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势头迅速发展。为迎接这一潮流的到来，中共满洲省委加紧工作，于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连续作出一些重要决定。

首先，中共满洲省委正式将在南满工作的吴成仑和在北满工作的洪南杓，分别派定为省委驻该地区的巡视员。同时，抽调刚加入中共不久的朴允瑞为东满巡视员，前往延边地区工作。他们担负的任务，是负责了解并初步审查各该地区要求加入中共的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同时对他们进行有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手续以及政治路线等方面的教育，为将来省委派出的特派员前来正式审查批准进行准备工作。

1930年3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三十四号报告》中，即记载了满洲省委有关这一方面的状况：

省委对东满工作正计划组织一特委到吉林，尤其在韩国同志加入后更必要。

廖△△<sup>②</sup>到吉林负东满特委责……<sup>③</sup>

① 《满洲共产主义运动概史》，转引自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有关译文资料。

② 即廖如愿，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等职务。

③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集，第284、285页。

1930年4月2日，在《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记录》中说：

省委准（备）派巡视员到东满、南满地区巡视工作，做好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的工作，对这一工作进行了讨论。

当时，正值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省委曾初步地拟定了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工作程序和办法。准备成立一在省委领导下的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统一负责研究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党的问题，提出建议，由省委决策实行。原朝共各派满洲总局将所有申请加入中共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名单、档案，全部移交中共满洲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接收。然后，由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到各地巡视，考核，登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立即解散原有朝共各级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党部。采取这种办法，可以迅速解决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迫切要求加入中共组织的问题。不过，这种工作程序和办法的弊病是易于使原有朝共党人各派保持过去的小组织和小团体，并且由于不能严格地履行个别申请、逐个审查、经过考验、个别吸收的手续，容易发生良莠不齐的现象。

## 3. 成立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

1930年4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党和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在省委领导下的“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由省委指定5人组成（包括原有中国党员2人、现已加入中共的朝鲜同志3人）。会议规定这一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组织的问题上，向中共满洲省委及时提出建议，供省委决策，是一种咨询机构。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少数民族工作”的情况，同年4月15日，省委专门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中共满洲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

首先，该委员会立即派出陈公木、吴成仑到北满地区的扶余、同宾（今延寿）、珠河（今尚志）、苇河、五常、青冈、宾县、方正、桦川、阿城、富锦、汤原、萝北、通北等14个县，调查了解各地要求加入中共的前朝共党人和朝鲜革命青年的状况。同时，还派人到南满、东满等地进行同样的调查工作。同年5月8日，派往北满调查的陈公木和吴成仑向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提交了《十四县调查整理报告》。这些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是述及各地在中共党组织派人领导之下，申请加入中共的前朝共党人和先进分子业已行动起来，普遍带领周围群众开展反帝、反军阀和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以便在斗争中接受考验和审查，争取早日参加中国共产党等等情况。

中共满洲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在接到这些调查报告之后，及时地进行了研究，并于1930年5月14日向省委提出了由该委员会拟定的一份《意见提纲》，建议省委迅速派出若干得力干部到各地工作，切实领导各地的革命运动。有关内容如下：

依据由这一次我们巡视所得到的经验，为将来一切工作之发展起见，兹提出我们关于重要问题之意见：

1. 组织问题：勿论（如何）将完全取消从来的满洲总局及他的系统。在目前延边、北满、吉敦线（额穆、敦化、舒兰）、吉海线（吉林、磐石、桦甸、双阳）及奉海线（柳河、海龙、清原、东丰、西丰、开原）等地群众斗争形势紧张，为要切实地领导他们使其更加发展起见，省委要特别注意派定一部得力同志到各地工作。兹将我们预定人员记于下：

（一）延边特委 陈公木；（二）北满特委 金万旋；（三）

吉海、吉敦及奉海 李钟熙；（四）通化、桓仁等地发展工作 李蕲克；（五）兴京方面整理委员会 朱沧；抚顺、铁岭方面 李又伯。<sup>①</sup>

其次，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还在5月24日为省委起草了《对在满韩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决议草案》，提交省委决策。5月26日，满洲省委常委专门通过了《满洲韩国民族问题决议案》，重申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旅居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的“一国一党”原则，经过一定的手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按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成立各地支部。同时，对于工农出身的前朝共党人或先进分子，和“以前曾参加过派争的”或非工农出身者，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候补期。其中，对参加过派争者还严格规定：“必须申明完全放弃派别斗争，服从共产国际对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并遵守中国党的党纲与党章，切实工作”，经过相当的考察之后，证实真正放弃了派别观念，积极工作，才能入党。还明确规定“中韩同志编入一个支部”，共同工作。此外，满洲省委确定，在成立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之后，东满、北满、南满特委可设“韩国民族委员会”，进行工作。

现将1930年5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对在满韩国工农群众决议案》摘录如下：

……满洲的韩国劳苦群众必须参加目前中国革命斗争，满洲的韩国同志为一国一党的原则和解放在满洲韩国劳苦群众，更应加入中国党，在中国党第六次大会所指示的路线下奋斗。

……今后原来在满洲的韩国共产主义的一切组织应一概

<sup>①</sup>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07—708页。





根本取消。韩国同志应经过一定的手续而加入中国党，按中国党章而成立各地支部……①

1930年5月26日，经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通过的《满洲韩国民族问题决议案》中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1. 少数民族委员会省委已经成立，东满少数民族委员会改为“韩国民族委员会”，南满北满特委即准备成立韩国民族委员会的组织。在特委之下，不必有这一组织……。

2. 关于韩国共产主义者各派（或以前韩共党党员）入党问题，必须严格的执行中央所指示。

A. 工人与农民同志（必须在业工人与中农、雇农、贫农，挂名的工人出身与富农不在内）可以立即成为候补党员，候补期按照中国党章决定。

B. 凡以前曾参加过派争的（非工农分子）必须申明完全放弃派别斗争，服从共产国际对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并遵守中国党的党纲与党章，切实工作，经过考查〔察〕看过相当的时期，如真正能够放弃派别观念，积极工作，才能成为候补党员，候补期按中国共产党党章知识分子例。

3. 关于中韩同志编入一个支部问题，按中央草案“党的问题”的C项办理。②

中共中央对于吸收旅居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一直十分关心。193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制定了《满洲工作计划大纲》，该《大纲》对发展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重点有所强调，认为

①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04页。

②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35—736页。

“必须特别着重工人和贫农”，对知识分子要“谨慎的选择”。《大纲》对满洲省委成立“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予以肯定。

现将这一《中共中央关于满洲工作计划大纲》中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韩国人的党员发展的方向，必须特别着重工人和贫农。满洲的韩国人之中有许多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分子，他们往往倾向共产主义而自己诚心愿意加入共产党，可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不可免的动摇是自然的现象，所以对于他们要谨慎的选择。党的省委之下应当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或者暂时只有韩国人，就简单地称为韩国委员会，选拔韩国人的干部，计划出版韩国文的刊物和宣传品。①

#### 4. 满洲省委总结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工作经验，进一步明确工作方针和办法

1930年6月下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东北代表团返回沈阳，同时省委又接到前述6月29日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件。这时，省委机关虽然于最近连续两次被敌人破坏后刚刚恢复了工作，还是立即就有关吸收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经验教训进行了及时的总结，并于7月19日上报中共中央和下达地方党的组织。同年11月中旬，满洲省委在总结1930年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时，其中对于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问题又继续作了深入的总结。

中共满洲省委在这两次总结中，集中所要解决的，仍然是克服前朝共满洲总局存在的派性和派争干扰的问题，和引导在东北

①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16页。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的朝鲜农民参加中国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以及实现朝鲜农民革命组织的统一问题。为此，中共满洲省委在6月下旬的会议上作出了原则决定之后，又立即召集省委派往各地的巡视员和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成员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和办法。

满洲省委批评了在组建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时，和该委员会在工作中所发生的派别作用；批评了在南满地区发生的前朝共ML派党员一律吸收，在北满地区出现的只吸收前朝共火曜派成员的宗派主义错误；还批评了在此以前所发生的采用“和平移交的办法来解决韩国共产主义者入党”的倾向。

最后，省委决定：第一，进一步明确省委派往各地的巡视员的职责；第二，由省委发表给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一封公开信，向所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阐明吸收党员的方针、原则和手续，增加这一工作的透明度，排除派性干扰；第三，由省委发表告农民书，并制定农民斗争纲领和农民运动工作大纲，号召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参加中国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

下列历史资料即可见当时中共满洲省委有关此项工作的记载。

1930年7月19日，在《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前省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犯了以下几点主要的错误，结果不惟没有解决韩国共产主义者的入党问题，反而助长了他们内部的派别斗争……。

(1) 在组织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时，省委没有注意到各派首领的派别成见，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除了两个中国同志外（实际并未参加工作），其余三人都是ML派的首领，结果在他们的派别成见支配之下，在工作上反映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例如：他们决定将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改称少数民

族部，将建议机关变为指导机关和执行机关，以便利用省委少数民族部的名义包办少数民族的一切工作。而且他们用言语不通的理由决定少数民族部的委员不要中国同志，同时又自动地举出两个ML派的首领参加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工作。这种决定不单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他们都会说中国话），而且显然（是）ML派把持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企图。并且他们在介绍韩国共产主义者入党的工作上，也异常明白表现了其深刻的派别成见，就是他们全部地移交了ML派的名单，而对火曜派的群众则置之不理（在他们的巡视报告中可以明白看出，报告原文另附）。

(2) 从前省委用和平移交的办法来解决韩国共产主义者入党的问题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办法不仅不能消灭各派无原则的斗争，而且有使他们秘密保持着其原来的组织关系，将其派争带进党内的可能与趋势。

(3) 从前省委为统一韩国农民的组织起见，在《告韩国农民书》中提出了“加入在满农民同盟”的口号来号召韩国农民是错误的。因为“在满农民同盟”是ML派的组织（火曜派的组织是北满农民组合），其他还有青年农民同盟、青年农民组合等组织。这一个口号提出之后，不仅助长了派别争斗，引起了其他组织内的农民的怀疑和不满，而且这一口号的确实表现了以ML派为中心的形式。

以上几点是从前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错误。

此次省委解决的经过：

省委曾将此问题特别提出经过讨论和决定之后，召集了我们负责的韩国同志开一扩大会议，将省委的决定作一报告并提出讨论，结果一致赞成省委的决定。

(1) 确定在满韩国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党的原则意见给韩国共产主义者一封公开信。





(2) 省委派巡视员到各地巡视，巡视员的任务是：

- A. 按省委决定的原则介绍韩国共产主义者入党，立即组织各地党部；
- B. 调查各地的组织状况等，如党的组织状况、农民的组织状况、青年及妇女的生活及组织状况；
- C. 帮助各地成立农民协会及雇农工会；
- D. 报告苏维埃大会的经过及各种决议的主要内容，并号召农民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一切决议；
- E. 向各地党部介绍和解释农民斗争的纲领及农民运动工作大纲。

(3) 由省委发表给在满韩国共产主义者书：

- A. 指出韩国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党的必要；
- B. 指出加入中国党的正确原则（原文另附）。

(4) 由省委发表告农民书：

- A. 通俗的说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状况；
- B. 指出苏维埃区域的状况；
- C. 介绍苏维埃代表大会；
- D. 特别加重说明农民组织的分裂与农民运动的危险；
- E. 以农民协会统一满洲农民的组织（原文另附）。

(5) 由省委决定农民斗争纲领与农民运动工作大纲，由巡视员带到各地（原文另附）。

1930年7月，在《廖如愿关于满洲工作报告》中记述：

朝鲜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特别的复杂，完全反映了农民落后的意志〔识〕，各派封建式的无原则争斗，非常厉害；彼此都是些共产主义者，没有工作的路线与纲领。总计ML、上海、京上、火曜、北风各派组织，大约有1200余人。ML派

有400余人要求加入满洲党的组织，已经省委批准。由省委组织民族运动委员会，将他们组织的名册与文件，完全接过来，再由省委派人巡视，登记加入，解散原有组织，成立必要的党部，这是当时少奇同志提出的意见。开始我是怀疑这个办法的，我认为这是团体的加入，他们这些团体一定有许多假的分子包含在里面。他们的团体应该暂时保留，看成一种单纯的群众组织，领导他们的斗争，从斗争的表现来个别介绍入党。

1930年4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召集省委会议。兹将《会议记录》中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朝鲜问题。朝鲜有五六派，在各派组织有1200人的样子。各派彼此都是斗争，是农民封建式的争斗，在满洲也是没有什么工作路线，只是相信共产主义，同我们发生关系。爱木丽<sup>①</sup>现有400多人要求加入，由省委组织一民族委员会，再由省委派人巡视登记加入。少奇又不同意。我以为应视为一种群众团体来工作，在工作中一个一个地来加入。争（论）几次的结束〔果〕，以为在言语方面都困难，只将文件移交过来巡视后再加入。<sup>②</sup>

1930年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为贯彻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兹将省委书记孙杰（陈潭秋）为会议作的有关结论摘录如下：

<sup>①</sup> 即朝共ML派。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集，第297—298页。



韩国是一个农民经济的国家，所以农民的散漫的意识，养成了派争的基础。韩国过去是有党，因为派争关系，为国际取消了。过去有党的时候，曾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也有很多的罪恶(如互相利用统治阶级互相残杀)。过去中东路事起，北满韩国党派(人)曾要求与中共发生关系，那时中央只认为是一种革命群众组织与他们发生关系。今年中央派去北满的巡视员，根据北满火曜派的报告，作了很错的分析，说火曜派代表贫农，ML派代表富农，京上派代表地主。今年6月省委为此正确地规定了这一原则，派同志到南满东满去整理，在整理工作中，曾得到了初步的胜(利)。不过整理的同志，同样的在工作上有些错误(如南满整理人认为是有相当保障，东满认为根本没有问题)，省委坚决地纠正，在这个基础上，同样的又发生东满整理人(认为)京上派比较复杂些的观念，经过坚决的斗争，才将他克服过来……。这种认识只是放弃反派争的工作，只有坚决在(反)派争中，才能增加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才能加强无产阶级的意识……①

1930年7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致在满韩国共产主义者的公开信》发表。信中明确无误地向朝鲜共产主义者指出了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途径和原则。兹录有关部分如下：

……当此两个世界的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候，每个革命者，尤其是以共产主义者自命的觉悟分子，必须积极地起来，参加整个的革命的实际行动。共产主义运动即是国际的革命运动，凡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其所在地的革命运动。过去在满的韩国共产主义者专做离开对象的韩国独立运动，就

①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6集，第172—173页。

是说在中国做韩国革命运动，忽视当前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产阶级，这是绝对错误的。韩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很长，但因为阶级意识的薄弱(所代表的阶级也只是中农、贫农，运动的指导者几乎全是知识分子)，政治水平线的低落，同时又得不着国际的指导。于是，继续不断地发生无原则的非政治的派争，甚至敌友不分，利用正义府、新民府、保卫团、同乡关系等反革命组织，互相进攻，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这种无原则的、非政治的派争，若是不很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则不独不能执行革命的任务，实际上反成了革命的障碍，已离开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十万八千里。这是很值得每个以共产主义者自命的同志们深刻地反省的！中国共产党满洲省执行委员会站在国际党的立场上，站在整个革命的利益上，号召凡属在满洲的韩国共产主义者须彻底肃清派阀观念，加入中国党，参加中国革命。同时为保障政治上、行动上的一致及组织上的坚固起见，在你们未正式加入中国党以前，必须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原则，在这里特别提出，使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个根本的认识，才能将这一问题求得一个正确的、彻底的解决。

(一) 共产主义者应当是，而且必须是国际主义者，站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上，在中国的韩国共产主义者应当加入其所在地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然而，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定要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执行党的策略和决议，遵守党的章程，能在党的组织中从事工作，参加中国革命的实际行动。

(二) 在满韩国各派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既没有独立的党纲，又不是国际的支部。很明显的，只能说是共产主义的集团，而不是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承认任何一派为





兄弟党，自然不能以对待兄弟党的办法对待这些集团。因此移交、登记整个办法都不合党的章程，我们只能用入党的办法，不分派别的，一个一个地加入，建立各地的地方党部。

（三）我们站在阶级的立场上，认为各派里面的贫农、雇农群众都是革命的，至于中农是目前同盟者。某一派的群众革命，某一派的群众不革命的说法，或某一派代表某一阶级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在介绍入党的时候，绝对不以任何派为中心，而放弃其他派别的群众。我们绝对不分派别的介绍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毫无宗派观念的一切积极勇敢革命的群众迅速入党，尤其是过去无派别的群众。

（四）对于有派别历史的领袖，我们要特别注意其实际行动。他们是否赞成党纲，能否积极执行党的策略，能否放弃派别成见，都应在实际行动中加以考查。在实际行动中不积极执行党的策略，而且没有抛弃派别成见的人，不能介绍其入党。赞成党纲，执行党的策略，而没有完全放弃派别成见或活动的人，亦不能马上介绍入党。已经入党的分子如果仍然秘密保持着派别关系或活动者（如同国内上海、莫都<sup>①</sup>、海参崴等继续派争的关系），一经发现，立刻开除其党籍。

（五）要彻底地消灭派争，建立整个的、一致的、健强之党，必须要取斗争的方式，但不是和平式的、拉拢式的调和办法所能作到的。我们为整个革命的利益，必须肃清无原则的、非政治的派争，但是我们绝对不可避免政治的斗争。我们相信根据中国党无（党）中派争的原则，将引起韩国各派集团中一个剧烈的分化，将由无原则的、非政治的争斗转到政治的争斗，这种争斗是必须的，而且是有益的。只有在

<sup>①</sup> 即莫斯科。

这样的争斗（中），才可以提高党的群众政治水平线，加强阶级意识，保障革命的正确路线。

以上这些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则。我们认为在这种原则之下，来解决你们入党的问题，则以前各派间种种非政治的、无原则的争斗是不能带进党内来的。你们不单应具有参加革命的决心，而且应具有消灭一切非阶级的、非政治的、无原则的派别争斗的决心。这种无原则的派别的争斗，是韩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是满洲革命工作的障碍。我们要用最大的决心，将他在满洲的根基铲除净尽。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中国革命，对韩国革命都有莫大的意义。<sup>①</sup>

上述《中共满洲省委、团省委致在满韩国共产主义者公开信》和《全满农民斗争纲领》发表之后，收到驻各地区的巡视员和工作委员会的反映和意见。其中对党、团满洲省委的公开信几乎一致拥护，对农民斗争纲领的个别内容要求稍加修改。满洲省委也都一一予以答复。现摘录如下：

1930年9月14日，在《中共满洲总行委给北满特委的信》中说：

告韩国共产主义者宣言及农民斗争纲领，惟农民斗争纲领（中）有些（内容）不能适用，须修改。<sup>②</sup>

1930年10月8日，在《中共满洲省委给北满特委的信》中说：

至于农民斗争纲领，总行委在9月初给你们信中已声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58—62页。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180页。



明过有许多地方不能适用，必须重新审查修改。你们所指出的几点都是对的，不过纲领中所提出的口号不是犯了阶段论之错误，而是基于各县斗争不平衡的错误见解所决定的。<sup>①</sup>

前述1930年9月14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给北满特委的信》中说：

一般群众热烈接受告农民书及解决派争的原则……。<sup>②</sup>

1930年夏，在一份《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报告》中说：

满洲有韩国农民将近200万人，这是满洲一个基本革命队伍，党最近特别注意到这一工作，现在已经介绍40个新党员，加原有干部共44人，占满洲农民同志80%强。北满阿什河、宁安县委几乎全为韩人，这是农村工作刚刚开始一时的畸形现象。<sup>③</sup>

## （二）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各地审查、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入党

### 1. 东满方面

1930年7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有关指示和决定，满洲省委派出以省委委员廖如愿、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委员李振民、省委组织部秘书陈德森为巡视员组成的工作组，分

别前往东满、南满和北满各地巡视工作，就地审查、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其中，廖如愿带领李振民在中共延边特支书记王耿的陪同下，自7月6日由吉林—海龙铁路间的烟筒山站与同行的陈德森、汉生分开，去延边地区工作。

关于这一段工作的简要经过，可见廖如愿的下列报告摘录：

这次出发巡视，为解决韩国派争建立各地组织，布置工作。原先计划是由德生〔森〕、感〔汉〕生两兄往奉海路线沿线各县工作，我与振民先往东满延吉巡视后，再则〔在〕东满找一无派争观念之干部同志与振民到北满沿中东路各县巡视返哈尔滨。我由东满返东满敦化、额穆、吉林等县工作后，再到磐石，再至柳河、济〔清〕源参加县代表大会。预计时间，我们7月6号由烟筒山分途出发，8月15号当可完毕。事实关系我们因为敌人严密检查，在敦化停留了两天，7月17号方至东满。又因东满工作紧张，负责无人，直于10号（8月）振民才由东满出发，抵东宁、宁安巡视。临时变更计划，要振民巡视东宁、宁安、桦林、密山后，仍返东满主持工作。我直至8月26号才离开东满。当时敦化已经暴动了，敌人严重白色恐怖，大批同志被捕，交通机关破坏，无法找得韩国各派共产主义者的线索。所以在敦化、额穆等县没有停留，9月4号就返到吉林。6号省委又派和寿<sup>①</sup>巡视。到了吉林，我为全满工作配合等问题急于要返省委，也没有至磐石、柳河、济〔清〕原等县，就回转奉天了。<sup>②</sup>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6集，第35页。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176页。

<sup>③</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6集，第377页。

<sup>①</sup> 即王鹤寿，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197—198页。





延边地区，早在1928年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只是多次被军阀政府破坏，发展缓慢，且党员多为汉族，小学教员居多数。1930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王耿到延边工作，建立了中共延边特别支部组织，共有党员15名。同年4月，满洲省委又调派在磐石工作的朴允瑞作为巡视员，到延边协助中共延边特支从事联络在这一地区的朝共党人的工作。同月24日，中共延边特支组成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开展“红五月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这一行动委员会中，吸收前朝共东满道负责人金槿、金汉峰等人参加工作，并决定通过这场激烈的革命斗争，考验所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以便予以逐个审查、吸收入党。这一时期，延边特支曾首先将前朝共党人韩星、马骏等吸收为中共党员。

关于自1930年春至同年秋时期，东满地区中共党组织吸收前朝共党人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工作，从下列历史资料中可见一斑。

1930年6月1日，在《朴世衡<sup>①</sup>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说：

为指导五一斗争，延边党部与本特派（员）于4月24日，组织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责任金汉峰——前M系<sup>②</sup>延边党部责任——委员朴△△<sup>③</sup>、苏△△<sup>④</sup>——前M系Y延边责任——金平铁（东爆破总指挥）外，还有两个中国同志（姓名未详）。但种种关系，于4月27日方开始工作……<sup>⑤</sup>

①③朴衡世，当时是中共满洲省委派赴延边的特派员。

② 即朝共ML派。

④ 即苏圣奎，为朝共ML派在延边的中国青年同盟负责人。

⑤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3卷，1990年版，第261页。

1930年5月8日，在《中共延边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记载：

将所有的韩国同志经朴衡世正式将名单提到省委批准以前，为先消灭其党性性质及作用，以为有必要从现在起使他们在中（国）党的指挥之下进行一切工作，这是朴衡世与特支共同商议的结果。所以自五一事事都由中〔国〕党来决定，以便及早消灭他们内部无原则的斗争，统一革命运动的战线……。

因为这种关系，各主要区域必须建立党的支部，所以非把特支的组织扩大不可，应扩大成为如何的组织，请省委迅速指示，以便照办。<sup>①</sup>

1930年7月17日，廖如愿率省委工作组到达龙井，立即着手工作。此时，正值“红五月斗争”之后，由于敌人的残酷迫害，中共延边特支的党员数量已由15名降到7名。但是，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却正等待着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组前来审查和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以前，经过满洲省委特派员朴允瑞（朴衡世）的整理，在延边地区已有前朝共ML派约80人、火曜派60余人、京上派<sup>②</sup>若干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从未加入过朝鲜共产党的工农革命积极分子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省委工作组到达后，即由朴允瑞将上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名单交给了廖如愿等人。

关于这一情形，前述1930年9月20日在廖如愿巡视东满的工作报告中有记载：

①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3集，第252页。

② 即朝共汉城—上海派，亦称汉上派。



特支同志原有 15 人,9 个是北京香山来的小学教员,6 个新介绍的韩国人。五月斗争后,北京来的教员均被撤职……跑到奉天、北京等地去了。我们到延边连王耿总共 7 个同志,干事会没有组织起来,工作也无形停顿……

ML 派自经省委派遣朴衡世整理后,同志约 80 余人,因为派争关系省委没有正式批准。干部分子自五卅斗争后完全被捕入狱,组织瓦解,只有两个同志还能找到他们的线索。火曜派在延边原有同志 60 余人,他们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延边的干部与各派组织已经解决了,只有两个负责同志与特支发生群众的关系。上海京上派有些群众间接的线索。<sup>①</sup>

在前述 1930 年 6 月 1 日《朴衡世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

在延边领导农民最多的是 M 系,<sup>②</sup>主要原因是因 M 系在延边历史长久之故。其次是京上系。据五一工作以前的调查,M 系领导下的农民团体共有 33 (个),其包括人员共 1 560 余人……。京上系领导农民团体共有 7 个,共有群众 280 余人。火系<sup>③</sup>领导的团体只有 3 个,群众 70 人。<sup>④</sup>

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的有关规定,经过中共延边特支党员大会的通过,并由廖如愿、李振民组成的省委工作组的审查、批准、首批接受 8 名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积

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同时,为健全特支组织,由王耿、李昌一、朱健、李镛组成了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委员会,由王耿任书记。

然后,由廖如愿、李振民、王耿等分赴延边地区各县审查、接受大批积极分子入党,并即时建立了各地中共组织。计有:汪清区委,党员 63 名;延吉区委,党员 28 名;开山屯区委,党员 23 名;三道沟区委,党员 36 名;平岗区委,党员 30 名;老道沟特支,党员 18 名;赤色游击队特支,党员 7 名。共设区委 5 个、特支 2 个,共有党员 205 名。截至 1930 年 8 月上旬统计,延边地区党组织共有支部 48 个、特支 2 个、区委 5 个,党员共达 333 名。在此期间,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申春等人。

同年 8 月 13 日,在省委巡视员廖如愿的主持下,在平岗召开了中共东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延边地区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共延和中心县委。由王耿任书记,马骏、韩别、朴允瑞分任组织、宣传、军事部门负责人。

会后不久,延边地区党员继续增加,组织继续发展,相继又建立了瓮声砬子、老头沟、龙井等 3 个区委,成立了珲春临时县委和安图区委。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延边地区建立起 1 个中心县委、1 个临时县委和 9 个区委组织。其中延和中心县委管理的党员达到 670 名,珲春临时县委管理党员 100 名。

在此期间,中共东满特支还派遣朴允瑞等前往敦化、额穆建立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暴动。

下列工作报告即是这一时期东满方面的工作记录:

组织方面:县大会前<sup>①</sup>东满组织范围内仅组织有 5 个区委,2 个支部,即延吉、汪清、开山屯、三道沟、平岗区委、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5 集,第 210 页。

<sup>②</sup> 即朝共 ML 派。

<sup>③</sup> 即朝共火曜派。

<sup>④</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3 集,第 260—261 页。

<sup>①</sup> 中共延和县代表大会是 1930 年 8 月 13 日召开的。





老头沟、游击队支部。当时汪清有 63（个）党员，延吉有 28（个）党员，开山屯 23（个）党员，三道沟 36（个）党员，平岗 30（个）党员、老头沟 18（个）党员、游击队 7（个）党员……。大会后即成立了瓮声砬子、老头沟、龙井区委，瓮声砬子有 25（个）党员、龙井 19（个）党员、老头沟 34（个）党员……。暂时成立琿春临时县委……。安图成立区委……。经过两个月的工夫，现在已发展到延吉 80，汪清 110、龙井 35、开山屯 75、三道沟 75、平岗 200、老头沟 35、瓮声砬子 60、共有 670（个）党员……。中国同志<sup>①</sup> 只有 10 人……。②

吉敦暴动是临时组织领导的，该地来信要求党即去领导并说了些愤激话（不应因反派争而放弃工作之领导）。我已去信陈公木即先去吉敦组织党……。③

1930 年 9 月中旬，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正式成立了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由省委指定廖如愿任书记职务。同年 10 月，中共琿春县委、汪清县委、延和县委相继建立，延和中心县委撤销。延边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进入大发展时期。这时，在中共东满特委管理下的共产党员，已由原有延边特支时期党员数量最少时的 7 名，增至 921 名，增加 131.57 倍。

这一时期，在延边党组织吸收的大批党员中，除包括一批前朝共各派中没有派别观念的积极分子外，还有一批从未参加朝共组织的工农积极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者约占全部新加入中

<sup>①</sup> 指中国汉族党员。

<sup>②</sup> 《中共延和县委给东满特委的信》（1930 年 10 月 30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5 集，第 309—310 页。

<sup>③</sup>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陈德森巡视工作报告》（1930 年 9 月 2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集第 5 集，第 158 页。

共组织的党员数量的半数以上。

在前述中共延和中心县委时期的 670 名党员中，按民族区分，朝鲜族共有 660 名，汉族 10 名。这种状况，是当时延边地区的特殊情况所形成的，即是在短时间内吸收大批前朝共党人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所出现的暂时现象。后来，这种现象逐步有了改变。

上述情形，在廖如愿的前述 1930 年 9 月 20 日的巡视报告中有所反映：

在此次建立延边组织的中间，包含有京上、火曜、ML 各派分子，原无派别者约占半数。群众厌恶派别非常剧烈。同时，急剧发展更是消灭派争主要的原因。<sup>①</sup>

延边地区在解决了大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之后，从中共满洲省委到延边各级党组织还继续十分注意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的教育，抓紧解决他们中间长期存在的某些认识问题和“派争”问题。

过去，在延边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存在一种认识，即认为他们在中国延边地区的革命对象同在朝鲜一样，只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才是他们的敌人，而对于同样直接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中国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阶级，却认为不是他们的斗争对象。认为只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朝鲜，才能获得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解放，从而可以避免他们逃离朝鲜、迁居或流亡中国东北的命运。所以，他们将在延边地区从事反对日本侵略势力的斗争，视为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和争取民族独立这一总斗争的一部分，即所谓朝鲜反日斗争的“延长”。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朝鲜移民应尽量避免同中国封建军阀政府和封建地主阶级发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集第 5 集，第 213 页。





生冲突，以求避免再遭受中国统治阶级的镇压和迫害之苦。这种认识，是忽视了现有大量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移民，业已长时期定居、劳动在这块土地上，今后其中的不少人是不会再行返回朝鲜去了。他们在中国东北所遭受的中国封建军阀政府、地主豪绅阶级的残暴的政治压迫和沉重的经济剥削，如果不能摆脱，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只是在东北各地孤立地开展反对日本侵略势力的斗争，不同中国各族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不仅难以解决他们当前现实的日常的 and 根本的利益问题，而且收效甚微。所以，这种“朝鲜延长论”，是脱离了大量已定居延边和东北其他地方的朝鲜居民的。同时，这种“朝鲜延长论”，还忽视了中朝两国有着共同的边界这一特殊情况。中国和东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势将直接和间接削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削弱中国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阶级的反动统治，不但将直接改善侨居在这里的朝鲜革命力量的斗争环境，而且会间接减轻朝鲜国内革命势力所承受的压力，有助于朝鲜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事业。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于加入自己队伍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曾经反复地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积极地投入了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

下列历史文献便是这种工作的记录：

有些在满自命为朝鲜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然更如此），认定东满的延边和朝鲜一样在日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实际是朝鲜的延长与扩大，唯一的敌人只有日本帝国主义。这完全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实际上延边是东满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军事的组织系统与奉系军阀国民党的统治完全不可分离。中国的地主豪绅封建势力更是直接剥削与压迫延边群众的敌人。延边是朝鲜延长的理论

避免了与中国统治阶级的冲突，离开了阶级的立场根本就没办法解决延边的群众（的问题）。<sup>①</sup>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针对前述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直接霸占、吞并和许多人逃亡海外、移居异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派别复杂、派别斗争现象，进行了深入地教育和纠正。这项工作，不仅在审查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时，明确规定不准热衷于派别斗争的分子参加中共组织；对于原朝共各派满洲总局的各级主要负责人员的申请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而且，对于已经申请并获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还坚持继续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决不允许在党内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和派别斗争，否则将予以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出党，以便纯洁党的队伍，保障党在组织上的团结一致和对敌斗争中步伐上的一致。

## 2. 南满方面

1930年7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陈德森率汉生组成的南满工作组，同东满工作组在烟筒山分开后，便留在吉海铁路和沈海铁路沿线各县开展工作。

这里毗邻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沈阳，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带，特别是柳河地区早有组织基础。1928年春，为发展这一地区的农民武装斗争还建立过中共东南特委一级组织。1929年8月，中共中央又派遣金山、吴成仑等到东北，经满洲省委派往磐石、吉林一带，在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开展调查研究和思想工作。1930年春，参加过黄埔军校和广州起义的中共党员朴奉（朴根秀）兄

<sup>①</sup> 《中共满洲总行委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9月2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228页。





第二人，又经省委派到磐石工作。经过他们的积极工作后，曾先后吸收了前朝共党人朴允瑞、李东一（李东光）以及王平山（金昌根）等先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由于在这里进行工作的多为前朝共党人，虽然他们早在上海便参加了中共组织，却由于派别观念仍未彻底清除，因而在工作中发生了只将前朝共 ML 派名单整理上报中共满洲省委，对其他各派朝共党人却很少予以置理的现象。结果引起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强烈的不满。因此，中共满洲省委并未及时批准他们上报的名单，仅是首先个别吸收少数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组织，以便进一步开展工作。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前朝共组织早已被解散，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大多数尚未经过中共组织的审查和批准。这种状况，不但导致一时间“群龙无首”状态，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能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地加以贯彻，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群众组织和革命斗争处于一种散漫的状态，急待解决。

同年 5 月，中共满洲省委曾派张光谦（张光前）到南满地区的清原、柳河一带，了解关于前朝共党人和他们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并于同月 22 日向满洲省委作了书面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前一段的工作，业已从前朝共党人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述及原有的朝共组织已经撤销，中共的各级组织（包括基层支部）尚未建立起来、已加入中共的和尚待加入中共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报告建议省委派人抓紧审查、吸收大批朝共党人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工作。

下列资料即是张光谦工作报告的一部分：

吉海路一带是 ML 势力比较发展的地方，但他们的成分还是徘徊在自耕农与富农之间，没有深入到雇农和贫农之中。尤其各地党、团干部及群众工作的人多数是由延边亡命来的，或者由南方漂流来的。没有建立起党的下层基础，更没

有建立起支部工作，可以说一般的党员没有过着党的生活——支部一月间或须有一次很散漫的会议——这并不是党员群众的消极，而是指导机关失了其作用，养成一般党员没有组织的表现。并且过去满洲局干部分子与一般的党员群众普遍的表现出现在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党对满洲韩人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革命等问题，当有具体办法的。只有等待着这个具体的指示，因此暂时形成无政府状态。

自从民族运动委员会成立，取消满洲局以后，没有以县、区、特委或支部等代替组织。对于吸收党员问题，或为无人过问之状态。所以今年的五一不能用满洲局的名义发宣言、传单，号召群众，又没有代替这个任务职权的组织，所以只有农盟、济难会、少年先锋等群众团体发宣言，散传单……。

在他们势力之下的武装，共计起来约有 10 余枪（其中驳壳占多数，其余手枪、长枪最少数），还有些炸弹，土枪最多。土枪多的地区首推清原、柳河一带，磐石、烟筒山等地较少（土枪半数都在地主手里）……。他们所做的事情，主要的杀日本的走狗，或抢地主土豪等钱来作运动的经费……<sup>①</sup>

同年 7 月初，陈德森和汉生到磐石后，又相继去清原、柳河、兴京（今新宾）等县进行巡视工作，并审查、接受朝鲜共产主义者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这一带地区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遭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因而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其中，朝鲜族农民和朝鲜移居农民深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对土地革命寄予很高的期望，表现积极，踊跃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

<sup>①</sup> 《张光前关于清原、柳河一带农村状况的调查报告》（1930 年 5 月 22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9 集，第 352—354 页。



组织。

同时，还发现这一地区各县原有朝共各派之间的派别矛盾和斗争仍然存在。但是，前朝共各派中的一般党员对各派热衷于派争的领导人都已表示了不满和厌倦，切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革命斗争。

这种状况在下列工作报告中有所反映：

本区域<sup>①</sup> 大部分是ML派，再建设派只有很小的活动范围……。二派间一直到我去的时候，还在双方用反动的罪名推来推去，并且彼此严防暗杀与告密。各派的下层群众，已经引起了广大的对领袖的不满、怀疑与愤慨。因为这时大家知道自己的派属不是国际支部。虽然他们的领袖自己宣称国际快要承认他们的派为支部，或者说中国党将允许他们全体入党。但是实际上迁延再迁延完全没有信息……。因此各派都在一个极深刻的恐慌道上。再建设派过去与党无关系，而且因临时组织时，ML派利用中共名义攻击他们，致使对党怀疑，并且对党还存在一个幻想。就是想把自己的群众当做贡礼，经过他们献给中共以便维持和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开始曾用总工会的名义接洽过一次，因他们无诚意，结果等于零。<sup>②</sup>

根据省委工作组了解到的情况，工作组按照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有关决定，经过严格地考察和激烈地反对“派争”的斗争以后，在各地吸收了一批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前朝共党人和其他

<sup>①</sup> 指吉林省磐石县境。

<sup>②</sup> 《中共满洲省委省委巡视员陈德森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月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140—141页。

革命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并立即建立起基层支部组织。当时各个“支部是经过激烈的反派争以后建立的，干部是由下层群众中、实际工作中选出的分子。新入党的人都是对派争深恶痛绝的”<sup>①</sup>。

下列历史文献充分反映这一工作的状况：

1. 现在所建设的新组织，一般的是能保障脱离过去派别系统的关系的。这个保障的基础建立在新入党的同志对派争问题之觉悟，以及对派属及派属主要干部之高度的愤恨。

2. 因此，虽然各县原来派属的下级干部大都入了党，仍然是不要紧。这样干部本身也是受欺骗的，他们是参加群众工作与斗争的，而且都是本地的农民。干部中一切积极的知识分子，都调开了原来地方，移到新组织群众中工作去了。他们入党时是受过严格的询问与批评的，如果不吸收这些分子在短期内建立组织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是经过他们去找群众线索。

3. 现在新的组织的干部是本地下层群众中、而且是实际参加过斗争的比较老实的分子。各派对于知识分子的迷信是打破了的。

4. 在新加入的党、团员中曾详细地对他们分析过去一切派争的根源，并提出要继续肃清派争的残余影响，反对一切无原则的纠纷，反对一切无组织的个人行动。<sup>②</sup>

在这一时期，前朝共党人陈公木（1928年3月在上海加入朝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142页。

<sup>②</sup> 《中共满洲省委省委巡视员陈德森巡视工作报告》（1930年9月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160—161页。





共 ML 派,1929 年 6 月任该派满洲总局组织部长)即是在同年 7 月于磐石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

1930 年 7—8 月间,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组的主持下,各县相继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共磐石县委、中共清原县委、中共柳河县委和中共兴京特支组织,党员共计 140 余名。不久,又建立了中共海龙县委。

1930 年 9 月中旬,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正式建立了中共南满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共南满特委)。由王鹤寿任书记,李昌一等为特委委员。

下列资料便是这一时期南满各县建立党组织工作的记录:

(磐石)党团的建立:党支部 7,特支 2,党员总数 42 人……团员总数近 50 人。

(出席)代表大会共 11 人,支部代表 8 人……大会共进行 3 天……

(清原)党支部 6 个,党员总数有 40 多人。……(出席)代表大会共 8 人。

(柳河)党支部 9,特支 1(通化),党员总数为 40 多人……(出席)代表大会共 11 人。

(兴京)由吉林、磐石、清原等地调动了 5 个同志赴兴京秘密工作。这 5 个同志中,党员 4 人,团员 1 人,合组一特别支部……<sup>①</sup>

### 3. 吉林及其附近

吉林—长春地区,早在 1926 年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并

建立过支部和县委的组织。但是,屡遭反动统治者的破坏,不少党员被捕入狱或被迫离开。至 1930 年 3 月,中共满洲省委在吉林又建立了特别支部,并开始在市郊及其附近农村地区建立党的组织,进行审查、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到同年 8 月,已陆续在五里河子、双河镇、东响水河子等地建立起 4 个党的支部组织,共有 25 名党员。不久,建立了中共吉林临时县委,由王平山任临时县委书记。10 月,满洲省委调前中共台安县委书记张玉珩(张振国、张敬山)任吉林县委书记,正式组成中共吉林县委。

1930 年 9 月 14 日,在一份《卓英关于吉林情形的报告》中说:

特支的基础、质量两方面都非常薄弱,除韩国同志外,中国不过有两三个 CY 同志……<sup>①</sup>

### 4. 北满方面

1929 年 9 月,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同朝共满洲总局(火曜派)代表达成协议后,双方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尽量采取联合行动,众多朝鲜共产党人及其所影响下的朝鲜农民积极参加了 1930 年的“红五月”斗争。

1930 年春,中共党员洪南杓被中共满洲省委正式指定为省委巡视员和东北地区朝鲜革命群众组织的中共党团成员之后,到达哈尔滨附近阿城的朝共满洲总局(火曜派)所在地,开展对朝共党人的宣传、思想工作,曾发展了若干前朝共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他的派性未有完全根除,在个别吸收党员时强调朝共火曜派“代表贫农”,认为好于其他各派成员,因而所发展的一些中共党员清一色尽是前朝共火曜派成员。结果遭到北满地

<sup>①</sup> 摘自《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陈德森巡视工作报告》(1930 年 9 月 2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5 集,第 141—156 页。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6 集,1989 年版,第 3 页。



区前朝共各派的指责，中共满洲省委也给予了批评。同时，由于他的工作不力，朝共满洲总局（火曜派）迟迟未能自动解散，使阿城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者申请加入中共组织的工作遇到障碍。

下列历史资料即是这种状况的真实记录：

……北满对派争的问题仍未得到完满的解决，实际上对韩国党员的整理，仍不免在火曜派笼罩之下，而且意识上也有火曜派较好于ML派的成见，这是正确解决派争问题的主要障碍。……过去说ML派代表富农，火曜派代表贫农，基于这种分析，可以产生火曜派较好于ML之观念，这种分析是不正确的……对于过去有派争关系的韩国同志，特别是过去各派领袖分子，应严重注意他们的行动，不要委托他们以党的任何责任，只能经过他们去找各派群众的线索，不能以他们的意见作整理的根据（至多只能备整理的参考）。……整理绝不应注意那一派，而应注意吸收过去各派中之积极勇敢及完全消除派争成见、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与策略路线的分子。……过去各派领袖，非有极可靠的保证（完全消除派争成见之保证）是不能吸收入党的，特别不应分配他负责的工作。<sup>①</sup>

江宇（即洪来抱）派争成见很深，他是各派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接东满同志报告（原来火曜派的），他在受中央整理以前曾去吉（林）及亲身到东满，站在派争的观点上面与原来火曜派分子作小组，继续派争的活动，特委须特别注意审查他。<sup>②</sup>

<sup>①②</sup>《中共满洲总行委给北满特委的信》（1930年9月1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176—177、181页。

到1930年7月，阿城地区仅建立1个支部，党员32名。后来，在中共满洲省委北满工作组成员李振民到达后，情况有了变化，9月，才建立起中共阿城县委。10月，中共满洲省委将洪南杓派返上海。

本来，同年7月初，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廖如愿、李振民组成工作组，从沈阳出发，拟经延边，绕经东宁、宁安等地到北满，沿中东铁路到达哈尔滨，沿途巡视工作，审查、吸收各地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沿途耽搁，尤其延边地区工作繁重，不得不中途变更计划，于8月始由李振民等从延边出发，到东宁、宁安、穆棱、密山等地开展这项工作。

早在1930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即派遣业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朝共火曜派成员李克华到宁安工作。不久，前朝共满洲总局（火曜派）北满道委组织（1927年设立）宣布解散，其中一部分成员经申请、审查，参加了中共组织，并组建了中共宁安县特别支部，特支机关设在该县花脸沟。特支下设铁岭河、东村、新安镇等支部，党员共23名。但是，由于李克华所吸收的朝鲜共产主者大多数为前朝共火曜派成员，引起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不满。中共哈尔滨市委发现后，又派吕文斌、黄旗范到宁安，解散了宁安特支，重新审查已加入中共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于同年6月成立了中共宁安临时县委。9月，根据中共北满特委指示正式成立了宁安委员会，由金城任书记。中共宁安县委共拥有14个支部，党员35名。1931年春统计，宁安县委管理的中共党员已达160名。该县是北满地区党员数量众多的县份。

1930年上半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派人到东宁县工作，前朝共组织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自行撤销，经过中共组织派去人员的审查，吸收了一些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了中共组织。7月，建立了中共东宁县特别支部委员会。东宁特支下辖





2 个支部，共有中共党员 19 名。前朝共党员（火曜派）金策即在此时于宁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 8 月，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池喜谦等经中共哈尔滨市委派遣，从宁安到达密山档壁镇开展工作，审查、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组织。9 月，组建了中共密山特支委员会。10 月，朴允瑞自延边地区到达密山，受命将密山特支扩大为中共密山县委。

中东铁路线上的东部重镇穆棱，早在 1926 年便建有中国共产党的支部组织。迄 1930 年 9 月为止，由于吸收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入党，党组织扩大建立了 5 个支部、3 个区委。同年 10 月，中共北满特委派人建立了中共穆棱县委，共有中共党员 24 名。

珠河（今尚志），也位于中东铁路东段，聚集了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经中共党组织派人审查，最初吸收了其中 3 名加入了中共。1930 年 8 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组织。9 月，由中共北满特委改建为特别支部，10 月又扩建为中共珠河县委，党员达到 87 名。许亨植（李熙山）便是 1930 年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曾担任过朝共满洲总局军事部部长（火曜派）的金志刚（崔石泉、崔庸健）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并于 1930 年春被中共哈尔滨市委派往北满的通河、依兰、宝清、饶河等地工作。他在朝共党人中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在满朝共各派总局联席会议的有关决定，广泛宣传目前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直接投身中国革命运动的意义。经过审查后，在上述各地分别吸收了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并相继建立了支部组织。

其中，1930 年 7 月以前，在通河建立 1 个中共支部，党员 11 名；在依兰建立支部 1 个，党员 8 名。同年 9 月，依兰支部扩建为特支组织，10 月，经中共北满特委决定改建为中共依兰县委，党员达到 103 名。同年秋，宝清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隶属中共饶河县委管理。

中共饶河县委于 1930 年秋建立，直属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同年 9 月，改归中共北满特委管理。

在此期间，中共北满特委还在青冈吸收部分朝鲜共产主义者入党，建立了中共青冈特支等组织。

此外，扶余地方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还派出代表赴哈尔滨，同中共哈尔滨市委进行联系，表示了接受指导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下列统计数字，说明北满地区在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发展的概况：

|     | 党员数 | 党支部数 | 团员数 | 团支部数 |
|-----|-----|------|-----|------|
| 东 宁 | 19  | 2    |     |      |
| 阿 城 | 32  | 1    | 25  | 1    |
| 珠 河 | 3   | 1    | 3   | 1    |
| 穆 棱 | 8   | 1    |     |      |
| 宁 安 | 35  | 6    | 43  | 5    |
| 通 河 | 11  | 1    |     |      |
| 依 兰 | 8   | 1    |     |      |
| 计   | 116 | 13   | 71  | 7    |

(1930 年 7 月统计)

……党在农村有组织的县份从 2 县增加到 7 县……但完全是朝鲜农民并且火曜派占大多数(阿城有 16 个无派别的群众……宁安无派别的群众更多些。)<sup>①</sup>

① 《中共北满特行委 8 月份总报告》(1930 年 9 月 9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1 集，第 22 页。



5. 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状况的变化

1930年,是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壮大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组织和领导之下,东北地区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在延边地区和北满、南满的农村,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兴起,成千上万的农民拿起了武器,同日本侵略势力、中国反动军警展开搏斗,焚毁地主、高利贷者的地契、债券,分配地主的存粮,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在斗争中,一大批工农革命积极分子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经过实际革命斗争的考验和审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

7月,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这一时期组织的发展曾有所述及。报告中说,经前一时期的工作,一共吸收了40名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上原有入党者,才总共44人。但是,他们全属农民党员,已经占当时东北全部农民党员总数的80%强。并且述及在有些地方,如北满阿什河(阿城)、宁安等县委“几全为韩人”的现象。报告认为:“这是农村工作刚刚开始,一时的畸形现象。”

由于大量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东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为了加强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力量,便于开展工作,满洲省委及时作出吸收朝鲜同志参加省委工作的决定。

下列文献即是满洲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有关报告:

省委决定李振明〔民〕同志参加省委,因为他的观念正确,工作积极而有耐心,很负责,他是一个韩国人,对满洲各地情形很熟,望中央批准。<sup>①</sup>

①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111页。

9月,中共满洲省委在向中共中央的组织报告中,对8月以前东北地区党的发展状况作了全面的汇报。其中,对当年东北各地党组织按共产国际的有关决定和中共中央的屡次指示,开展审查、吸收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朝鲜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的工作有所总结。

满洲省委在这一汇报中指出,目前在已吸收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中,过去未参加过朝鲜共产党各派的革命积极分子约占总数的50%,其余也是各派中的一般成员居多。过去热衷于派别斗争的分子中大多数也有了深刻的反省。这些已加入中共组织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具有参加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成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下列调查表,即是中共满洲省委1930年8月份的报告:

全省地方党部调查表<sup>①</sup>

| 党 部                   | 支部数 | 党员数   |
|-----------------------|-----|-------|
| 哈 市 委                 | 8   | 41    |
| 奉 天 特 委               | 3   | 10    |
| 大 连 特 支               |     | 10    |
| 营 口 特 支               |     | 5     |
| 抚 顺 特 支               | 5   | 30    |
| 吉 林 临 时 县 委           | 4   | 25    |
| 长 春 特 支               |     | 3     |
| 延 吉 县 委               |     | } 360 |
| 汪 清 县 委               |     |       |
| 和 龙 县 委 (包 括 安 图、吉 敦) |     |       |

① 摘自《中共满洲省委八月份组织报告》(1930年9月9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301—303页。





|          |       |          |
|----------|-------|----------|
| 琿春县委     |       | 100      |
| 桦甸县委     |       | 30       |
| 磐石县委     | 9     | 80       |
| 清原县委     | 7     | 50       |
| 柳河县委     | 9     | 50       |
| 兴京特支     |       | 3        |
| 东宁       | 2     | 19       |
| 阿城       | 4     | 32       |
| 穆棱       |       | 8        |
| 依兰       | 1     | 8        |
| 宁安       | 1     |          |
| 通河       | 1     | 11       |
| 珠河       | 1     | 3        |
| 台安特支     | 3     | 15       |
| (1927)   |       |          |
| 辽中特支     |       | 4 (内有团员) |
| (1929)   |       |          |
| 营口特支     |       | 5 (内有团员) |
| 通遼       | 通讯员 1 | 3        |
| 洮南       | 通讯员 2 | 2        |
| 辽源 (郑家屯) | 1     | 1        |
| 安·东      | 通讯员 1 | 1        |
| 计        | 58    | 约 909    |

现在韩国共产主义者入党的,非派分子差不多占 50%,剩下 ML 派的占 25%,火曜派占 25%,其他各派占 5%。东满、南满解决得差强人意,大致得了一个初步的成功。在北满直到现在,仍在继续派争。<sup>①</sup>

<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 8 月份组织报告》(1930 年 9 月 9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5 集,第 300 页。

在联席会召集以前对各县的党,必须经过一次切实的整理。南满、东满各地,经过总行委派人整理以后,关于韩国同志的派争问题,虽不能说根本解决,确实已有了初步之成功。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已有了新的发展与进步,党在组织上已吸收了 30%—50% 的超派争分子,过去参加派争的分子大多数已有了深刻的觉悟,特别是一般群众热烈的接受了告农民书及解决派争的原则,了解过去派争的罪恶,极力反对过去各派领袖及保持有派争成见的分子,尤其是群众斗争发展的区域,对解决派争的问题更有保障。<sup>①</sup>

1930 年 10 月,在《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记录》中,记载着省委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林仲丹(张浩)在会上的报告。他说:

高丽党的问题……他们的基础是好的。我们的办法,(承)认他们是共产主义的集团,他们加入中国党是个别加入,条件很苛,主要的:(1)要参加中国(与)韩国的革命。(2)不管他们的派别,下层党员只要赞成与执行中国党的政策即可加入,上层分子则有后补期。(3)加入后再发现派别(斗争)则开除。……现在火曜派已解散。我们介绍党员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延吉一带有 700 多同志,行动是一致的。清原柳河是 ML 集中地,群众对于参加中国革命、反帝有很强烈的要求。我们也以这两个条件为加入党的主要条件。满洲工作与韩国工作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各地农民,除台安、珠河外、都以韩国人为中心,党也是一样的,同志成分中东路延吉一带韩国同志占 90% 以上。

<sup>①</sup> 《中共满洲总行委给北满特委的信》(1930 年 9 月 14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5 集,第 175—176 页。



由于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绝大多数是东北地区的农民，他们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占现有农村党员的90%左右，因而使东北地区党的力量的分布长期以来多集中于城镇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从而对于东北地区农村革命斗争的开展和后来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和有利的条件。

下列资料即是上述情形的历史记录：

党员数量是农民占绝大多数，而且除了几十个中国农民外，完全是韩国农民。<sup>①</sup>

韩国农民占党员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却薄弱到了极点（不到3%）。<sup>②</sup>

据1931年初统计，由于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东北地区中共党员的数量由1930年春的200余名，迅速地增加到1200名左右。据中共满洲省委的一项报告中说：“在满的韩国同志有1000余人，实难调查。”<sup>③</sup>结果，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由一个小的组织成长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的面貌有了明显的改观。

①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4月2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8集，第18页。

②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1931年4月1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7集，第217—218页。

③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32号信）（1931年5月）。

## 六、中共协助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建党的活动

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在接受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除领导他们同中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以外，还热情地协助朝鲜共产主义者赴朝鲜重建朝鲜共产党组织，推动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工作一向视为自己应尽的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早在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准备大量吸收旅居东北的朝共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入党时，中共中央在所制定的工作计划草案中，对于派遣朝鲜同志回国开展革命工作，建立朝鲜共产党组织，便有原则性的指示。但是，对于如何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还须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中共延边党组织派遣朝鲜同志回国进行工作，开始得比较早。1931年5月26日，中共满洲省委便及时地指示东满和南满的党组织继续开展这一重要工作。满洲省委指出：

派韩国同志回国工作问题，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东满过去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须继续进行。南满应即开始准备进行这一工作。各特委已派去韩国工作的同志应即将他们的履历、党对他们的批评，以及他们回国后的通信方法等详细报告省委，以便省委报告中央转知国际。关于派韩国工作同





志的任务按照中央草案所指示执行。<sup>①</sup>

早在1930年9月25日，中共满洲总行委在给党的东满特委的信件中，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运动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影响、相互支援的关系，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工作的地位和特殊意义：东满革命运动的发展，将直接推动朝鲜革命运动的开展；帮助朝鲜共产党的重建，并使之领导朝鲜革命斗争，必将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直接打击。同样，只有帮助朝鲜革命斗争的发展，方能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更有力的打击，方能使中国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得到更有力的配合和支援。信中指出：“援助朝鲜革命是东满中心任务之一”。信中指示，中共东满特委应立即成立“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归满洲总行委（省委）领导，暂时由东满特委代管，要开始有计划地开展朝鲜国内的工作。

下列文献便是上述中共满洲总行委给东满特委的信的摘录：

东满各县接壤朝鲜，有70万以上的朝鲜农民，大半是朝鲜国内破产的农民、贫民与参加朝鲜革命失败的亡命分子。他们在中日统治阶级严重的剥削与压迫之下，一切政治经济言论行动没有丝毫的自由，只有革命斗争才是他们唯一出路。因此东满工作的发展，同样是推动了朝鲜的革命运动，帮助朝鲜党的建立，领导朝鲜群众的斗争，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的打击。在援助朝鲜革命的任务上，东满工作更是十分的密切与直接……

东满工作一方面应加紧吉敦路一带的发展，同时应帮助朝鲜国内工作。从斗争中找出没有派别成见的韩国同志分配

到朝鲜国内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重要的中心产业区域与铁路工作。援助朝鲜革命是东满中心任务之一。一样的只有朝鲜工作之发展方能给予日本以更有力的打击，方能使满洲革命得到更有力的配合与保障。特委应立即成立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直隶于总行委，暂时委托东满特委指挥，开始计划布置朝鲜国内工作。<sup>①</sup>

不久，中共中央在1930年10月25日为满洲省委制定的《满洲工作计划大纲》中指出，中共满洲省委必须抓紧帮助朝鲜共产党建立这一工作。并且指出，必须将有关情况迅速报告中央转达共产国际，按正确的组织路线去解决。

……关于韩国共产党的问题，满洲省委应当收集一切消息材料，迅速的寄达中央转到共产国际去解决，经过正当的组织路线，去切实的帮助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满洲省委必须加紧帮助韩国（党）的发展及其工作者青年化的转变……<sup>②</sup>

中共东满特委在后来的工作报告中也曾述及中共中央和满洲总行委的这一指示内容。

东满特委在1931年2月23日给满洲省委的工作报告中说，特委第一次接到的省委指示信中指出：

为开发建立朝鲜国的工作成立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直

<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满洲韩民族问题决议案》（1931年5月26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8集，第141页。

<sup>①</sup> 《中共满洲总行委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9月2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227、233—234页。

<sup>②</sup>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16页。



接由省委管辖（省委的分工），暂时委托东满特委指挥执行建立布置朝鲜国内的一切工作。

在同一报告中又述及，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廖如愿在 1930 年 11 月出席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时，所得悉的中共中央制定的《满洲工作计划大纲》的内容，说：

廖同志<sup>①</sup>看见中央给满洲工作大纲，有如此的指示：“满省委为实际的援助朝鲜革命帮助朝鲜兄弟党的建立应该（在）满洲朝鲜群众中找出些无派别斗争的分子到朝鲜国内工作，以后再介绍到国际”（大意如此）。

但是，究竟如何协助在朝鲜国内建立朝鲜共产党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为此，1930 年 11 月中共满洲省委举行扩大会议期间，曾经专门召开了一次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会议。在会上，省委提出了一个《韩国民族斗争纲领》，经过会议的讨论后通过。在《纲领》中，明确纠正了东满特委派人去朝鲜同现有的某些具有派性的革命团体发生关系，建立朝共组织的错误工作方式，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这一工作的指导路线，即：在朝鲜首先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群众，从中发展朝鲜党的组织，而不是借助朝鲜现有的革命团体开展工作，以避免这项工作一开始便重蹈过去朝共党内各派各自重新建党遭受失败的历史覆辙。

现将有关的历史资料摘录如下：

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曾开了一次少数民族委员会，后又在省委讨论一次，提出了一个韩国民族斗争纲领……同时对

于解决这一问题发生了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主张在纲领里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与原则，一部分人主张不提……

现时对于韩国民族斗争的纲领，已在省委讨论通过了，除专函报告中央外，现再将这一纲领列下：

附：韩国民族斗争纲领

关于援助韩国革命问题，过去东满特委曾经有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成立，直接行动，直接由委员会派韩国同志去韩国活动，并由该委员会与韩国革命团体发生关系。该委员会要求直接属于省委指导，省委认为这是错误的。决定东满少数民族委员会（实际只是韩国民族）可以存在，但它是讨论计划的机关，与党的职运等委员会的性质与作用相同的，应属于东满特委指导，不能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工作系统。对于韩国革命运动，东满特委要给以有利〔力〕的帮助，必要时可以派一部分同志到韩国同志中去工作，去发动群众斗争，组织群众并发展党的组织。将来有了相当的基础，即报告中央转国际解决韩国党的问题。目前东满党是根据这样决定来进行工作。

省委根据了中央的意见，成立少数民族部……<sup>①</sup>

1931 年 2 月，中共东满特委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正式成立了由特委代管的“中共满洲省委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组织。由廖如愿、朱健、刘志远 3 人为委员，由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东满特委书记廖如愿兼任书记。该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历次指示精神和特委开展这一工作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于 2 月 20 日作出了《满洲省委朝鲜工作委员会对朝鲜工作的决

<sup>①</sup> 即由中共满洲省委派往延边任东满特委书记工作的廖如愿。

<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4 月 24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8 集，第 50—51 页。





议》，并经东满特委讨论通过，上报满洲省委批准。

在此期间，中共东满特委又接获满洲省委转抄的中共中央就有关在朝鲜帮助建立朝共组织、朝共党人寻找党组织关系问题的原则指示。该项指示明确指出：第一，坚持经过自己的实际工作和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党的原则；第二，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第37条规定的精神，未经朝共组织批准或所在国党组织介绍的朝共党人，一律不能与之发生组织关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东满特委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于2月23日一并上报满洲省委。同时，东满特委还特派特委书记廖如愿前往沈阳，参加满洲省委讨论有关朝鲜工作的会议。

现将有关历史资料摘录如下：

1931年2月20日，中共东满特委受满洲省委委托代为起草的《中共满洲省委朝鲜工作委员会对朝鲜工作的决议》，首先经东满特委通过。《决议》中写道：

去年10月省委决定对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委托东满特委指挥……

一、中国革命与朝鲜的关系，朝鲜与中国的满洲毗连千里，关系非常密切。日本在满洲有坚固的传统基础，满洲革命运动的发生，一定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的残酷斗争。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满蒙、镇压中国的最前线……只有朝鲜国内工作的发展，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致命伤，才是中国革命中最有力的配合与保障。

朝鲜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斗争发展非常普遍……群众极需要在国际之无产阶级政党指导之下来找自己的出路。最近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更给了他们以强有力的推动……目前工作的关系，中国党应担负起援助朝鲜革命的任务。

二、……我们不承认任何一派兄弟党，不承认任何一派是比较革命些或是反革命些，因此更不能以那一派为中心来领导发展朝鲜国内工作。

在1931年2月23日《中共东满特委给满洲省委的信》中说：

D，派廖同志到省委讨论朝鲜问题，东满会议的决定：“领导朝鲜国的群众斗争，建党问题请求中央答覆”（大意如此）。

E，最近省委转录中央回信：“你们对于韩人找党关系问题（省委指示东满特委），中央答覆如下：‘韩人找党关系问题，没有介绍信不能发生组织关系，必须要从实际工作与斗争中来发展党’（大意如此）。”

中共东满特委在同一封信中又说：

……只有从实际斗争中消灭了派争观念的同志和群众派到朝鲜国内工作，从实际工作中来建立党和群众组织，唯一问题就必须得到中国党的帮助，同时中国党满洲的革命也必须得到朝鲜国内工作的配合，援助朝鲜革命同样是开展了满洲的工作。

东满与朝鲜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站在世界革命与全国革命的关系上，我们为配合东满的工作发展朝鲜国内的工作，建立朝鲜党的基础介绍到国际，已经再不能容许丝毫的忽视，特委对于这一工作的决定是如此的：

A，组织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委员廖、朱、刘（过去延和县书记）三人委员会，书记由廖暂兼。

B，首先派了3个同志到咸兴、永兴、京城、平壤作群众



工作，再由开山屯、瑯春等处派人到朝鲜沿岸会宁等处参加群众的生产。

C，派去工作同志，主要的从群众斗争的实际工作中介绍同志建立党的组织。

D，督促开山屯、瑯春等处积极向朝鲜国内发展。

E，以特委和省委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名义，发表援助朝鲜革命、告朝鲜群众的宣言。

F，为更了解朝鲜国内的实际情形，现在朝鲜的真正群众团体（如赤工会<sup>①</sup>筹备处）及常川留住一代表在东满（或者叫做联络员）。

G，朝鲜国内共产主义的团体采取满洲解决派争同样原则，但在办法上不用巡视建立组织，即在实际工作中来切实的执行。

H，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的经费依照过去特委预算每月批准津贴 200 金。

这些决议我们已经开始执行了！沿会宁一带的组织马上可以建立起来。我们希望有了相当基础后完全移交到国际，请你们转达中央，并望有更详细具体的指示！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以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历次原则指示和省委在此项工作实践中逐步积累的经验，终于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原则和办法。1931 年 9 月 12 日，中共满洲省委对东满特委关于朝鲜国内工作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决议，即《中共满洲省委对东满特委关于朝鲜国内工作的决议》。兹将这项决议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sup>①</sup> 即赤色工会。

一、援助朝鲜革命运动是中国党主要任务之一，实际去积极帮助朝鲜国内党与群众工作的建立与发展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主要的工作。这一任务在东满已经开始，现在应更有计划的去积极执行。

二、建立与发展朝鲜国内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能够正确的彻底的解决韩国派争问题。……解决派争问题的基本原则——根本反对一切派争，不承认任何派别。

三、朝鲜国内工作的发展，中国党的帮助只是一部分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纠正中国党可以包办一切的倾向，同时要防止在观念上和实际工作上依靠朝鲜国各派去发展工作的严重错误。

四、建立朝鲜国内工作的基本路线是要从广大群众工作中去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坚决反对派争，建立和发展群众的组织，在群众组织工作的基础上面去建立朝鲜党的组织。

1.（略）

2.（略）

3. 党的问题。……在未得国际正式批准朝鲜党的组织为国际支部以前，目前韩国党的组织仍然不能成为国际自〔承〕认的正式的韩国党的独立组织。但在朝鲜国内新发展的韩国同志，也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些新发展的同志，只是将来发展韩国党的基础，在一定条件之下经过中国党转到国际的批准，才能成（为）朝鲜党的正式的独立组织（到这个时候，我们将所有在朝鲜发展的同志以及过去派去的工作同志都将他们转到朝鲜的党，而与中国党脱离组织关系）。

在这一期间，由中共东满特委代管的“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曾陆续派出地下工作者潜入朝鲜国内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并在斗争中物色、培





养先进的革命分子吸收为共产党员，建立朝鲜党的组织。

此项工作，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失败与挫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断前进。

下列资料可见这一工作的一般情况：

于1930年12月25日，派姜进（原ML派满洲总局委员）到朝鲜，传达了第三国际关于朝共再建一事委托给中共满洲省委和解散朝共再建委员会的决定。金一洙为搞好今后工作的衔接，就到延边地区同中共东满特委负责人磋商再建委员会解散后的工作问题。经过磋商认为，朝鲜的再建工作单靠再建委员会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决定今后朝鲜工作由中共满洲省委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指导下进行。……金一洙于1931年3月20日，在朝鲜兴南召开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朝共再建委员会。同时，于1931年3月30日，金一洙又宣布成立左翼劳动组合评议会准备会，……但是，1931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在汉城举行游行示威时，姜文秀、吴醒世等180名评议会干部全部被捕，1931年7月，评议会便自行解散。至此，在（中国）东北的共产主义者（汉城上海派为主体）到朝鲜再建朝共党的最后一次试图也就这样告終了。这就是朝鲜共产党再建委员会事件……也称为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事件。<sup>①</sup>

朝鲜工作委员会是1931年秋天<sup>②</sup>成立的，书记廖如愿，委员有朱大个子<sup>③</sup>，还有一个人记不清楚了。当时这个委员会

① 韩俊光：《朝鲜共产党及其满洲总局的始末》（未刊稿）。

② 应是1931年2月。

③ 即朱健。

只是个雏形，准备建立后再扩大。

朝共党分子吸收为中共党员后，派往朝鲜去的有20人左右。派去的，都找到了职业，并在群众中扎了根。

我们派去的20几个人都是（前朝共）火曜派。经过那次“大检举”，派去的人都没有下落了。我们对朝鲜的工作也就停顿下来。<sup>①</sup>

金一洙、尹滋英、洪达洙、赵德进、吴蒜世等人潜入到朝鲜，同年<sup>②</sup>7月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朝鲜内地工作委员会。他们把本部设于咸镜南道，以各城市的工厂为目标，推进了赤色劳动组合的建立，在京城纺织厂、龙山铁道工厂、平壤各工厂组织了劳动组合。然而，1931年4月，以在龙山铁道工厂所发生的逮捕为开端，吴蒜世等150名被捕，中国共产党朝鲜内地工作委员会被破坏。<sup>③</sup>

但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和在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共同命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业已成为中朝人民的头号共同敌人。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旅居中国东北的朝鲜其他爱国主义者，立即同东北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一道，拿起武器，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去。因为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如果中国被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占领之后，

① 《廖如愿谈朝共党员加入中共问题》（1961年12月18—21日），转引自中共延边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资料。

② 1930年。

③ 译自高峻石：《南朝鲜劳动党史》，劲草书店1978年版，第21页。



不仅谋取朝鲜祖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事业将会更加困难，而且将使他们存身的最后一块土地完全失去。因此，身在中国东北这块土地上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认为，直接参加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将为争取朝鲜的解放事业扫清道路。

此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及其所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不但继续派出已加入中共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赴朝鲜开展地下斗争，而且不时派出抗日武装和朝鲜抗日战士进入朝鲜，同日本殖民主义者作战，打击日本殖民统治，获得了许多的胜利。

20 世纪 30 年代，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解散朝鲜共产党组织、各派朝共党人重建朝共失败并面临组织瓦解的危急情势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及时地伸出国际主义之手，经过必要的组织手续，接纳了一批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自己的队伍。后来，又在共同与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的长期战斗中，使这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经受了锻炼。虽然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为中国和朝鲜的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但是，中国共产党接纳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义举，最终还是保存了相当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骨干和抗日战士骨干，为解放朝鲜准备了极其重要的条件。他们最终返回祖国，配合苏联军队驱逐了日本侵略者，解放了朝鲜大好河山，建立了伟大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重新获得独立的朝鲜民族屹立在世界之林。

## 七、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境内的朝鲜族和侨居农民的政策

### （一）中共东北党组织对朝鲜族和侨居朝鲜农民作用的评价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东北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党员数量不多，力量薄弱。当时，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工矿企业，对农民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均注意不够，或无力顾及。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满洲省委建立，统一并加强了对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和党组织的领导。满洲省委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关于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方针，决定加强农村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因而开始注意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工作。其中，特别是对东北地区的数量较多的朝鲜族和朝鲜侨居农民的工作开始注意，并提上了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

1928 年 4 月 15 日，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公开发表了《告满洲朝鲜农民书》。同一天，还在省委机关刊物《满洲通讯》第 7 期上，发表《满洲的朝鲜农民问题》专论。文章揭露了东北境内的朝鲜族和朝鲜侨居农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政府压迫和剥削的事实，指出朝鲜族和朝鲜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军，指出他们的革命斗争是东北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从而提出了“凡朝鲜的农民在满洲与中国农民一样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居住权，一律享有革命政权”的主张，认为只





有如此，满洲的朝鲜农民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现将该文摘录如下：

……朝鲜农民是我们反日的友军，是我们满洲革命的农民的一部分。我们再不能旁观中国的军阀地主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去蹂躏朝鲜农民，我们当联合这部分可亲爱的革命群众，在斧头镰刀交叉的红旗下面，共同作反日运动，作土地革命运动，作谋夺取政权的斗争。凡朝鲜的农民在满洲与中国农民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居住权，一律享有革命政权。没收一切土地，没收日本资产阶级在满洲所经营的一切产业和附属地，如铁路矿山工厂银行商店等，一律享有〔收归〕革命政权。并毁灭中国军阀的统治，驱逐日本军警出境，封闭日人所办的一切学校……。这样，满洲的朝鲜农民问题才是真正解决。这样才是我们满洲的一切农工和在满洲的朝鲜农民共有的必要任务。<sup>①</sup>

1928年10月，中共满洲第三次代表大会为贯彻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在满洲临时省委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东北境内的朝鲜族和朝鲜农民屡次发生民族运动，但是，只有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民族政策才能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将“朝鲜人应享（有）土地所有权”列为东北地区农民斗争的主要口号之一。

1929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拟定在延边地区这一农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农民斗争时常发生的地方，发动农村暴动工作，提出制定“中韩民族斗争的纲领，编集现有中韩农民的武装，组织

游击队，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沿吉会路、吉海路发展，直至苏联的沿边”<sup>①</sup>。8月，在满洲省委的工作计划中，便提出“在农运上应特别与韩国党建立关系”<sup>②</sup>。

同时，为便于发动、引导朝鲜族农民和业已长期定居于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参加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还须注意解决已经存在的某些民族矛盾问题。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及时地指出了这一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揭露了这些民族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下列文献即是中共中央当时有关指示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民族矛盾问题的文件之一。

1929年9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

关于中韩民族冲突（如延吉）的问题，省委亦须注意解决。因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的阴谋，挑拨韩人与华人冲突；省委必须特别注意，在韩国农民中间，进行反帝的工作，并特别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之移民政策的阴谋，组织韩国农民于满洲党的领导之下，与中国农民一致的行动。

1930年春，为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的原则，须吸收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组织的问题提上中共满洲省委的议事日程之后，满洲省委为加强对于少数民族的工作，特别是关于朝鲜民族工作的领导，确定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除负责有关考察、吸收东北地区的前朝共产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组织的咨询工作外，还应“专门计划讨

<sup>①</sup> 《满洲的朝鲜农民问题》（1928年4月15日），《满洲通讯》1928年第7期。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集，第230页。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集，第259页。



论韩人工作问题”，以便开展朝鲜民族的工作。

在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件中，专门述及了这一问题，摘录如下：

满洲的少数民族运动，特别是韩人革命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现在农村（如东南北满）的工作，完全偏于韩人方面，中国农民的工作刚在开始，同志的数量90%以上也是韩人。在这种实际情况之下，省委为了解韩国群众的情形，正确的领导他们的运动起见，已在省委之下成立了少数民族部，专门计划讨论韩人工作问题，这样对于少数民族工作比较是有些帮助。<sup>①</sup>

1930年5月，为了广泛发动东北地区的各族农民群众，其中特别是朝鲜农民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和苏维埃运动，为了统一斗争的目标，中共满洲省委于同月通过了《关于满洲韩国民族问题决议案》，制定并发布了《全满农民斗争纲领》。上述决议案和斗争纲领中涉及了有关朝鲜农民的许多重大问题。

同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了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东北代表团，该代表团在参加上述会议期间向代表会议提交了《在满高丽人问题的决议案》草案，供会议采纳。

现将上述几件历史文件摘录如下：

1930年5月26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满洲韩国民族问题决议案》认为：

<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信》（1930年4月1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集，第357页。

### 一、满洲韩国民族的来源及其社会成分

满洲韩国民族最广大劳苦群众是因为在韩国受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而来满洲的，所以绝大多数是破产失业的农民……

……在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形成以下的对立：A. 农民与中外地主的对立；B. 农业资本家、富农与雇农的对立；C. 富农资产阶级和二房东（二层地主）与贫农中农的对立。这样形成阶级的矛盾与斗争。

### 二、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对于韩国民族的压迫与剥削

在满洲的韩国民族虽然离开朝鲜，但是仍然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统治。日本帝国主义是在满韩国民族最主要的敌人。

在满韩国民族不仅仅一般的与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一样受着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还受着特殊的压迫与剥削……

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对于在满韩国民族，一方面采取残酷的剥削方法来剥削他们，同时用最残忍的白色恐怖手段来镇压群众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又用改良欺骗的方法，如组织“韩族联合会”、“保民会”、“自治会”等等来麻醉欺骗群众，同时用挑拨离间的阴谋来掀起中韩民族的恶感与冲突，企图破坏中韩民族的联合和中韩工农的革命斗争。因此，在满韩国工农劳苦群众应当与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

### 三、满洲韩国少数民族运动的基本路线

省委同意中央《满洲韩国民族问题决议草案》的指示的基本路线：“应当提出完全的民族自决，直到承认韩国人分离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出去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作主要的中心口号，这样执行我们的阶级政策，领导韩国工农与中国工农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中农与贫农的土地革命，反对富农资产阶级与“二房东”。

援助韩国革命是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最中心的实际任务之一，满洲党要在上述基本路线之下来实际执行援助韩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 四、目前具体工作

……组织中韩反帝同盟……农民委员会……中韩农民组织在一个农协之下……<sup>①</sup>

1930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为发动包括朝鲜族在内的东北地区各族农民开展革命斗争，特制定《全满农民斗争纲领》。兹录如下：

##### （一）对地主、二房东、富农

1. 反对地主剥夺耕作权，争取永远耕作权！
2. 实行减租，反对先年交租！
3. 反对包租制（二层皮、二房东）！
4. 反对地主强征赋役，反对送礼！
5. 反对测量田地、加征租子、官厅清丈！
6. 反对房租！
7. 反对监视佃农，农民有耕田、退田之绝对自由！
8. 风水旱等灾年不交租并保障佃农生活！
9. 地主须供给农民柴木地！
10. 地主应无利息的借与佃户食粮及一切经费！

<sup>①</sup>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30—733页。

11. 反对富农，打倒反革命的富农！
12. 租地权和分配土地权集中农协！
13. 不交租子！
14. 打开仓库分配粮食！
15. 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富农土地分给农民！
16. 根本消灭乡村的封建剥削制度！

##### （二）对高利贷、商业资本及官厅

17. 反对商会及官厅强制规定农产品价格！
18. 反对广信、永衡、三井、三菱、大仓等之垄断农产品！
19. 反对精米业者及奸商之欺骗剥削！
20. 反对抬粮、抬钱、预买等高利剥削！
21. 不返〔还〕债！
22. 扑灭一切高利贷机关，驱逐高利贷企业者，烧毁契字债券！

##### （三）对国民党官厅、土豪劣绅

23. 反对军事摊派，反对警察捐、保卫团费、出差费等！
24. 反对车马税、柴草税、户口税！
25. 反对运输税、生产税、水利税！
26. 反对国民党军阀、官厅、土豪劣绅勾结帝国主义，逮捕、毒打、屠杀中韩农民及一切革命群众！
27. 反对封闭学校及解散革命组织！
28. 反对强迫入籍，反对驱逐韩国农民！
29. 反对军警撞入农家暴行、抢米、抢钱！
30. 反对押收农产品及家具！
31. 反对派粮派草、拉夫拉车，反对一切苛捐杂税！
32. 反对军阀战争！
33. 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反对同化教育！
34. 反对军警侮辱妇女！



35. 抗捐抗税!

36. 驱逐土豪劣绅!

37. 解除保卫团武装, 争取农民武装自由!

38. 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

39. 打倒国民党!

#### (四) 对帝国主义

40. 反对英帝国主义借款修筑葫芦岛港!

41.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筑吉会路、侵略满蒙!

42. 没收帝国主义在满特殊金融机关, 如东洋拓殖兴业公司、朝鲜银行金融部、救济会金融组合等之财产及企业!

43. 扑灭鲜民府、民会、韩族联合会、开发队等走狗机关, 没收一切走狗财产!

44. 没收帝国主义在满一切财产、企业!

45. 驱逐帝国主义海陆空军、领事、警察等出境!

46. 破坏帝国主义在满一切军事设备!

47. 杀尽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走狗!

48.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御用机关黄色工会、农会!

#### (五) 对韩人统治团体

49. 反对自治费及革命义务金!

50. 反对抢米、抢钱!

51. 消灭乡长、社长、中长制度!

52. 解除国民府、韩族联合会之武装!

53. 打倒假冒革命压迫农民之一切反动团体!

#### (六) 雇农要求

54. 反对对雇农之一切虐待及苦役!

55. 争取雇农八小时工作制!

56. 增加工资, 改良待遇!

57. 革命纪念日、节日放假!

58. 上人<sup>①</sup>与开除工人须得雇农工会同意!

59. 婚丧病期中照发工资!

60. 争取组织工会、罢工、言论、出版等之绝对自由!

#### (七) 农妇要求

61. 反对一切旧礼教及封建家庭之束缚与压迫!

62. 争取农妇之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之平等!

63. 农妇都要加入农民协会!

64. 反对早婚、强制婚、童养媳、买卖婚, 争取结婚、离婚之绝对自由!

65. 反对多妻制!

#### (八) 青年农民要求

66. 争取雇农青年同一工作、同一工资!

67. 反对封建家庭之一切压迫!

68. 反对对青年农民之苦役虐待!

69. 反对早婚、强制婚、买卖婚!

70. 反对一切封建礼教遗习!

71. 反对 14 岁以下之儿童劳动!

72. 青年有受教育之一切权利!

#### (九) 对中韩农民联合的

73. 反对统治阶级挑拨民族感情、破坏阶级战线!

74. 中韩满蒙农民联合起来, 向共同的敌人: 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

75. 建立工人、农民、兵士代表会议之政权——苏维埃政府!<sup>②</sup>

<sup>①</sup> 指地主、富农雇用雇农。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5 集, 第 45—50 页。





1930年6月，由中共满洲省委派出的出席于上海召集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东北代表团，向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在满高丽人问题的决议案》草案。有关内容如下：

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保障在满高丽人之居住自由及经济生活之向上发展。（同样与中国境内之诸民族）

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保障在满高丽农民之耕作权，且依本苏维埃政府之规定而平均配合〔给〕耕作地<sup>①</sup>。

一、中国苏维埃政府企图苏维埃政权之全国统一，同时努力建设在满高丽劳苦群众的苏维埃自治共和国。

一、中国苏维埃全国大会为解决在满高丽人之以上诸根本问题，指示在满高丽人于左记<sup>②</sup>当面〔前〕斗争的路线。

1. 在满高丽人工人及农民一定利用诸般可能性而企图自己阶级的组织上之向上。

2. 网罗全体革命要素，结成反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封建之战斗的协同战线。

3. 为工会、农会及一切革命团体之公开权利的获得而斗争。

4. 参加中国民众之一切革命团体或设置联合机关而努力强化和扩大统一的斗争。

5.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之进攻苏联及侵略满蒙而展开精〔努〕力的勇敢的斗争。

6. 经日常斗争而暴露军阀统治的虐政，以“打倒军阀统治”、“建设苏维埃政权”为斗争的中心口号。

特其〔别〕是暴露南京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改选〔组〕派

<sup>①</sup> 意即平均分配土地。

<sup>②</sup> 原文件为竖写并自右向左排列，故称下文为左记。

之反动性及欺骗政策。

7. 急速打倒与军阀合〔作〕之走狗团体——国民府、韩族会，最近急出来<sup>①</sup>的老人会和封建的统治式团体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侵略政策之别动队的各地方民会，以至“革命民族会”等全体反动团体而战，夺取彼等影响下之被欺骗的群众。

8. 积极的动员于朝鲜民族解放运动战线而勇敢的遂行特殊地带的诸役割<sup>②</sup>。

9. 经忠实的实践以上所示的诸斗争而可能一扫在〔从〕来之无原则的宗派的小党分立之弊害，可以清算在军阀统治之下自治权获得和空想的错误。且与中国革命民众密接联结，经日常的协同斗争可以消灭民族间的成见达到阶级的亲善和团结。

10. 最后一点是本大会应当强调在满高丽劳苦群众的军事上役割的重要性，同时并要求在每个乡村组织农民自卫团及赤卫团，且努力编成正式红军，指示我们胜利的斗争方法是组织的暴动，而特别声明我们最后的胜利之保障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指导之下，展开英雄的斗争。

11. 以上所记在满高丽人之斗争的大体路线之指示，而不是斗争的全体。我们希望贵大会依据这个根本路线而解决当面〔前〕具体的诸问题，供最大的努力于将接近来的最后胜利。<sup>③</sup>

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满洲韩国民族问题决议案》中，省委

<sup>①</sup> 意即由朝鲜人败类急忙拼凑组建一些反动团体。

<sup>②</sup> 意为勇敢地实现在中国东北这一特殊地区的各项任务。役割：任务。

<sup>③</sup> 杨昭全等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第714-715页。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在中国东北地区业已长期定居的朝鲜民族的民族问题之所在，指出：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民族绝大多数“是因为在韩国受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而来满洲的，所以绝大多数是破产失业的农民”。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在满韩民族最主要的敌人”，同时还“与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一样受着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还受着特殊的压迫与剥削”。从而指出：“在满韩国工农劳苦群众应当与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

同时，在这一决议案中和《全满农民斗争纲领》、《在满高丽人问题的决议》提案中，认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民族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居住权、土地所有权及民族自治权利。从而明确地提出了业已长期定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的基本要求。

上述决议案和农民斗争纲领的制定，对于发动广大朝鲜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将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在朝鲜共产主义者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前，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在革命斗争中，首先引导朝鲜农民群众使之加入朝鲜农民的各种革命团体，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同盟组织；在东北地区的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组织之后，满洲省委又提出：要引导朝鲜农民加入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农民协会等农民组织，以便统一东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及其领导。

1930年7月29日，在参加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的东北代表团返回东北之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派出人员到东北各地巡视，帮助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等农民团体，同时宣传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决议精神，筹备召开全东北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以便进一步推动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发展农民革命斗争。

现将1930年春夏期间，中共满洲省委的有关历史资料摘录如下：

，在运动中应努力引导韩国农民群众参加韩国农民的各种组织，加入反帝同盟，目前尤其要努力发动群众，援助韩国的独立运动。<sup>①</sup>

1930年7月29日，在《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省委将韩国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和中韩农民的组织问题，在原则上解决之后，更需要立即派人到各地巡视，以便迅速建立各地的党部和农民协会与雇农工会的组织，同时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经过和内容，到各处作一广泛的宣传并号召各地农民准备选举代表，参加全满代表大会。因以上几个重要而迫切的原因，省委派了4个同志同时出发到各地巡视。南满为陈德生和一韩国同志，北满为老廖和一韩国同志。<sup>②</sup>

1930年5—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吉林省延边地区为中心的东北地区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相继爆发，广大农民投入了破坏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机构和设施，打击军阀军警，收缴武器，焚毁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租契借约，分配地主藏粮的大规模斗争。这一地区的朝鲜农民成为这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的主

① 《中共满洲省委通告第十号》（1930年3月2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集，第278—279页。

② 这四位即陈德森、汉生、廖如愿、李振民。《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集，第90页。





力。

中共满洲省委对于朝鲜农民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作用，曾经及时地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是满洲革命运动的一支伟大的势力”。

中共满洲省委指出：

在满洲的韩国劳苦农民，总数在 200 万以上，他们受日帝国主义、满洲统治阶级地主豪绅以及国民府、二房东等层层压迫与剥夺，他们革命要求异常热烈。他们是满洲革命运动的一支伟大的势力，不容丝毫忽视。

.....

党必须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极力援助韩、蒙革命，特别是满洲韩国农民暴动普遍爆发，成为满洲革命势力中的一支有力军队，党应坚决的领导这些暴动，使这些影响发展深入到韩国内部去，以推动韩国革命的进展。<sup>①</sup>

## （二）中共对东北境内朝鲜居民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政策

### 1. 中朝民族联合抗日，建立朝鲜民族自治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强占中国东北，将这块中国土地霸占为它的殖民地。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包括先后被迫从朝鲜迁居到中国东北的大批朝鲜居民在内，都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奴隶。朝鲜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本来都是为了逃避被日本殖民主义奴役的命运，抛弃世代久居的家园

故土，来到毗邻的中国东北地区谋生。但是，曾几何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中国东北这一朝鲜移民的赖以糊口的栖息之地。这种现状，使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广大朝鲜居民从痛苦的切身经历中逐渐地认识到，如果再不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势将永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们的奴隶，永世不得翻身。只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才是不甘心忍受屈辱的民族的最后选择。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推动和领导下，他们便毅然地、再接再厉地同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其他各民族人民一道，投入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洪流中去，并且成为东北地区反侵略大军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将居住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的广大朝鲜居民当作是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方面军。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9 月 20 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满洲省委即联名向“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一切劳苦的革命群众”发出了《告群众书》，号召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朝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广大的中国各族人民一道，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去，争取中国的独立和朝鲜的解放。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前，由于中国共产党深入东北地区农村开展革命工作的时间较短，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中共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比较薄弱。只有在 1930 年吸收了众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自己的队伍，同时又引导大量居住在东北的朝鲜农民参加中国革命的行列之后，才奠定了党在东北农村地区的工作基础和组织基础。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动员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除发动各阶级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之外，还要号召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共同的抗日事业。在动员各少数民族中，朝鲜民族又是主要的动员对象，这不仅是因为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在少数民族中数量比较大，同时

<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满洲政治形势与党的工作任务的报告》（1930 年 9 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5 集，第 287、280 页。



也是由于朝鲜居民中大多数是无法忍受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实施的残酷殖民统治，而被迫逃到中国东北来的，此次日本帝国主义又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业已使他们走上绝路，欲求生存，惟有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条路了。因此，在东北地区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朝鲜族民众是继各地抗日义勇军之后的又一重要的抗日力量。此外，也如前述，中共东北地区的农村工作基础和组织基础，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是建立在各地朝鲜农民的聚居地区，共产党组织必然将朝鲜农民列为首要发动的抗日力量。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理论，根据东北地区各阶级、各民族对待抗日斗争的实际状况，迅速制定了中朝民族联合抗日和建立朝鲜民族自治区的方针政策。下列历史文献反映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东北地区的朝鲜民族所采取的基本政策。

1935年11月2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重要工作人员、中共吉东特委书记吴平（杨松）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论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一文。文中认为：

我们的口号就是：“中韩民族紧密联合起来，推翻日伪统治，建立间岛韩人民族自治区。”<sup>①</sup>

1936年3月12日，在《中共吉东特委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中，重申了上述主张：

对于东北韩国民族问题，吾党中央主张：A. 中韩民族联合共同抗日，争取中韩民族独立；而对于东满间岛，吾党中

<sup>①</sup> 中共吉林省委地方党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8辑。

央主张“中韩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日满统治，建立间岛韩人民族自治区”。<sup>①</sup>

上述历史文献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对待朝鲜民族问题的政策是正确的。即：第一，主张中朝民族联合抗日，争取中朝民族各自独立和解放。第二，中国国内各民族团结对敌，推翻日伪殖民统治，在朝鲜居民聚居区延边建立朝鲜民族自治区，实行区域自治。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一部分过去被迫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返回业已光复的祖国朝鲜，大部分久已定居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却仍然留了下来。他们同东北地区原有的朝鲜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一道，又继续投入了同企图抢夺抗日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斗争，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部分朝鲜居民经过一定的手续，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同原有朝鲜族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的成员。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十分关心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了若干民族自治区。其中，在东北的吉林省建立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其它一些自治县，使广大朝鲜族人民安居乐业，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 2. 建立朝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共产党针对日本殖民统治者令朝鲜移民散居东北各地分而治之的政策，为使朝鲜民族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起来，统一对敌，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解放，又提出了在朝鲜居民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8集，第10页。





中建立朝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前述1935年11月2日吴平（杨松）发表的《论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论文中认为：

在今天的间岛，除了用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现存的中国共产党组织，除了仍应多多吸收中韩革命工农分子加入党外，并且还要成立韩国民族革命党，该党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韩国民族独立而斗争。这个党的发起者可以而且应该是共产党员。它是目前间岛韩人反日统一战线的党，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而愿意争取韩国民族独立的韩国人都是可以参加。<sup>①</sup>

前述《中共吉东特委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中也认为：

在韩人内联合一切不愿当日本亡国奴的人，建立韩人内部反日联合战线。为（此）除吸收忠实的韩国工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外，还组织韩国民族革命党，其目的在推翻日本在韩国的统治，恢复韩国之独立，保护韩国祖国。<sup>②</sup>

关于建立朝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名称，考虑到能为更广大的朝鲜民族所易于接受，中国共产党又将原来所提议的“韩国民族革命党”改为建立“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组织性质、任务和斗争纲领不变。下列文献可资说明：

- 
- ① 中共吉林省委地方党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活动的历史资料》第8辑。
- ②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8集，第10页。

1936年11月28日，中共吉东特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在给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干部王润成、侯国忠的信中写道：

转部<sup>①</sup>寄到“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斗争纲领。因字迹模糊不清，以后再寄给你们。<sup>②</sup>

不久，1936年12月16日，周保中又给王润成和侯国忠写信说：

我们这边已开始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具体工作，你们也应加紧进行，你们自己规定计划。<sup>③</sup>

上述文献表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建议并且业已着手在各地朝鲜居民中开始建立“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作为朝鲜反日统一战线组织，联合一切朝鲜反日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赶走侵略者，实现朝鲜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 3. 建议组建“朝鲜民族革命军”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各级组织派遣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青年，到有党的工作基础和组织基础的东北各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时便有许多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农民，怀着对

- 
- ① 转部，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驻远东联络站的代号。
- ② 《5A·K给润成、国忠的信》（1936年11月2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6集，1990年版，第424页。
- ③ 《中K给王润成、侯国忠的信》（1936年12月16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7集，1991年版，第33页。



日本侵略者的旧恨新仇，踊跃地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工农义勇军和抗日义勇军。其中，南满地区的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海柳工农义勇军（后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延边地区的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县中韩工农义勇军，乌苏里江流域的饶河工农义勇军和稍后编成的北满地区珠河反日游击队、汤原反日游击队，吉东地区的宁安游击队、密山民众抗日军（密山游击队）等部队中，朝鲜族、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曾经成为这些部队的骨干和主要力量。1933年秋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的不断扩大与成长，并逐步统一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内部的民族成分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绝大多数部队都是以汉族战士、干部为主体，形成了东北地区各族人民联合抗日的武装力量。但是，在延边和辽、吉两省边界各县活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后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中，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还居于相当大的比例，其中特别是该军第一师、第三师（后分别编为东北抗联第二军第四师、第六师），或后来在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时期由第六师改编的第二方面军中，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的数量仍居于明显的优势。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日战争时期，对待自己队伍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参加东北抗日部队的朝鲜爱国战士，始终看作是阶级兄弟和亲密的战友。除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党籍问题，由于遵守《共产国际章程》的有关规定或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不能自行改变以外，其他一切问题都是从中朝两国和中朝两个民族共同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陷于亡国灭种危机的实际状况出发，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妥善地予以解决的。

下列历史文献，反映了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由自己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中，有朝鲜人参加的抗日部

队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政策。

……将目前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其他中国人的、韩国人的反日游击队伍，改编为中韩反日联合军，实行争取韩国民族独立。<sup>①</sup>

将目前东满人民革命军改为中韩抗日联军，并在东满成立单独的韩国民族革命军，到朝鲜国内部去游击，争取韩国民族独立。<sup>②</sup>

上述历史文献表明，中国共产党曾经建议将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延边地区的抗日部队，建设成为中朝联合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将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中朝抗日联合武装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单独组建为朝鲜民族革命军，以利于开赴朝鲜境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争取朝鲜的独立和解放。

其实，关于在朝鲜族、朝鲜侨民较多的延边地区，将抗日部队建设成为中朝联合抗日部队的方针，早在1932年冬至1933年春，珲春、汪清、延吉、和龙等县在建立统一编制的各县抗日游击队时便已经注意到了，由中共东满特委统一命名为各县“中韩工农游击队”（简称“中韩游击队”）。<sup>③</sup>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和东

① 杨松：《论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11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第8辑。

② 《中共吉东特委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1936年3月1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8集，第10页。

③ 见《延吉、汪清、珲春、和龙中韩游击队与汪清反日别动队告反日士兵书》（1933年3月）、《珲春县中韩工农游击第二大队告反日士兵书》（1933年5月3日）、《别动队和汪清、延吉、珲春、和龙中韩工农游击队为走狗同山好进攻别动队事件告中韩民众书》（1933年5月31日）。





满特委在延边地区建立抗日部队时采取这种各民族混合编组的方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促成的。首先,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自1928年建立组织后,虽然1930年有大批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进来,却并未按民族区别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同时,在这一地区所组建的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和抗日团体,也同样采取民族混合方式。因此,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党组织在这里组建抗日部队时,便依旧采用民族混合编制的方式。其次,延边地区是多民族混居地区,抗日部队采取民族混合编组方式,有利于民族团结,便于部队的活动。

1933年夏,中共满洲省委为贯彻一二六指示信,扩大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将各地工农义勇军、工农游击队统一编制、统一序列,统一改称东北人民革命军后,延边地区各县中韩工农游击队也自1934年开始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序列,统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但是,该军内部的民族混合方式并未改变,仍然是一支中朝联合性质的抗日部队。

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共产国际鉴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猖獗,日益威胁苏联和各国革命运动,决定各国共产党要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扼制法西斯势力。在中国,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外,在东北地区要扩大抗日游击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建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单独编为朝鲜民族抗日武装力量,并挺进朝鲜,扩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以便削弱日本侵略势力,减少其在东方对苏联的威胁。

1936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三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听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中国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后,返回东满,抵达吉林省宁安县镜泊湖北湖头附近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部驻地,会见了该军军长周保中

等领导人。魏拯民向中共宁安县委和第五军党委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编组东北抗日联军和撤销满洲省委另建四个省委的决定,还传达了将活动于延边地区的第二军部队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单独编为朝鲜民族革命军,并打回朝鲜等的决定。魏拯民同周保中还商讨了今后第五军与第二军东部部队联合作战及其发展方向,加强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等重大问题。当时正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和该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于同年1月20日前来第五军军部,参加第二、第五军特别会议,并于1月31日由第五军第一师政委关书范陪同西返额穆之后。魏拯民即行于2月9日在第五军调至第二军工作的王松柏等人陪同下,西去额穆会见王德泰等第二军领导人,以便对延边地区党组织和第二军部队进行重大变动的工作。<sup>①</sup>

此时,第五军由该军第一、第二师各一部和第二军一部合组的西路军,自1935年8月至1936年2月,在敦化、额穆地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开辟一片新的游击区后,正在回师宁安途中。魏拯民等人便是在镜泊湖南湖头地区同这支部队会合的。2月中旬,魏拯民立即在小夹吉河召开第五军、第二军西路军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前述重要决定。然后再由参加西路军的第五军、第二军部队的主要干部分别向所属部队连级以上干部传达有关内容。<sup>②</sup>会后,参加西路军的第五、第二军部队继续北返;魏拯民即率同前第二军第三团政委、并拟任该军师级干部的金日成等<sup>③</sup>一行,迅速经敦化南去安图县迷魂阵抗日游击根据地,

① 见李鸿文等译:《周保中日记片断》,《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3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4、145页。

② 见林春秋:《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回忆》,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60年版。

③ 《魏拯民给东满临时工作委员会及王润成的信》(1936年2月7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0集,第393页。





同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领导干部会合。

1936年3月上旬,由魏拯民召集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参加者有:魏拯民、王德泰、李学忠、周树东、安凤学、金日成、曹亚范等特委和军、师领导人。当魏拯民向与会人员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东北抗日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并展开讨论时,对于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关于将延边地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中朝反日联合军性质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并将该军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单独编为朝鲜民族革命军,挺进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扩建部队,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便随时开进朝鲜,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一节,却未获得东满党组织和第二军干部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完全同意。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革命领袖金日成在会上表示了下述意见。他认为:

在现阶段,为了把我国反日民族解放斗争引向大高潮,就必须使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到国境地区,逐步把我们的斗争舞台扩大到国内去。

今天,我们向国境地区和国内挺进的目的,是要更好地完成自己在朝鲜革命中担负的任务。

每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首先要搞好本国革命。不忠于本国革命的人,就不可能忠于世界革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过去,朝鲜共产主义者作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为光复祖国手持武器进行了浴血斗争;同时又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为世界革命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朝鲜共产主义者今后也必须致力于朝鲜革命,负责把朝鲜革命进行到底,并以此来支援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挺进到国境

地区去,就削弱同中国人民抗日武装部队的共同斗争。过去时期,朝鲜共产主义者同中国共产主义者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组织和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这次共产国际提出意见说,最好把在满洲活动的朝中抗日武装部队分成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进行活动。当然,今后随着形势的成熟,朝鲜人民革命军应该单独进行活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还是不能这样做的。

这是因为,如果硬性将在延边地区的中朝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分开,势必会削弱这一地区的中朝联合抗日武装力量和共同的抗日斗争事业,不仅损害中国抗日斗争事业,而且无益于朝鲜的民族解放事业。

金日成认为:

同时,从我们的斗争环境和条件来看,也是不能立即把部队分开的。我们要继续利用东南满大森林地带的有利地形,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直到我们打下能够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的牢固基础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该分别建制为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各自进行活动的,而应该以抗日联军的名义,共同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朝中人民的支持和声援。我们要以抗日联军的名义,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共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从而积极发展朝中人民的抗日革命斗争。<sup>①</sup>

由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东满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领导干部会议的共同决定,按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

<sup>①</sup> 《金日成著作集》第1集,朝鲜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105页。





有关建议，将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任政治委员，刘汉兴任参谋长，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该军下辖三个师，即第一师，师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第二师，师长史忠恒（陈翰章代理）、政委王润成；第三师，师长金日成、政委曹亚范。

此后，为实行向中朝边境发展的战略意图，同时与战斗在南满地区的由杨靖宇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靠拢，两军密切配合对敌作战，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在师长金日成的率领下，自延边地区移师西南，向抚松、临江、长白进军，沿长白山西麓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时进出朝鲜，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该军第一师进入敦化、桦甸、濛江（今靖宇）一带活动；该军第二师仍在绥宁地区同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协同对敌作战。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军队和八路军解放东北，收复失地。东北抗联部队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战士，在金日成的指挥下直趋朝鲜，配合苏军解放祖国，为朝鲜祖国的独立与民主事业继续做出了贡献。

#### 4. 建议参加中共组织的朝鲜同志可单独成立党小组和党支部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1930年大批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时，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及其它各地党的组织，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并未按民族区别将他们单独编为朝鲜人党小组或党支部，而是采取民族混合方式统一编组党小组和党支部。这种情况在九一八事变后也从未改变。

但是，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曾经预计因各国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并发动侵略战争，势必引起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和掀起反法西斯的战争，国际局势将出现大的事变，认为各国人民和共产党必须准备迎接这种大事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经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迎接这一大事变中，不仅应在国内促进全国抗日斗争的新高潮，而且应将在自己队伍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武装力量单独组织起来，以便随时打回朝鲜去，赶走日本侵略者，争取朝鲜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如前所述，1936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返回东北，相继向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传达了上述提议。同时，中共代表团还令中共吉东特委向所属各级党的组织和抗日部队传达了上述提议。下列文献，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地区朝鲜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其中关于中朝民族联合共同抗日、建立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关于建立朝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关于将延边地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为中朝抗日联军，并在该地区成立单独的朝鲜民族革命军部队，已如前述，故从略）。现仅将有关在中共东北党组织内单独编组朝鲜人党小组、党支部的建议，抄录如下：

D. 为着便于训练党内同志，为着秘密工作起见，韩国同志单独成立党小组及党支部，但共同区委或县委。在县委或特委下应成立一个韩人工作部，其部长参加县委和特委。

这一目前吾党之政治主张，可通知各韩国同志，并在韩人内本此方针而工作之。在工作中当然要注意日寇派奸细到内部来。<sup>①</sup>

上述建议说明，凡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除党的省委、特委、县委以至区委组织仍是统一组织之外，可单独设

<sup>①</sup> 《中共吉东特委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1936年3月1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8集，第10—11页。





立党的小组和党的支部等基层组织，以便于训练党员和开展秘密工作，便于从事新的任务。

不过，这一提议，同前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欲另行编组朝鲜民族革命军的提议一样，未能获得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内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完全同意，只能暂时作罢。

#### 5. 关于在中共东满党组织内部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内部开展反“民生团”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当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内部还在就采用何种方式和体制在中国东北建立殖民地统治进行策划的时候，即为欲图达到既能欺骗世人，又能牢牢控制这块已被其武装占领的殖民地的目的而处心积虑加紧谋划的时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朝鲜总督府的唆使下，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的积极串连筹划，又经日本殖民当局驻间岛总领事馆的批准，于1932年2月15日在吉林省龙井公开成立了“民生团”。这是一个以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成员限于朝鲜人。它极力鼓吹“韩人自治”的主张，为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使“满洲独立”的阴谋服务，同时借以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联合，达到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的目的。“民生团”自成立后，积极配合日本侵略军对抗日军民的“讨伐”，派人四出游说，散发传单，扩充组织，筹建反动武装，并妄图派其成员打入抗日组织内部进行破坏活动。

“民生团”这一反革命组织出现后，中共东满特委和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抗日军民予以彻底揭露和坚决打击，使其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被完全暴露出来，人人侧目，其反革命活动日益困难。

1932年3月，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当局日益感到“民生团”鼓吹“韩人自治”的口号，已

经不利于它在满洲的统一的殖民地统治，并将会严重威胁它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于是，在这一反革命组织成立刚刚5个月的时候，便迫使它在同年7月14日公开登报宣告解散。

但是，“民生团”解散不久，8月，中共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秘书宋老头突然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时隔一周又被轻易释放。延吉县委在对宋老头事件进行审查期间，反日游击队在境内抓获老头沟日本宪兵队的翻译二名，经审讯，供出宋老头是日本宪兵队派回的密探。县委立即严刑拷问宋老头，宋供认自己是“民生团”，并供出20余名“同伙”。县委又对其供出的许多“同伙”连续突击逼供，结果越供越多。据此，延吉县委认为“民生团”名为解散，实际依然存在，而且业已钻入党组织和抗日队伍内部，十分危险。于是，县委便迅速在全县党、团组织和游击队内部开展了反对“民生团”的斗争。接着，中共东满特委也未经认真调查，便据以在整个延边地区的党、团组织和各县反日工农游击队中，展开了反“民生团”斗争。这一斗争，自1933年春至1935年春，越演越烈，许多党和团组织的领导干部和工农游击队以及后来建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中的领导骨干遭到逮捕和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据后来的调查，几乎所有被打成“民生团”的人，都是仅凭口供，毫无其他证据，便被定罪，其中除乘隙逃跑者外，许多人被监禁，不少人被处死。结果致使延边地区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其他抗日组织遭受严重损害，陷于瘫痪状态；人民革命军部队经过大清洗之后，出现了缺少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危机，严重的影响了抗日武装斗争事业的发展。

本来在一场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势必时刻采用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手段，妄图摧毁抗日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队伍，而中国共产党也必然针锋相对地同敌人在各条战线上展开殊死的斗争。因此，1932年2月自“民生团”出现后，中共东满特委及时领导抗日军民给予这一反革命组织以严厉





的打击无疑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一年上半年的反“民生团”斗争取得了成功，“民生团”被迫宣告解散。但是，1932年8月以后的反“民生团”斗争却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这一严重错误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其豢养的“民生团”宣告破产之后，又在1934年9月成立另一特务组织“协助会”，由“协助会”派遣特务混进抗日游击区内，书写假信，散布谣言，制造许多“民生团”分子业已钻入党、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队伍的假相，扰乱了人们的视线。其次，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大举入侵，东北处于国破家亡、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人们普遍对敌人怀有刻骨仇恨；党、团组织又缺乏反奸斗争的经验，结果一旦发生敌情便不能清醒地识破敌人的阴谋，反而中了敌人的反间计。第三，当时正值“左”倾错误统治中共中央时期，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工作中较为普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这种错误也势必对东北地区党的工作产生影响。表现为有些领导干部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中，曾经参加过民族独立运动或者参加过前朝共的某些派别的党员干部不能予以充分信任，以至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将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民生团”嫌疑分子进行斗争和清除。第四，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远离延边，加之敌人的封锁，很难及时发现并纠正这一错误。中共东满特委和所属各县党组织对斗争中捕人、杀人缺乏严格控制，不重证据，不重调查研究，普遍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斗争方法，势必造成株连一大片，伤害无辜的严重后果，以致出现组织瘫痪，斗争陷于无法继续的地步。东满特委不得不多次写信给满洲省委，要求省委对延边地区的反“民生团”斗争的方针政策给以指示，并速行派出得力干部到延边予以实地指导。

1934年秋，中共满洲省委在了解到延边地区反“民生团”斗争的一些情况后，虽然对东满特委在1932年8月以后继续在党、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内部进行的反“民生团”斗争仍然缺乏全面

的和实际的了解，依然对这一阶段斗争的性质作出错误的认定，但省委对东满特委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已经发生的打击面过宽、只凭口供不重证据，党委未控制捕人、杀人等错误现象，及时给予了批评，令行纠正，并为此于同年10月1日给东满特委和人民革命军全体同志写了一封信<sup>①</sup>。同年冬，满洲省委和省委吉东巡视员进一步了解到延边地区反“民生团”斗争的严重情况之后，即行派出党的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赴延边工作。随后又分别给东满特委写信。1935年2月1日党、团满洲省委在信中批评了延边地区发生的破坏反日统一战线的错误和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错误，强调必须予以纠正<sup>②</sup>。省委吉东巡视员吴平在2月10日的信中指出：有人“估计（延边）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信中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sup>③</sup>

1935年1月，魏拯民辗转到达延吉县三道湾区张芝营抗日根据地后，迅即同干部和群众进行谈话，召集有关人员座谈，实地了解延边地区抗日工作情况和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问题。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并做了各方面的准备之后，于2月27日至3月3日在汪清县大荒崴召开中共东满特委、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魏拯民、王德泰、李学忠等20余人，其中半数人为朝鲜同志。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共东满特委、团特委在贯

① 见《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1934年10月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0集。

② 见《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给东满党团的信》（1935年2月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1集。

③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1935年2月1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1集。





彻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和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严重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虽依然肯定这一时期反“民生团”斗争的必要，但却要求“运用正确的策略消灭民生团的组织，肃清民生团影响，把东满的党、团从敌人的内外夹攻之下挽救出来，巩固起来，扩大起来”。会议在所作出的《反民生团斗争的决议》中还指示，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必须禁止采用逼供信的错误手段；要区分“民生团”的首恶与下层分子，对一般分子要以教育为主；在特委领导下组建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反民生团的斗争并予以控制。

会议最后选出魏拯民等7人组成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魏拯民为特委书记。

3月21日，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在汪清县腰营沟，召开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联席会议。魏拯民、王德泰、李学忠和金日成等11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加强人民革命军的建设和今后活动方向问题，同时又继续讨论了反民生团斗争的问题。会议再次强调成立特委领导下的肃反委员会审问团，专门负责审查民生团案件，凡涉及民生团案件均须由肃反委员会讨论决定，各地党组织不得任意解决民生团问题，更不许随意杀人。从而由特委控制了反“民生团”斗争的规模和最后处置权。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错误做法给予了抵制，并在纠正错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延边地区的反“民生团”斗争开始纠正，并实际上停顿下来。

不久，魏拯民借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包括反“民生团”斗争在内的党在延边地区工作的全面的口头和书面报告，听取了代表团的意见。1936年3月，他辗转返抵安图县迷魂阵根据地，即行召集中共东满特

委和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代表团的有关军队和党的建设工作的指示。其中，检查了一年反“民生团”斗争的实际情况，决定对仅凭口供查无实据而被定为“民生团”的，尚在奶头山根据地的100余人解除监管，重新编入部队。至此，延边地区发生的反“民生团”斗争终于停止了。

纵观延边地区在抗日游击战争时期发生的反“民生团”斗争，起初是正确的，使“民生团”这一反革命组织仅仅活动了5个月便销声灭迹了。但是，由于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后，将反“民生团”斗争转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内部进行时，则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当时条件下的产物，是历史上的苦果，后人应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只是，这种错误绝不是如同国外某些出版物所说的是由“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事大主义”等造成的。持这种说法的人，如果不属有意中伤，至少属于偏见。因为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反“民生团”斗争只限于朝鲜人，而未涉及汉族人。其实只要了解“民生团”的成立及其所从事的反动活动本来就限制在朝鲜人的范围内的这种基本事实，因而当时发生的反“民生团”斗争当然只能发生在朝鲜人之中，也就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难以理解了。

#### 〔附〕活跃在华北抗日战场的朝鲜义勇军

为了使人们对于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和华北曾经同时存在过的几支朝鲜的国际主义部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现将活跃在华北战场的朝鲜革命军的情况附带作一简要介绍，以便广泛地了解这种历史的现象。历史资料如下：

朝鲜义勇军……是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正式成立的。从七七事变以后，中华民族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在华朝鲜革命者，为着直接参加这个正义的战争，





更为着在抗战过程中争取祖国独立”(朝鲜义勇军成立宣言),而不分党派与信仰的一切区别,在反日复国的共同目标下,并且团结在关内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旗帜下,在汉口成立朝鲜义勇军。

朝鲜义勇军的同志们……他们的意志是一致的:参加中国抗战,争取朝鲜独立。到1938年,日本法西斯强盗正向当时的中国抗战中心武汉进攻时,所有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革命者同盟、朝鲜解放同盟、朝鲜青年前卫同盟等等,都来到武汉,在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因各党派的要求而成立了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并且以这个统一团体为基干,而组织了现在活跃在中国各战场上的国际队伍——朝鲜义勇军。在中国的6个战区,13个省份,都有朝鲜义勇军同志的足迹。现在活跃在华北的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即华北朝鲜独立同盟的武装力量,他们誓死“为华北的20万朝鲜同胞的一切利益而斗争”,他们把“打败日本之后,联合朝鲜国内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作自己奋斗的目标。<sup>①</sup>

……1940年,当华北八路军对日本侵略者举行了轰动全国的“百团大战”以后不久,有一批活动在敌占区和来自国民党区的朝鲜爱国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山的涉县西达镇与八路军进行了隆重的友谊的会师。在会师大会上,用不同的语言喊出了同一的口号:“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批朝鲜同志来到根据地以前,在八路军里面原来就有一部分朝鲜同志,他们有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的,还有

少数参加过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后来所有这些朝鲜同志汇合起来,并以后者为骨干正式编成为朝鲜义勇军。他们还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朝鲜解放同盟。义勇军与同盟的总部设在太行山根据地,华北其他各根据地均组织有义勇军支队与同盟支部,他们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八路军的统一指挥下与日本强盗进行作战。这样,一支朝鲜人民的爱国武装在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中形成与壮大起来。<sup>①</sup>

从上所述,朝鲜义勇军最初是在中国进行活动的几派朝鲜爱国主义团体联合组成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的直接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部队。这支部队,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并且占领了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大量土地、危及武汉的情况下,即业已危及这些朝鲜爱国主义者的最后避难所的危急情况下,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争取朝鲜祖国独立的共同目标下,经过当时中国政府的同意而成立的。他们活跃在中国的各个战场上,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其中的一支部队,在1940年到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所开辟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同原有早已参加中国革命和抗日事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主义战士汇合起来,并且以后者为骨干正式编成为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和朝鲜解放同盟。这支部队从此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八路军的统一指挥下,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血战并逐步成长起来。

朝鲜义勇军这支部队同活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中的朝鲜爱国武装力量一样,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与中国抗日军队并肩作战的朝鲜抗日武装力量。

<sup>①</sup> 重光:《朝鲜义勇军》,《解放日报》1942年9月20日。

<sup>①</sup> 唐平铸:《追忆活跃在华北抗日前线的朝鲜义勇军》,《新华日报》1950年11月13日。



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这支部队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也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国际主义战士。

这支部队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之后，随同八路军进军东北的部队一同开赴东北，参加了东北的解放战争。后来，其中的一部返回了朝鲜。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东北和华北曾先后有朝鲜的国际主义队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部队和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斗争，支援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或民族解放事业。他们在中国活动的期间，曾经采取了不尽相同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所采取的方式也不完全一致。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们都是崇高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 八、中朝抗日战士并肩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部队。由于历史的原因，一部分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了共同的抗日事业。他们肩负着支援中国抗日事业和促进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的双重任务。因而当时在东北地区由朝鲜共产主义者所创建的抗日武装力量，便一同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工农义勇军，后来又共同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向着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作战。所以，东北抗日联军又是一支国际主义的抗日部队。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及其所创建的反日游击队，当时便参加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并一直维护着这支联合抗日部队的团结和统一，为中朝人民的共同抗日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广大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战士在中国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是以勇猛顽强，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纪律严明著称的。他们在建立抗日部队，开辟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长期斗争中，功勋卓著，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中朝抗日战士在长期并肩作战共同抗日战斗中，用鲜血凝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如前所述，由于朝鲜共产主义者及其所组建的抗日武装队伍一开始便一同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共同对敌作战，因此，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前身——反日游击队、工农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直至1945年上旬为止，这支部队始终采取不分民族混合编制和统一





建制。其中唯有活跃在延边地区和通化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后改为第六师）和后来由该师改编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由于这支部队的主力部队——第七团中，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数量较多，金日成成长时期任这支部队的师长和指挥官；由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曾有过将在延边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中，单独编组朝鲜民族革命军的建议（尽管后来并未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中分别组建单独的中国人部队和朝鲜人部队），因而，当这支部队多次到朝鲜境内作战时，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举着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号，有时则使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名义。

正是由于东北抗日联军始终采用民族混合编制方式，所以在记述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的历史时，便很难将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的战绩和贡献单独予以划分出来。著者只好将同某些著名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将领有密切关系的抗日斗争事迹，分别简略记述之。

#### （一）金日成参与或指挥的抗日部队在吉辽两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 1. 九一八事变前延边地区反日斗争

旧吉林省延边地区和旧辽宁省东边道地区是中俄（后为苏联）或中朝边境地区。历年朝鲜移民多居住于这里，大多为贫苦农民。九一八事变前，这些朝鲜农民不但并未完全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增加了中国封建军阀的一种压迫和更为沉重的封建地主的盘剥。因而，他们具有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封建军阀、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的要求，各种反抗斗争此伏彼起。

一些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相继在这些地区开展政治活动。他们在朝鲜居民区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爱国群众组织，以至建立武装力量和政权组织，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19年朝鲜国内爆发的三一独立运动，使延边地区的朝鲜居民深受鼓舞，在各反日团体的联合主持下，于1919年3月13日，3万余反日青年学生和反日群众集会龙井，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朝鲜独立运动。会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同日本侵略者和地方军警发生流血冲突。运动迅速扩大到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城乡，还扩展至东边道的柳河、通化、长白、宽甸等地城乡。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这些地区的反日运动再接再厉，并纷纷建立秘密团体和军事组织。据日本统计，1920年夏，仅延边各地即有较大数量的朝鲜人反日武装7支，人员达2900余人，拥有2000余支枪。同年在中朝边境地区活动的反日武装人员达1651人次。<sup>①</sup>其中，6月上旬，由著名朝鲜爱国主义者洪范图指挥的反日武装队伍，在汪清县枫梧洞与日本军警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共毙敌150余名，另伤其数十名。<sup>②</sup>

对延边等地抗日斗争的发展和抗日武装力量的成长，日本侵略者十分不安，积极向中国军阀和东北当局进行交涉，准备协同“讨伐”抗日武装。1920年10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发生于同年9月30日、10月2日土匪袭击珲春县城，烧毁日本领事馆、击毙日人等（即“珲春事件”）为借口，命令早已准备就绪的日本驻朝鲜占领军一部和自西伯利亚撤回的干涉苏俄的侵略军一部，从南、东、北、西方向突然出兵侵入珲春、和龙、延吉、汪清、东

<sup>①</sup> 《日本外务省档案》高警第34318号（1920年10月29日）。

<sup>②</sup> 《吉长日报》1920年6月22日。





宁、宁安、海林、穆棱等地。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不分朝鲜移民和中国人民，肆行烧杀迫害，疯狂抓捕反日分子和围攻抗日武装。日军此次大规模入侵，实属后来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为打击日本侵略军，延边各反日武装集会汪清，决定联合对敌，并向长白山区、和龙一带转移，以便集中力量待机歼敌。10月21—25日，反日武装在青山里附近的白云坪、卧龙一带，同日军发生10余次战斗，即史称“青山里战斗”。反日部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实行机动灵活的伏击战和游击战，将日军引入迷宫般的山区，使其腹背受敌，不得施展。结果共消灭日军加纳骑兵联队长以下官兵9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数百支，取得重大胜利。然后，延边反日武装化整为零，向中苏边境转移。

日本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民众纷纷声讨日本侵略者，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驱逐日军，维护主权。日本侵略军迅速陷入政治上十分孤立的境地，日军官兵到处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仇视，终日胆颤心惊，终于在1921年5月被迫撤军。

此后，延边地区、东边道地区抗日武装斗争虽然处于低潮，但是，新的斗争却正在酝酿着。已如前述，19世纪20年代前期，一些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的朝鲜先进分子，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居民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建立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5年朝鲜共产党建立后，1926年5月建立朝共满洲总局，并在朝鲜居民聚居区陆续建立起若干基层组织和爱国团体。

1924—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也使得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分子深受鼓舞，跃跃欲试。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中共中央为统一对东北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加强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使之与南方的土地革命运动相配合，于1927年10月

建立了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此后，中共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将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推翻奉系军阀反动统治，发动工农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1928年初，满洲临时省委即行专门训练一批干部和参加过黄埔军校或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干部，派赴东边道地区的柳河、兴京（今新宾）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村割据”的工作，并建立中共东南特委组织以直接领导这一斗争。

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在东边道地区开展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因主观和客观条件尚不成熟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它标志着中共在东北地区开展农村工作的开始，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东北地区党的组织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实行“上山”，在农村建立武装割据工作的一种尝试。

与此同时，在满洲临时省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在东边道地区、中东铁路沿线、辽沈地区建立起若干农村支部组织，开展了农民运动。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始发展起来。

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致满洲临委信》。9月下旬，满洲临时省委召开东北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除通过《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大会决议案的决议》外，还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将中共中央指示的“建立农协，在农村中组织党的支部，吸收最急进的雇农、佃农，发动农民部分（的）斗争，在这些工作过程中，注意创造农民武装等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当作自己开辟农民运动的路线。此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满洲省委，以加强对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延边地区的革命工作。1928年2月，满洲临时省委委派被聘去龙井《民声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周





东郊在延边地区开展党的工作。此后，陆续从北京慈幼院到延边地区从事小学教师工作的知识青年中，转来10余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增强了中共在延边的力量。8月，即行建立了中共东满区委组织，并在各地建立了若干支部组织。东满区委利用《民声报》和中小学校的阵地，在延边地区广泛传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等革命道理。

在此期间，正值朝鲜共产党处于极端困难之中。1928年3月组成的朝共第四届中央，不久即连续遭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大破坏，从此朝鲜共产党不仅在其国内陷入瓦解状态，而且它在海外的组织（包括在中国的朝共满洲总局及其下属各基层组织）也处于分崩离析境地。为此，1928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令朝鲜共产党重建，否则不再承认朝共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后来，实践证明，依靠业已陷入分裂的各派朝共党人潜返朝鲜国内重建朝鲜共产党的工作，一再遭受日本殖民主义当局的破坏，独立重新建党终于失败。各派朝共党人只好分别决定解散组织，就近加入居留地各国的共产党组织。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春，身居中国东北各地的朝共各派先后宣布组织解散，朝共党人纷纷向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提出，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有关规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通过满洲省委令各地党组织就近对申请加入中共的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进行必要的审查之外，还准备通过重大的革命斗争实践对所有申请者进行考验，考察其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性，决定取舍。

当时，正值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尖锐。1929年各派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3月，蒋桂之战；5月，蒋冯桂之战；6月，桂粤之战；9月，蒋粤之战；10月，蒋冯桂之战；12月，蒋唐之战。1930年4月，蒋、阎、冯、桂之间更大规模的军阀战争正在酝酿。客观上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经

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工农红军发展至约10万人；革命根据地大小近10块，已经粗具规模；在城市，共产党组织和白区工作也有一定的恢复与发展。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sup>①</sup>。信中特别指出在满洲发展并扩大游击战争的重要<sup>②</sup>。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1月11日通过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将在全国范围内“争取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sup>③</sup>，作为党的总任务。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号召全党“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总示威运动”，借以“推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的到来”<sup>④</sup>。当然，这是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的结果。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于4月5日，以满洲党团省委名义作出《对于五一的工作决议》。该《决议》认为：“五一全国总示威的运动，在满洲只要有党团组织的地方，都必须坚决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指出除在大城市组织政治罢工与示威外，“其他在我们与群众组织比较有基础的农村，如台安、延吉、柳河等处，同样应当坚决举行广大群众的示威”<sup>⑤</sup>。

①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791—792、798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27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37页。

⑤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集，第325页。





延边地区被选为开展革命斗争的首要区域，同这一地区所具备的易于爆发革命运动的社会条件有密切关系。延边位于中朝边境区域，朝鲜居民集中，他们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改变现状的要求十分强烈，富有革命传统。1930年1—3月，延边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继而扩展至各界群众，先后为响应朝鲜光州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和纪念朝鲜三一运动11周年，连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场反日斗争，虽然一再遭受日本驻龙井领事馆武装警察的迫害，革命青年被大批逮捕，但是斗争并未停止，而且正酝酿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

此时，中共延边特支因势利导，于4月24日，联合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共同组成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决定在延边各县开展大张旗鼓的“红五月斗争”，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同时，决定通过这一场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考验所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以便确定是否吸收入党。

在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中，提出了土地革命、反对高利贷、抗租、抗税等口号，“尤为群众所欢迎”<sup>①</sup>。5月1日，在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龙井的几百名各业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20余所中小学全部罢课。六道沟200余工人、学生实行罢工、罢课。平岗、石门、头道沟、子洞、明东、北蛤蟆塘、六道沟等地农民纷纷罢耕，举行示威。5月5日，在头道沟附近的药水洞农民举行了600人规模的示威。5月21—25日，延边各地在中共党组织及其组建的游击队武装的保护与鼓动之下，出现了农民群众焚烧高利贷主的大量契约帐据，没收地主家粮食分给农民，打击日本走狗和土豪劣绅等激烈的斗争。5月26日，中

共延边特支领导农民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和龙县药水洞建立了农村苏维埃政府，并扩大了已有50余人的农民赤卫军（也称延和游击队）。这是东北地区建立最早的农村苏维埃政权。

延边农民的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五卅暴动，达到了新的高潮。中共延边特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经过相当准备和组织之后，在5月30日夜，在延边特支特务队、药水洞农民赤卫军的支持下，延吉、龙井各地工农群众同时举行大暴动。一夜之间，群众捣毁了老头沟等地的天（宝山）图（们）铁路和开山屯的铁路桥梁，炸毁龙井的日本东洋拓殖会社间岛派出所、龙井发电厂，火烧头道沟、六道沟等地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和日本走狗朝鲜民会、日本学校等等。暴动中，一些地方又烧毁了地主、高利贷主的大量租约借据，没收了许多地主的粮食。平岗、大砬子等还组建了农民武装，开展了游击活动。

延边农民暴动的影响迅速向周围地区扩展，不久，敦化、额穆（今属敦化市）等地爆发了新的斗争。敦额暴动事先即建立了暴动总指挥部，由中共满洲省委派往延边的巡视员朴允瑞任指挥，决定依靠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和武装力量，以敦化、额穆两县边界的黄泥河、新开道两地为中心举行暴动。7月31日，集中敦化黄泥河附近的400余农民，以仅有的8支枪为先导，冲入镇内，少量驻军未敢抵抗即被缴械。同时，集中在新开道的250余名农民，用仅有的2支枪乘敌不防突然包围敌保卫团防所，将10余名团丁一律缴械。8月1日，蛟河农民破坏了吉敦铁路线上两座桥梁和电话线路，敦化西南部农民袭击马号。影响所及，额穆县官地、宁安县以及安图县大甸子农民，也发生袭击军警驻地，分配地主粮食等斗争。和龙县药水洞苏维埃区的延和游击队、延吉县老头沟煤矿工人还曾前往助战和支援。

延边和敦额农民武装暴动直至同年9月上旬还在断续发生。

在这场斗争中，各地普遍注意建立苏维埃政权。药水洞、五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3集，第249页。





道沟、长仁江等地召集了苏维埃准备会议。10月19日，成立了延和革命委员会。之后，汪清、延吉五道湾也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斗争中，各地将建立红军游击队作为重要任务。最早建立的延和游击队改称平岗工农红军游击队，部队60余人。汪清罗子沟建立了一支有20余名队员的游击队。此外，各地农村纷纷成立赤卫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边各地的赤色游击队共约200余人，赤卫队达300余人。此外，在斗争中，各地都建立或扩大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等群众组织，有组织的农民达6000余人。在斗争中，延边地区中共党组织吸收了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前朝共产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入党，党的组织不断扩大。同年8月13日，由中共延边特支扩大成立中共延和中心县委，10月初又正式组建了中共东满特委，下设延和、汪清、珲春、安图、敦化等县委组织，中共党员曾发展至近1000名。

上述斗争，后来在日本驻延吉领事馆警察署派出的大批日本武装警察和东北军阀政府调派大量军队进行的“联合进剿”下，暂时遭受失败，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农民被捕、被杀。但是，延边地区历次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壮大，革命群众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农民赤卫队的建立，都为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延边地区能够迅速组建起许多支抗日游击队，实现中朝抗日战士并肩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2. 中朝反日游击队时期的斗争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南京政府却下令东北驻军不许抵抗，结果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3000万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最前列。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连续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

的殖民地”的侵略罪行，同时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可耻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东北同胞誓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将其驱逐出东北的决心，号召各阶级采取各种方式直至拿起武器，同敌人血战到底。

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振奋了各阶级，各民族的斗争精神，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当时，尚留在东北而未撤向关内的一些东北军部队，在敌军进攻面前首先揭竿而起，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马占山指挥江桥抗战，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辽西民众自卫义勇军的辽西阻击战，此伏彼起。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队伍曾扩展到30余万人之众，遍及东北三省和热河省区的各个角落，给予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地抗日武装成长起来之前，东北义勇军一直是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主要武装力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指示》，指出：“满洲的形势是极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目前满洲有三个很好的条件利于游击战争的发动，（1）广大的士兵群众在生活上政治上都陷入无出路的境地，在那里等待党去领导与组织他们；（2）满洲的局面是混乱与恐慌，不但中日统治阶级无法统治，相并而来的工人贫农士兵在城市的骚动与抢米的斗争；（3）农民骚动的烽起与以前东满、北满、南满游击战争的基础。”因而要求各地党组织应不迟疑地、大胆地、有计划地去发动并领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还指示，“在开始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要找出群众斗争比较活跃、统治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以）游击队作群众武装斗争的前锋，群众作游击队的基础，游击队与群众配合起来才能开展游击区域与加强扩大游击队。”中共中





央明确地指出了党在东北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东满特委十分重视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中共满洲省委调派前大连特委书记童长荣到延边任东满特委书记，领导延边地区的抗日战争。同年12月，童长荣在抵达延边后，首先在延吉县瓮声砬子（即今安图县明月镇）召集各县党、团积极分子会议，布置建立武装队伍，开展反日游击战争的任务。会议认为，利用延边地区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和历史上形成的深厚革命基础，迅速建立反日游击队和开展反日游击战争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前吉林军第廿七旅虽然在旅长吉兴率领下投降敌人，但该部队中若干营、连官兵并不甘心事敌，正在酝酿抗日。其中，原驻瓮声砬子的该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王德林部，即因对日本侵略者和投敌长官的不满，正在延吉县小城子积极准备起义抗日。因此，延边各县共产党组织除以主要力量筹建反日游击队外，还先后派遣200余名党员利用各种方式参加后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简称吉林救国军）。

中共东满特委为发动广大农民，首先在1931年秋和1932年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在这一斗争的基础上，普遍在各地建立起反日会和赤卫队。2月20日，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认为“发动游击战争，是东满目前主要的任务”，并且要求迅速在群众斗争中，建立游击队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从此中共东满特委便将建立游击队，发动抗日游击战的工作，普遍地在延边各县、各地区开展起来。

珲春县工农反日游击队的创建筹备工作，在延边开始得最早。1931年末，中共珲春县委就成立了“军事准备委员会”，筹建抗日武装。1932年1月和3月，先后在大荒沟和烟筒砬子分别建立了别动队和突击队，开始袭击日伪军警，夺取枪支，于同年夏正式建成荒区工农游击队和烟区工农游击队。同时，珲春县委还派遣党、团员到救国军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和进行工作，荒区工农游击

队还配合救国军部队攻打珲春县城。11月，珲春县委决定将上述游击队合并统一成立珲春中韩工农游击队，1933年3月又改称珲春中韩工农游击总队，人员达120余名。

延吉县工农游击队建立也较早，是先后由依兰沟、老头沟、八道沟、三道湾、松林洞、烟集岗、海兰区等几支农民赤卫队汇合而成。1932年9月正式建立延吉工农反日游击队，1933年1月扩编为延吉中韩工农游击队，人员达120余名。

和龙县在中共龙县委领导下，也以开山屯、大砬子、平岗、三道沟农民赤卫队为基础，分别建立了开山屯、大砬子、平岗等3支工农游击队。1932年12月合并组成和龙中韩工农游击中队，1933年春又扩大为游击大队，人员共80余名。

汪清县工农游击队，开始也是由几支小型游击武装组成的。1932年初，小汪清的几个赤卫队的党、团员，化装成救国军，闯进大坎子公安局解除伪警察枪械7支，3月即在小汪清成立工农游击队，由金哲任队长。同时，中共汪清县委还派出10余名党、团员参加吉林救国军吴义成部队，被编为救国军别动队，由李光任队长。汪清工农游击队和救国军别动队经常配合对敌作战，7月，他们共同伏击来犯之石砚伪自卫团，缴枪10余支。10月，又联合在南蛤蟆塘伏击伪军孟营一排人。11月，自宁安县辗转而来的绥宁工农义勇军，同别动队一起合并于汪清工农游击队，正式成立了汪清中韩工农游击大队，下设3个中队，游击队员共90余名，由梁成龙任大队长。1933年2月，来自安图由金日成率领的反日游击队到达汪清，即由中共东满特委将它编入汪清中韩工农游击队。

金日成，又名金成柱，1912年4月生于朝鲜平壤万景台。其父金亨稷是一位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者，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因遭日本殖民统治者迫害流亡中国东北，继续从事祖国独立活动。金日成14岁时闻父被捕，孤身一人离开万景台祖父家，到





中国东北投奔父母，居于抚松。少年时期的金日成便开始协助其父的革命工作，完成一些秘密通信联络任务。1926年10月，由金日成发起组建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团结了一批青少年为朝鲜祖国独立而斗争。1927年春，离家进吉林毓文中学读书，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和革命青年密切往来。8月，金日成发起并组建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投入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活动。1929年秋至1930年春，在吉林被反动警察逮捕，关押于吉林监狱中。1930年5月出狱，不久前往卡伦，集合一批朝鲜革命青年组建建设同志社，倡议创建朝鲜革命军。1931年5月，前往延吉县瓮声砬子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安图也进行了创建工农反日游击队工作。安图中共党组织属和龙县委的区委组织。安图人民的反日情绪很高，王德林部队击毙日本修筑敦化至天宝山铁路的满铁测量队2名队员的事件，就发生在后来划入该县的瓮声砬子，群众基础较好。1931年末至1932年初，安图县南部的兴隆村，大、小沙河一带就有少年先锋队、农民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培养了一批青少年反日骨干力量。1932年春，共青团东满特派金日成到安图县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武装。他在该县小沙河土器店沟对欲参加抗日武装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不久，为便于以后活动，经过与活动在安图县一带的救国军于学濤部队的协议，将其训练的抗日武装编为救国军于部的别动队。1932年4月25日，正式成立了安图反日游击队，主要成员有车光秀、金哲熙、李英培等人。游击队中有3名共青团员，经中共和龙县委同意将他们转为中共党员，在队内建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队长由李英培担任，并兼党支部书记。<sup>①</sup>这支抗日队伍，对外仍称吉林救国军别动队。

<sup>①</sup>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

1933年初，安图反日游击队随同救国军驻安图于学濤部队自两江口辗转向汪清转移，2月到达汪清，并在腰营沟初试锋芒，利用有利地形地物，将前来进攻的一支80余人的日军一举击溃。日军死伤几十人。然后，部队到达中共汪清县委和汪清中韩工农游击大队所在地——小汪清。这时，正值包括汪清在内的延边各地建立中韩工农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工作已经粗具规模，开始显示威力的时候。

安图反日游击队的到来，增强了汪清抗日武装力量，经过中共东满特委，将这支游击队编入汪清中韩工农游击大队。由于金日成在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东北参加了共产党<sup>①</sup>，他被中共东满特委任命为汪清中韩工农游击大队部党的书记。

1933年春，包括延边在内的东北各地著名的抗日义勇军将领及其所率领的大量抗日武装，被日本侵略军集中兵力给予各个击败，相继越过中苏边界退入苏联，再由苏联协助返抵关内，或者直接辗转退入关内。吉林救国军将领王德林、孔宪荣等带领部分部队退出东北抗日战场。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并未随同一起越界入苏。其中，滞留在延边和宁安、东宁地带的抗日义勇军部队尚有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李三侠等部队。这些部队对继续抗日的态度表现不一，有的坚决，有的游移。然而由于这些部队的数量仍然比较大，有数千人之多，还是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相比之下，此时，延边各县中韩工农游击队合共仅500人左右，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思想坚定，作战勇敢，却因数量较少，尚不足以担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力军的重任。

因此，中共东满特委和各县工农游击队便将争取并团结吉林救国军余部继续抗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东满特委于1933年3

<sup>①</sup> 《金日成将军在东北是怎样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人民日报》1950年7月19日。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月即以四县中韩游击队的名义发出《告反日士兵书》，号召他们与中韩游击队合作，继续抗日。兹摘录如下：

延吉、汪清、琿春、和龙中韩游击队与汪清反日别动队  
告反日士兵书

各反日部队的士兵弟兄们！

东满四县的中韩游击队，现在用同志的名义，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从去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出卖上海反日战争，同日本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共同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调动更多的强盗军队到东满来，特别在秋天以来，猛烈的向你们和我们进攻，走狗“满洲国”和日本强盗一起来进攻。你们的官长就在这个时期公开出卖你们，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把你们打得七零八落。

正在你们到处（遭）受失败的时期，我们赤色的中韩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到处很多的发展。我们本来都是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我们用群众团结的力量夺取了敌人的武装。我们和日本强盗和“满洲狗”、中韩地主自卫团、保卫队等作了无数次的战争，老是打胜仗。我们向中韩一切劳苦群众证明，只有中韩游击队是唯一的反日武力。为什么我们能够用很少的最坏的武装常常战胜飞机、大炮、机关枪的日本强盗军呢？我们并没有什么神仙妙术，只是因为我们是真正工农民众自己的武装。我们的队伍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我们不但靠着几支枪，我们后面还有广大劳苦群众的团结力量……我们和中韩民众在一起，保卫他们，帮助他们。……

弟兄们！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本来也不是孤立的，全中国的工农也是站在你们这边，苏联和各国的工农也都是你们

的朋友，在这点上你们和我们本来都是一样的。可是你们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你们是被那些司令和队长们出卖了。……他们明勾暗引的把日本走狗弄进你们队伍里，不和日本打仗，退却，逃跑，天天和日本讲投降条件，以至公开投降，送给日本强盗缴械、遣散与进攻〔行〕屠杀。同志们！这就是你们的弱点，这就是你们失败的原因呵！

亲爱的同志们！中韩游击队始终是你们的战友。我们站在弟兄的关系上不得不告诉你们应走的道路。你们最近的失败并不是最后的失败，更不是全满洲反日战争的失败。满洲工农兵的反日战争和反对一切中外剥削者的斗争必要得到最后胜利的！……同志们！你们应该振作革命精神，接受失败的教训，把投降和动摇的长官及一切国民党地主走狗驱逐出去。士兵自己公选长官，举代表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监督长官，和我们一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中韩游击队诚心诚意的和一切反日的士兵成立永远的革命联合，中韩游击队欢迎一切反日士兵加入我们的队伍！

（具衔从略）<sup>①</sup>

《告反日士兵书》中，虽然反映出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某些影响，把抗日义勇军的失败片面地归结为其长官的“投降和动摇”，对抗日义勇军的争取采取要兵不要官的政策，但是，它的主要精神还在于争取广大的抗日义勇军部队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共同抗日。

中共东满特委在延边地区正式建立工农反日游击队伊始，便采用了“中韩工农游击队”的名称，是根据延边地区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如前所述，这一地区的居民中有数量较大的自朝鲜移居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4集，第1—5页。





而来的朝鲜农民。同时，自1930年以后有相当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踊跃地参加了反日游击队，并且在各县的游击队中占绝大多数，最初几乎均占90%左右。而中国汉族、满族干部和战士在部队中尚居少数。中国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根据中朝人民联合抗击共同敌人的方针，便采用这一正确的名称，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好评。

关于采用工农游击队的名称，是为了与当地其他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相区别而使用的。这是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主张而下达的指示中提出来的。早在1931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周报第20期就发表署名伍豪（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的当前任务》，文中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救国义勇军。”1932年9月18日，满洲省委在《为加紧义勇军的工作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中，指示各级党组织必须“组织工人义勇军、农民义勇军、学生义勇军，要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工农义勇军，特别工人的模范义勇军，以加强工人阶级在义勇军的核心”。“同时这些在党独立领导下的义勇军，在反日军作战的地方必须参加到前线上去，与革命的反日军队在一起，团结与争取他们到革命的民众方面来。并且要利用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攻击敌人的后方，破坏敌人的交通，解除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sup>①</sup>。

东北各地中共党组织在各自组建抗日武装时，根据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考虑各地区的不同社会环境，所采用的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当时在磐石与柳河采用了“工农义勇军”的名

称，宁安、饶河、巴彦亦然。在汤原和珠河则采用“反日游击队”的名称。而延边各县则采用了“中韩工农游击队”的名称。总之，都是为了同其他抗日义勇军相区别，而采用的具有“赤色”意义的名称。

前述中韩工农游击队发表的《告反日士兵书》中，还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创建中韩工农游击队在延边地区的反日斗争中，同当地的吉林救国军部队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共东满特委和各县县委在延边开始创建反日武装时，主要是动员党、团员和工农先进分子，向日伪军警等反动势力夺取枪支、弹药，直接建立工农反日游击队。同时，也派遣了一些党、团员和工农骨干参加到救国军或山林队等抗日部队中去，开展兵运工作，一同抗日，并帮助其开展其他抗日工作。据历史文献记载，1932年，在吉林救国军“琿春王玉振部有党员74人，内有中国人64（人）”<sup>①</sup>，中共党员朱云光曾担任该部某团政治部主任。“在王德林部队中尚有党团同志一百数十人”<sup>②</sup>。此外，后来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的王德泰，此时曾被派到延吉县三道湾山林队“长江好”部，进行争取工作，使“延吉三道湾主要的土匪部队在党影响下”<sup>③</sup>。曾任汪清中韩工农游击队政委的金银植也被派去汪清的抗日义勇军“关队长”部工作过。后任和龙县中韩工农游击队政委的车龙德，也曾被派遣到和龙卧龙湖的反日武装中工作过。

但是，当时正值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时期，对于各阶层广大群众普遍要求抗日的现实还很不理解，对于东北以及关内的抗日义勇军及其领袖的抗日行动还存在疑虑与宗派主义情绪，因而也影响到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的组织，虽

①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1集，第114页。

①③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9集、第280—281页。

②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66集，第261页。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然一方面号召支持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并派出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参加义勇军部队，力图争取这些部队共同抗日，但对于许多义勇军的爱国将领却并不信任，当发现他们因战争失利而发生犹豫、动摇和退却时，便一律斥之为“逃跑”、“投敌”，从而使本来对共产党持半信半疑态度的义勇军将领，更增加了对共产党和工农义勇军、赤色游击队的疑虑。更有甚者，由于共产党在各地组建抗日武装工作中，一再强调建立红军式的工农义勇军和赤色游击队，急于组成正规师团，不加区别地收编抗日义勇军、收缴山林队武装，结果，使其他抗日武装部队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赤色游击队或者“敬而远之”，或者公然形成对立，时常发生磨擦。

1933年5月初，终于发生了山林队“同山好”杀害吉林救国军吴义成部别动队队长、汪清中韩工农游击队指挥员之一李光等人的事件。事情的原委是：李光为了同一切表示抗日的武装联合抗日，便和“同山好”山林队取得了联系。“同山好”是个反复无常的土匪，虽然口头上表示抗日，但由于面对吉林救国军在日军大举进攻下失利和日本加紧诱降的实际，又惧怕被李光别动队缴械，便要求李光前往远离汪清游击区的老黑山“同山好”部驻地，就有关联合作战问题举行谈判，准备阴谋杀害李光。李光一心急于联合山林队抗日，未听党组织的警告，便率别动队的一个小队去了老黑山。结果，“同山好”假惺惺地设宴招待李光一行之后，便残酷地将他们尽皆杀害了。历史记载如下：

5月初别动队崔先同志、李光和周子岐、王生北（中国人）同志们带领别动队一个小队到大甸子一带工作。走狗同山好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解除了该小队一部分的武装，李光、崔先同志、王生北同志等中韩同志9名都遭毒手，周子

岐同志及其他中韩同志们数名幸免于难。<sup>①</sup>

这一事件发生后，延边四县中韩工农游击队同一些山林队的关系又出现紧张状态。四县中韩工农游击队与救国军别动队马上发表告中韩民众书，揭露“同山好”山林队的罪行并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兹摘录如下：

别动队和汪清、延吉、珲春、和龙中韩工农游击队  
为走狗同山好进攻别动队事件告中韩民众书

……

日本帝国主义及中韩走狗反动地主们皆大欢喜，他们以为除了李光，别动队就会消灭了，他们以为这样东满的反日战争就停止了。

中韩两国的兵民们！他们想错了呵！李光不过是救国军司令部委派的队长，别动队不是李光的，别动队的事业是别动队队员全体的，是中韩两国民众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东满有更大更坚决的中韩工农游击队，有广大的各队反日兵。谁也消灭不了别动队！谁也阻止不了中韩联合的民族革命的反日战争！

日本和走狗同山好还想利用进攻别动队来挑拨中韩恶感，来分离中韩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来使山林队、救国军与别动队、中韩游击队互相反对。可是他们也想错了！

别动队和中韩工农游击队向群众宣告，中国与韩国的民族利益都是一致的，目的相同，道路一样。别动队、中韩游

<sup>①</sup> 《别动队和汪清、延吉、珲春、和龙中韩工农游击队为走狗同山好进攻别动队事件告中韩民众书》（1933年5月3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4集，第11页。





击队和救国军、山林队各队的反日弟兄们，不但不互相反对，将从此更加联合一致，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韩走狗！别动队与游击队全体队员更加振作精神，号召各队反日弟兄和我们一齐坚决扩大反日战争，奋勇杀敌，以回答日本和走狗同山好！

.....

（具銜略）5月31日<sup>①</sup>

### 3.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在汪清、宁安地区的抗日斗争

不久，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代表团到达汪清，向东满特委传达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使赤色游击队同其他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紧张关系才得以缓解和改善。

1932年末至1933年初，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相继失败。但是，这些部队的余部却仍然散在各地或继续集结在边境各地坚持抗日，或成群结队转为绿林帮伙，其中不少人还能坚持抗日立场未与日伪合流。至于主张抗日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民众武装更是到处可见。这些队伍分散各地，缺乏统一组织与正确领导，因而不能很有效地发挥抗日作用。

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的一些地区的工农反日义勇军和工农游击队，由于建立不久、力量薄弱和活动范围等的局限，影响也还不大，尚未成为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和武装斗争的主力与中心。

东北各地的抗日斗争现状，要求中国共产党纠正尚存在于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制定出正确的方针与策略，以便团结全东北各阶级、各民族抗日群众和各种抗日武装力

量，担负起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这一新的伟大历史任务。

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共产国际召开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虽然错误地强调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熟”，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发展和加强苏维埃运动，但同时，针对中国的东北业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事实，共产国际为“保卫苏联”，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东北地区的任务应与关内有所区别，在东北地区应采用“开展游击战争”，“没收汉奸的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口号。<sup>①</sup>实际上，这是在东北这一被日本侵占的“特殊环境”里，放弃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不久，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主持下召集专门会议，讨论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下，东北人民、反日游击队的抗日任务和所应采取的策略方针问题。此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相继分别形成了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地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等文件。这两个文件后来都为中共中央所承认。其中，一一七宣言向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著名口号，主张国内各个军队联合抗日的方针。一二六指示信，是局限于中国东北这一业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的独特环境的指示，其中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东北地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两个文件对于中国的抗日斗争的开展，特别是对于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东北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历史意义。

信中首先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用全部的力量把满洲变为它垄断的殖民地”的时局基本特点，指出日本推行这一殖民制度，使得东北广大各阶层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恶化和普遍敌视日本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4集，第11—12页。

<sup>①</sup>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



侵略者的基本事实，即“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仇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从而提出中共以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作为主要任务，提出了共产党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而必须采取的总的策略方针，即信中所认为的：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党的总的策略方针，应是“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首次明确地为党提出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组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指示信还对于可能参加这一反日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各武装集团的复杂性及其行动趋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信中提出，中共在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民族叛徒的财产；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改善群众生活；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将最好游击队编为民族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反日会。从此，在东北地区放弃了土地革命、组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等主张。<sup>①</sup>

中共满洲省委在1933年4月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封指示信后，迅即召集省委扩大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接受这一指示信的决议，并报告中共中央。满洲省委认为：“在目前满洲反帝民族解放的运动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策略）”，“建立满洲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应与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联合军

指挥部或订立反日作战协定，共同进行抗日战争。

6月，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向东满特委传达了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并与特委书记董长荣首先在汪清召集该县县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后又分别向各县县委传达了这一方针。

自此以后，延边各地工农游击队注意改善和其他抗日部队的关系，联合对日伪军作战，打击了敌人，提高了中韩工农反日游击队在抗日部队中的威信。

9月6日，经中共东满特委组织，汪清和琿春两县中韩工农游击队各一连共100余人，同吉林救国军吴义成等部联合攻打东宁县城的战斗，即是其中著名的联合战斗。汪清和琿春两县中韩游击队由金日成和白全泰（琿春游击队中队政委）负责指挥参加战斗。下列历史资料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战斗的场面：

攻东宁——时在9月×日，是救国军总司令吴义成号召的，东满一带义勇军纷纷参加（小金山、三侠等），人数共有3000人。在东宁旁之大甸子集合时，大甸子党团区委均决定不应参加，党团省委代表团闻而马上派人去，指出大甸子党团区委的错误，并加以改组，决定参加，计共动员4小队参加（50余人），另组织了60余人的炸弹队（又名敢死队）。当要进攻时，吴义成动摇，主张守大甸子，相机进攻。我们及坚决的义勇军主张进攻东宁，结果决定进攻。但全数虽有3000（人），而分配担任主力者，乃我们的队伍及史团<sup>①</sup>，担任进攻敌人防守力最强的西炮台。日军驻城内者共有500（人），枪、炮、飞机俱全。但总指挥吴却委其最亲信最反动

<sup>①</sup> 《一二六指示信》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

<sup>①</sup> 史团，即吉林救国军史忠恒团。史忠恒团长是中共党员，部队内建有党支部和团小组。该团后扩编为救国军第十四旅，史忠恒任旅长。





之柴司令充任，本定夜晚8时即进攻，他延至翌日清晨才鸣炮进攻，给日军以充分准备机会。剧烈的战争经过一天，我们的游击队奋斗上前，我们的炸弹队跳过铁丝网，踏入水深及腰的战壕（以前王德林遗下，而现在日军用资防御的战壕）使其他军队踏我们炸弹队之肩渡过战壕（因为他们多见战壕水、泥深，不肯下去）。这样一连打了一天，终因吴及其他义勇军指挥者之动摇，没有结果，他们均纷纷退却，只留下我军及史团孤立死战。吴义成当战争开始时，远躲于后方，闻消息不好，马上坐车退百里……总指挥柴司令则率部退至后方……第二天我们的游击队与史团仍继续开战，日军的反攻亦更猛，机枪密射及发炮外，飞机也升起来了。有两个最英勇的队员跳出战壕向敌人炮台直扑，被机枪射死。史团士兵被激动也跳出一二十人前扑，被日军一排机枪扫倒很多。直奋战至12时，日军大多包围史团不得已而退，我们的游击队几乎已四面受围，终于混战数里冲出去。……这一战争后，赤色游击队在其他一切义勇军及民众中的威信与荣誉大大加强了。吴义成……又说：“将来我打败仗时，务必请游击队保护。”战役后……赤色游击队公开在（大）甸子设办事处，亦派代表来参加救国军的总司令部。<sup>①</sup>

后来，在东宁县城战斗统计表中表明，此次战斗结果，日军死150余人、伤70余人，伪警察死2人、伤3人；吉林救国军和中韩游击队方面战死51人、伤19人，损失步枪48支、手枪3支、手提式机枪1支等。

当然，汪清中韩游击队同吉林救国军等部队改善关系不可能

<sup>①</sup> 《团满洲省委关于反日游击运动的现状与团的工作情况报告》（1934年1月7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7集，第223—225页。

因共同参加一次战斗就能彻底解决，后来在遇到某些事件时还容易出现反复。

例如，在东宁城战斗后，吉林救国军吴义成等部和汪清、琿春中韩游击队在罗子沟共同召集追悼阵亡将士的大会上，就曾出现一幕险些再次发生使双方关系破裂的事件。事情的原委是，救国军总副司令王德林、孔宪荣等退出东北抗日战场，经苏联返回关内后，却受到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冷遇，他们只好找到与蒋介石存有矛盾的广东政府。广东政府表示支持并援助吉林救国军继续抗日斗争。王、孔等便将这一消息写信转告了吴义成，吴即在这次会议上赞扬了广东政府。当即引起琿春中韩游击队中队政委白全泰的不满，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才使东北大好山河沦入敌手，广东政府此时表示支持东北抗日斗争纯属欺骗。结果引起一场误会。历史记载如下：

在我们召集的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东宁战争归来），吴义成讲演欺骗士兵说，广东政府是反日政府。紧接着琿春游击队白同志（中国同志）揭破广东政府的面目，而吴义成恼羞成怒，下令枪决，但因其司令部副官等受游击队及党极大影响，不往外拉。此时11个反日部队长官保证后，寄押柴司令部。柴司令部有很多走狗，不放，吴义成下命令释放时，仍不放。此时千余名士兵（救国军及山林队）推大栓，站在道上辱骂，甚至有架出机关枪的，对游击队影响最好的连，整队都退出街道，驻扎四郊。大甸子小街，满城风雨，保护共产党及游击队，使柴司令不得不迅速释放出来。这是民族反帝统一战线的新现象。<sup>①</sup>

<sup>①</sup> 《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1933年10月2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0集，第37—38页。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双方仍然还不十分信任。中韩游击队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救国军首领指挥东宁战斗失败很不光彩，遇事迁怒于游击队。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韩游击队抗日坚决、作战勇敢、联合抗日心切，深受救国军和其他抗日部队官兵的敬仰，不允许抗日部队自相残杀和分裂，事件才得以解决。

9月16日，中共东满特委召开了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自6月满洲党、团省委代表团抵达延边以来，特委在贯彻中共中央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初步成绩。会议认为，“纠正了赤色游击队与别的部队间的险恶关系”，进一步肃清了关门主义，和其他抗日部队“成立了攻守同盟”。会议指出，东满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中韩游击队的数量；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的组织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会议最后选举出以童长荣为书记的新的一届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

1933年冬至1934年春，日本侵略军向延边抗日武装，特别向共产党领导的中韩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所谓第一期和第二期“讨伐”。延边各县中韩游击队联合救国军史忠恒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各县中韩游击队也在战斗中成长，至1934年春，合共已达到900余人，群众自卫武装（“洋炮队”）1000余人，业已成为延边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1934年3月下旬，中共东满特委在延吉县三道湾张芝营召开特委和各县游击队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决定统一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任命朱镇为师长，王德泰为政委。尔后陆续编成第一至第四团和独立团。其中第三团由汪清游击队扩建，团长赵震学，政委南昌一，参谋长金日成。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是根据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的决议统一改编的。目的是纠正关门主义，摆脱过去采取

“工农义勇军”、“工农游击队”等赤色游击队名称易于使人不理解而遭受的孤立处境，便于更广泛地争取、吸收抗日力量加入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中来，团结更广泛的各种抗日部队共同抗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建立后，为摆脱日伪军日益频繁“讨伐”的困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决定各团除留下部分部队坚持原有游击区的斗争外，其余分别向西、向北发展，打通与南满东边道、吉东绥宁等地区抗日部队的联络。计划独立师第一团向敦化、额穆发展，第二团和独立团向安图进军，第三团和第四团向东宁、宁安、穆稜方向开进，开辟新的游击区域。

同年4月，汪清中韩工农游击队奉命开始向汪清、宁安边界进军，并在行军中筹备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三团。5月7日，汪清游击队联合吉林救国军第十四旅史忠恒部队一部，在汪清境内将马贵林伪军壮丁团包围缴械，共获步枪33支，汪清游击队分到21支，此外还零星缴获一些枪和购得一些枪支，又陆续吸收了零散抗日士兵加入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即行扩编为6个连（中队）。5月30日，汪清游击队正式组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

之后，中共东满特委便酝酿联合周围吉林救国军史忠恒等部队和驻宁安东南山区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周保中部队，共同拔除驻守在汪清、东宁、宁安三县接合部汪清绥芬大甸子——罗子沟的一营伪军。目的是以此作为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扫除三县抗日游击区的障碍，并使这一行动为下一步再次攻打东宁做准备。6月23日，参加围攻的抗日武装部队如约而至，集结在罗子沟小镇周围。计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第四团（琿春游击队改编）和翻山越岭而来的绥宁反日同盟军部队（其中编入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前救国军柴世荣旅部队，原来就在汪清、东宁边界一带活动），





还有救国军史忠恒部、孔宪荣部、李三侠部等，共约 600 余名指战员。进攻部队由周保中、柴世荣、史忠恒、金日成等组成临时总指挥部。针对伪军吉林警备旅第七团第二营已龟缩镇内的情势，联合部队便实行包围迫其投降。但由于抗日武装大部集结延宕时日，伪军早已获得消息固守待援，拒不缴械，抗日武装随即发动进攻，前后经历 7 昼夜的战斗，仅攻下该镇一角，占领伪警察所。后因敌援军到来，各部便主动撤出战斗。下列历史资料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战斗的场面：

特委又计划汪清和琿春两县的人民革命军、史忠恒部队、周保中部队、柴团部队一些部队，（由）特委直接领导人民革命军各部队参加进攻崔雨大甸子街。占领了两夜一天，头一晚进攻，攻进去了。投降军恐怖，（表现）很大动摇。我军喊口号，叫把武装递出来，投降军（问）那的部队，我们（说）是孔司令队，投降军说别扯鸡巴旦，骂上了。北满的工农义务队勇敢作战和革命军差不多的勇敢，与革命军站在一起说，我们不是老孔的队，我们是人民革命军到了，快把枪拿出来，打日本吧。投降军说革命军来了我们随<sup>①</sup>。

正在要往外拿武装时，部队在后（面）打枪了，这就引起大的交涉了。后边敌人的救兵也来到了，飞机大炮机关枪。在退却时周保中同志负伤……柴司令所有一切兵士都散漫了。周保中同志带伤说，你们大家别把革命军丢下。说话这时史旅长下命令，把自己代〔带〕的队喊住了，离远打枪，把革命军接出来，把负伤者送走。又与敌人交战一天多，在山坡上平地上打的落花流水，敌人死伤很多，我军死区委一人。

<sup>①</sup> 意即投降。

在交战当中解除敌人公安局武装 13 支，退却后又计划抢掠去解除武装 5 支，都归与革命军了。这次进攻交战，人民革命军在农民方面，各部队方面，影响非常的高。周同志有枪 30 余支，没有子弹，（有）借给革命军的打算，特委在这时与周同志要求他领导的工农义务队来人民革命军（传）授经验来，周同志应承了。史旅，特委要求在汪清革命军内参加工作，史同志也应承了。各部队与〔向〕特委要求参谋领导他们的队伍，队伍没有干部，干部很少，没有规〔确〕定。特委、周同志与史同志各部计划发展很多游击战争。<sup>①</sup>

这次围攻罗子沟，虽未实现预定的目的，却给予日伪统治者以极大的震动，扩大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影响，特别是增进了两军之间的联系，为以后的联合作战奠定了基础。

同年 10 月，日伪军在延边发动了冬季“讨伐”。敌人为了实现其孤立和消灭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破坏中朝人民抗日联合战线的罪恶目的，广为散布“建立间岛韩人民族自治区”、“专打人民革命军，不打山林队”等口号，极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同时，加紧设置“集团部落”，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断绝人民革命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此时，由于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后一些“左”倾错误的影响，东满特委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和肃反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错误，给延边的抗日工作和独立师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恰好此时，由宁安发来了绥宁反日同盟军负责人周保中向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独立师邀请派部队前往支援的信件。原来 9 月，日伪军向分布在宁安境内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发动秋季“讨伐”，同盟军中

<sup>①</sup> 《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1934 年 7 月 25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0 集，第 160—162 页。





的柴旅、傅团还在延边未归，宁安游击队和工农义务队因连续发生事件尚未恢复元气，形势十分严峻。延边地区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即按过去的两军相互支援协议，派遣汪清第三团和琿春第四团各一部，在金日成率领下，前往宁安参加联合对敌作战。10月下旬，抵达宁安八道河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随即投入战斗。第二军独立师派遣队与反日同盟军部队采取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连续取得泡子沿战斗、岔沟伏击战等胜利。其中，第二军独立师派遣队和宁安游击队、义勇军张祥队在东京城附近猴石屯同伪靖安军的一次战斗，即毙伤敌军24名。但是，敌人欲乘绥宁反日同盟军之危不断增调兵力进行追击，反日同盟军和第二军独立师派遣队为保存有生力量以利再战，便采取各部分头突围的方针。金日成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团一部于1935年1月下旬南返汪清。金日成在宁安时，曾会见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和吉东特委书记吴平。吴平前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驻远东的重要干部。吴平向金日成详细地了解了延边地区近来出现的随意收缴山林队枪支、危害抗日统一战线和反“民生团”斗争中发生的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金日成如实反映的情况，为不久以后中共东满特委纠正这些错误做出了贡献。

1934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针对延边地区党组织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和反“民生团”斗争中存在的严重错误和出现的危险局面，除向东满特委和第二军独立师连续发出各种指示外，还派遣魏拯民等急赴延边工作，整顿党的领导机关，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1935年2月下旬和3月下旬，先后召开的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基本上扭转了上述错误。金日成这时已经担任了第二军第三团政治委员职务，在会议上，为纠正反“民生团”和处理同其他抗日武装关系中所发生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春，中共东满特委根据满洲省委批复的第二军独立师

今后的活动计划，决定1935年除坚持原有根据地斗争之外，再行创建绥芬大甸子、安图两个抗日根据地，部队分别继续向东宁、宁安、穆棱和桦甸、敦化东西两个方向活动。此时，独立师经过整顿、扩充后，已增至1200余人。中共东满特委和独立师根据满洲省委的要求，于5月30日发表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宣言。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由魏拯民兼任，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该军初设四个团和一个游击大队。其中第三团，由方振声任团长，金日成任政委。第四团，侯国忠任团长，王润成任政委。

6月，第二军由第三团第四、五连和第四团第一、二、三、五、六、七连以及青年义勇军共340余人组成东部部队，向绥宁地区活动，目的是同在该地区活动的也是刚成立不久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等取得联系，使延边抗日游击区和绥宁抗日游击区连接起来，共同发展。第二军东部部队由军参谋长刘汉兴、第三团政委金日成和第四团团长江国忠、政委王润成率领，自汪清向毗邻东宁县境运动，目标是老黑山。老黑山是由汪清通往东宁通道上的重要战略据点，敌人为阻断抗日武装的活动和粮源，在这里驻守伪靖安军一个连。经侦察得知伪军固守镇内工事易守难攻，这支伪军从未同人民革命军作过战，十分骄横。第二军部队便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予以伏击的方针诱歼敌军，选择老黑山西部的头道沟作为伏击战场。第二军部队即行派出一支小部队前往老黑山附近骚扰，伪靖安军得到这一消息后便倾巢出动进行追击。当敌人忘乎所以地闯进掩蔽在夹谷两侧山上的第二军伏击阵地时，金日成举枪将骑在马上的一名伪军连长击落马下，敌人顿时乱了营，第二军部队立即用交叉火力射向敌人，仅用30分钟即全歼敌军1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计有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3挺、长短枪70余支，还有军用物资一部分。之后，该部返回汪清大甸子，稍事休整，便于6月下旬经八人沟、西北岭、老爷岭到达宁安县境之





老青沟山东屯,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所率部队会合。此时,正值第五军主力分别向穆棱、南湖头一带伸张,宁安东南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军的部队很少。不久,敌人得知山东屯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便慌忙由伪军和伪警察组成一支骑兵突袭山东屯。当第二军部队得到敌情的报告后,便选择远离村庄的有利地形准备反击。伪军警弃马爬山接近第二军约200米时,突然遭受抗日武装轻重机枪的密集扫射,被打得溃不成军。敌军对于攻击失败并不甘心,再次集结进行第二次进攻。金日成立即指挥炮手用刚刚缴自老黑山伪军的迫击炮予以轰击。这是第二军远征部队第一次用炮火作战,结果敌人抛下许多死伤的伪军警逃走。从此,敌军中流传说,第二军部队得到苏联的援助,部队中还配备了迫击炮。

8月,第二、第五军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研究两军联合作战问题。当时第五军第二师部队已经远去穆棱开辟游击区,并联络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部队,该军第一师正预定向额穆、敦化挺进,以便向南联络第二军西部部队,再打通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联系。会议决定第二军东部队中的第三团第五连和第四团第三、第五连,由刘汉兴、侯国忠指挥,配合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转战于宁安境内,居中策应南、北两支远征部队的作战;由金日成指挥第二军第三团第四连、第四团第二连,与由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该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指挥的第五军西征派遣队一同向西南进军;由王润成带领第二军第四团第一、第六、第七连重返延边汪清、琿春,与留在当地的部队坚持老游击区的战斗。

第二、第五军西征部队首渡镜泊湖向额穆进发。9月16日,在靠山屯伏击伪军骑兵一部,毙伤敌连长以下10余名。10月3日,在青沟子与一小队日军发生遭遇战,予以全歼。11月5日,在额穆东北之老头沟口将突然来袭的“松井讨伐队”的一个小队全部歼灭。西部派遣队由于执行群众纪律好,颇受当地群众拥护,几

乎每天都有自动前来参军的抗日者,部队兵员日有增加。第二军参加西征的部队原来绝大多数由朝鲜族战士组成,此时却增加了许多汉族战士,其中第四团第二连战士中已是汉族各半。12月6日,西部派遣队决定:由第五军第一师第一、第三团和第二军的两连部队,在李荆璞、金日成指挥下更向西南方向伸张,前进至黄泥河、威虎岭以及敦化附近。12月7日,攻占官地之后,又伏击自通沟岗子来援之敌,歼敌很多。1936年1月7日,攻占黑石和沙河沿,9日又攻下额穆索。第二、第五军西部派遣队在额穆、敦化一带开辟了一大块新的游击区,与第二军在敦化、安图活动的部队遥相呼应。

#### 4.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六师和第二方面军的斗争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等,在宁安镜泊湖北湖头附近的第五军军部驻地举行特别会议,就今后两军继续协同作战和两军整编、干部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达成相应协议。

会上决定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组建军部,结束原来该军第一师师部与军部合一的局面。同时决定该军新建第二师。每师均辖3个团。其中新编第三团拟由该军收编的抗日义勇军组成的游击大队(辖6个中队)编成,该游击大队大队长为钱永林。会上确定由该军原第三团政委金日成转任游击大队政委,筹组改编工作。

此后不久,自1935年5月出国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第二军政委魏拯民,在返回途中,首经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部同该军军长周保中会面,得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等不久前到过第五军军部,以及第二、第五军特别会议所商定的一切。魏拯民对于第二军军队编制和干部安排十分



关心，曾考虑调金日成任该军第二师副师长兼汪清团团长。<sup>①</sup>之后，魏拯民在南湖头会合了正集结于此地的第二军部队，并同王德泰、李学忠、金日成等一行抵达安图县迷魂阵根据地，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并重新组建中共第二军委员会。其中关于军内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历史文献记载如下：

1936年3月8日，在《魏民生<sup>②</sup>、王德泰给工委及润成同志的信》中，通知说：

第二军内部，从军部到各团部正式组织军队内党委组织，政委兼任党委书记，军党委由9人组成（一军长、三（个）师长、一军政委、一军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委），军党委书记由魏同志<sup>③</sup>担任。<sup>④</sup>

关于军队的改编和扩编问题，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如下：

二军的名义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正式编制3个师。<sup>⑤</sup>

关于“编制3个师和改名称的原因”，魏拯民指出：

1. 为了更广泛运用统一战线，人民革命军的名称（已

不）适合统一战线，所以将人民革命军改称为抗日联军第二军，把许多小的反日山林队改编到我们的周围，集中军事上、政治上的领导，更进一步夺取反日军队党的领导权。

2. 为了军事上领导集中，同时使各部队在各区活动独立工作（目前一、二团已相距三四百里之远，将来出征（还）不定多远）。<sup>①</sup>

会议决定第二军扩编为3个师，是改变了过去拟扩编2个师的决定。这是预计将来抗日事业大发展，抗日游击区域拓广和第二军担负的既要坚持国内斗争，又必须开至中朝边境区域，以便于随时进出朝鲜发展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的特殊任务的需要而改变的。该军第一师由原延吉第一团和一部分山林队共同组成，下辖2个团。第二师由原汪清第三团和琿春第四团等编组而成，下辖2—3个团。

会议决定：

安图第二团和已收编的6个中队<sup>②</sup>正式编制第二军第三师。师长金义〔日〕成，政委曹亚范。第七团长刘连山<sup>③</sup>，政委洪范；第八团长钱永林，政委马德全<sup>④</sup>……<sup>⑤</sup>

迷魂阵会议时，原安图第二团部队和游击大队的六个中队部队均散在安图、抚松各地活动，第三师师长、军党委委员金日成

① 见《魏拯民给东满临时工作委员会及王润成的信》（1936年27日）。

② 魏民生，即魏拯民。

③ 即魏拯民。

④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6集，第49页。

⑤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6集，第47页。

① 《魏拯民、王德泰给工委及润成同志的信》（1936年3月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6集，第48—49页。

② 即前第二军游击大队，大队长钱永林。

③ 后由孙长祥任团长。

④ 马德全后改任新扩编的第三师第九团团长。

⑤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46集，第48页。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便带领原第三团的一支小部队和原第二团的少量留守部转战抚松。部队按中共东满特委指示，首先赴奶头山，解除了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对100余名指战员的错误监管，将其编入第三师。然后，部队进入抚松县境作战。4月，第三师突袭漫江，给驻守之敌以歼灭性打击。5月，第三师与来自西部的第一军第二师第八团部队会合，联合袭击了东岗屯伪军兵营，拔除了敌人的据点。此时，正在小汤河附近活动的第三师第七团同一支伪军骑兵发生激烈战斗，歼敌20余名。在此期间，还将抗日义勇军马德全部编为第九团，将徐魁武部编为第十团。随后，第三师部队又奇袭西岗屯伪军兵营，歼灭伪军40余名。6月初，第三师主力进入临江县境，并于6月6日，以该师一部化装成农民巧妙地夺取了西南岔敌人据点，歼敌18名。从此，第三师部队在金日成等指挥下，在汤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军事密营和开辟新游击区，准备坚持长期斗争。

7月上旬，魏拯民到达辽宁省东边道地区河里（今吉林省通化地区）与东北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等会师，并由他们主持召开中共南满、东满特委及东北抗联第一、第二军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集中地讨论了在东边道和延边地区活动的第一、第二军统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和两地区共产党组织统一建立中共南满省委等问题。这是由于东北抗日联军各军活动区域相对集中在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省东部，敌人的“讨伐”同样也在这些地区进行。为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协调各军的对敌作战行动，共产党组织和抗联部队需要适应形势变化建立地区性的领导机关。这时，延边地区基本上已为日本侵略者所占据，第二军主力部队已相继西移辽东各县活动，与第一军发生了密切联络，并相互配合作战。因此，为今后加强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为指挥在同一地区部队的协同作战，粉碎敌人更大规模的进攻，会议决定：（1）将东北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组

为第一路军，由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总、副司令，魏拯民兼任总政治部主任。（2）改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设立中共南满省委、东满省委的原有决定，统一建立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选举魏拯民为省委书记，杨靖宇等为委员。

同年春，东北各地共产党组织和抗日部队获得了已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东征的消息，并积极动员，厉兵秣马，准备以相应的行动策应红军东征。但是，同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的消息却未能及时获得。因此，中共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领导机关依然依照以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以第一、第二军各一部远出热河、绥远，配合关内红军东征的指示，决定第一军第一、第三师、第二军第一师相继西征，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二军第三师坚持东边道地区的斗争，牵制敌人，策应西征部队的行动。

根据河里会议的决定，魏拯民、王德泰等指挥第一军第二师曹国安部队和第二军部队，在通化、临江、濛江、抚松、长白等广大地区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斗，借以牵制敌人，策应第一军的西征。8月，第二军主力部队1500余人和其他抗日义勇军600余人集结于抚松县境，准备攻克抚松县城，予敌以重大打击，扩大东北抗日联军的影响。抚松县城是连结通化、临江、桦甸、濛江、安图的重要战略据点，障碍抗日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通道，驻有日军300余名、伪军一个营，还有一支伪警察队，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第二军经过周密准备后，于8月17日晨3时，以金日成指挥的第六师<sup>①</sup>为主力，联合九站、万顺等义勇军部队共1200余人，对抚松县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战斗一打响，第六

<sup>①</sup> 1936年7月河里会议决定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后，即将两军各师的序列加以改变，即第一军仍按第一、第二、第三师序列，第二军的第一师则改为第四师，第二师改为第五师，第三师改为第六师。





师迅速地攻占了城外的敌军东山炮台，消灭伪军一个班，占据了制高点。但由于万顺等部义勇军延误了预定的攻击时间，以致事先联络好的守卫城门伪军值班时间错过，内应发生变化，使攻城战转入持久化，一些联合攻城的义勇军部队发生动摇，甚至擅自退走。战斗进行了一昼夜仍然攻城无效。攻城指挥部及时决定主动撤出阵地。在撤退中，伏击了前来追击之敌，使其遭受重大伤亡。

随后，金日成、曹亚范指挥第二军第六师经临江进入长白县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同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其中较大的有大德水、小德水、半截沟、二道岗等战斗，予敌人以重大打击。长白县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为在长白县建立抗日根据地以便向朝鲜扩展游击战争，金日成从部队中抽出一批干部、战士从事群众工作，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祖国光复会，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和支援抗日部队。不久即在漫江、十九道沟、二十道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同年冬，第一军第二师奉命进入临江和长白作战，同金日成指挥的第二军第六师会合，并接连取得在长白十九道沟、十三道沟战斗的胜利。但是，12月21日发生于临江七道沟的一次同伪靖安军、治安队的作战中，战斗失利，第二师师长曹国安受重伤后牺牲。遗职不久由第二军第六师政委曹亚范接任。

1937年初，日军得悉第六师黑瞎子沟密营所在地后，即派日本守备队前往“讨伐”。时值第六师主力出征，仅有20余战士留守密营。留守人员发现敌情后，便迅即埋伏在密营附近。当日军占领密营正在得意忘形之际，第六师战士突然发起反击，用手榴弹消灭集结不备之敌，敌人懵头转向，死伤狼藉，余者逃跑。此后，敌人调集大批兵力进入长白县，妄图将第六师等部聚而歼之。第六师洞察敌人的阴谋后，果断地兵分两路，一部留下与敌军周旋坚持长白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一部跳出敌军包围去抚松打击敌

人，吸引敌军。

坚持在长白县境的第六师部队从2月14—20日先后在红山头 and 桃泉里战斗中歼灭敌军一部。26日，第六师又协同自南岗木场得胜回来的第四师（原第二军第一师）一部，在鲤明水山沟伏击两连伪军，一举歼敌100余名，缴机枪3挺、步枪130余支。之后，两支部队共度元宵节。

3月29日，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二军领导干部于抚松县杨木顶子密营举行会议，总结1936年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确定1937年部队活动方向，决定继续分兵游击。其中，第六师继续坚持长白山区游击根据地斗争。6月初，金日成指挥第六师部队跨越鸭绿江，进入朝鲜，以突然袭击战术，攻破普天堡，一举毙敌40人，伤其20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23支和大批军需物资。部队向该镇居民散发了大量传单，号召朝鲜人民群众抗日。这一攻占普天堡的战斗，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给予苦难中的朝鲜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战士返回祖国作战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第六师撤回长白县境后，日本驻朝鲜的第十九师团第七十四联队实行越界追击。6月30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第四、第六师共约500余人，在十三道沟间山峰利用有利地势伏击了这支侵略军，歼灭大量敌军，之后迅速转移。这一战斗，极大地提高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威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即以积极战斗的行动予以响应。其中，第二军第六师部队在金日成的指挥下，在长白、临江等县连续攻打八道沟、新房子等伪军据点。9月以后，该师大部分队伍转往抚松、濛江、辉南以至安图积极开展游击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示对关内抗战的支援。1938年初，第六师第八团在濛江县二道花园与日伪军一部发生激战。3月初第六师黄贞海部突袭安图汉窑沟敌兵营，俘敌百余人并缴枪百余支。3月25日和4月26日，该师第七、第八团先后两次





攻入临江六道沟，歼敌一部，缴获大量物资。6月下旬，该师一部攻克抚松县南岗伪军据点，歼敌80人。7—9月，该师各团分别在辉南、濛江县头道花园和大沙河连续获得许多胜利。10月，第六师第七、第八团在临江县二道沟又给予一支200余名的伪军以很大杀伤。

早在同年6月29日，因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率部投敌，东边道抗日局势突然恶化，第一路军主要负责人杨靖宇、魏拯民等在7月下旬于老岭召开紧急会议，改变原有部署，令第一路军各部自东边道南部向北部的桦甸、濛江、抚松一带转移。同时决定第一路军取消军、师建制，统编为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各方面军实行分区作战。

同年11月，杨靖宇、魏拯民率总司令部至濛江县南排子，同原第六师部队会合，正式将该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任命金日成成为指挥、吕伯歧为政治部主任，下设两个团和一警卫连，总兵力约350人。第二方面军组成后，金日成指挥部队冒长白山区的严寒，踏着没膝深雪，直趋临江和长白县境，开始分兵活动。金日成亲率第七团开赴长白县十三道沟等地开展游击战，第八团开往长白山深处马鞍山进行休整并准备来年春耕生产自给。第二方面军在此期间还广泛开展群众工作，领导当地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斗争。

1939年春，第二方面军连续袭击十三道沟和七道沟木材经营所后，又在长白县进行了丘家店、十五道沟和半截沟等战斗。接着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击朝鲜境内至茂山一带，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推动了朝鲜民族解放事业。5月下旬，部队跨过图们江返抵和龙县境作战。6月6日，金日成指挥第七、第八团在兀奇江（今红旗河）畔百里坪附近的沙金沟（闭门屯）伏击一支约200余人的伪军“讨伐队”，一举击毙日本指导官以下50余名，俘虏伪大队长以下大部士兵，缴获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取得重大胜利。不

久，该方面军转移至安图三道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该方面军在安图边作战、边休整之后，于11月下旬向敦化方向转移。12月17日，金日成指挥部队一举攻取六棵松伐木场，歼灭守敌山林警察队70余名，解放数百名工人，其中有100余名伐木工人自愿参加第二方面军。此次战斗，获得许多粮食和物资，补充了部队的给养。

1940年初，为加强对抗联新老战士的教育，该方面军在桦甸、抚松边界白水滩进行整训。2月下旬，经安图向和龙转移。沿途袭击了安图花砬子日本木材场。3月11日，又攻袭了和龙县日本木材采伐中心大马鹿沟山林警察队队部和警察所，歼敌100余名，获得大量粮食、服装等补充。3月25日，在该县兀奇江上游伏击前来进行报复的和龙县“特设部队”、“新选队”等200余名敌军，一举全歼日军“前田讨伐队”，击毙队长前田等100余名，俘虏30名，仅有3名敌军逃脱。缴获机枪6挺、步枪100余支。敌人慨叹此役“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该部迅即转移安图县境进行休整。此时，传来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濛江壮烈牺牲的噩耗。第一路军斗争的局势急剧恶化。6月下旬，金日成与魏拯民及所率部队在安图、敦化间的寒葱沟会师，决定继续分头战斗。7月2日，第二方面军一部袭击了敦化县哈尔巴岭火车站。8月10日，该方面军在金日成主持下于小哈尔巴岭举行会议，研究政治、军事形势和深入群众工作问题。之后，为避敌锋芒，转入长白山区休整。年末，该部分别相继向东宁一带转移，并与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一部取得联系。最后，第二方面军根据1940年春北满、吉东地区共产党组织和抗联领导干部会议有关保存实力、坚持持久抗战，以及同苏联方面达成的东北抗联部队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可以入苏休整的协议，陆续越境。1941年3月12日，所有入苏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部队正式编为东北抗联第一支队，进行整训。

与此同时，原在第二军第一团（即第四团）后编为第三方面军第十四团并任团长职务的崔贤和第十五团安吉、警卫旅的徐哲





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也一同入苏编入抗联第一支队。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支队的组成，可见如下历史文献：

第一路军〇〔入〕境部队混合改编为第一路军第一支队，先编成第一、第四两中队。指定金日成同志担任支队长、安吉为支队参谋长、崔贤为第二大队长。<sup>①</sup>

### 5. 抗联第一支队时期的斗争

1941年1月，金日成、徐哲、安吉作为南满代表出席了第二次伯力会议，同吉东、北满代表一起总结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确定今后共同抗日斗争的任务。

同年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已基本上集中在苏联境内乌苏里斯克（双城子）附近的东北抗联南野营中。部队在野营休整、训练的同时，仍然陆续派小部队返回东北战场，坚持进行坚韧不拔的抗日游击战争。

其中，最早返回东北战场的即是由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支队支队长金日成率领的由29人组成的小部队，向琿春、汪清、延吉、和龙、安图、桦甸、敦化等地活动，目的是寻找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和其他仍在这一带活动的抗联人员，恢复地下党组织和群众工作，侦察敌情。有关他们活动的历史记载如下：

4月9日，金日成率队出发，共计29名，闻彼顺利的前

进着。<sup>①</sup>

据《东北抗联B野营1941年、1942年被派遣各分队人名单》记载，第一分队，在1941年4月10日出发，11月12日返回南野营。组成人员有金日成、朴德山、柳三孙、董崇斌、金铁宇、林春秋、刘玉全、全文涉、徐宝仁、李伍松、李斗益、金益显、崔仁德、李焕仁、孙宗俊、金明俊、武良本、牟子河、李致浩、金洪洙、张兴龙、李正涉、金福禄、金庚勋、陈宝山、朱明增、池甲龙、宋魁信、连合东等29人，牺牲2人，失踪2人，逃跑2人，返回野营者共23人。

据金日成先期于8月28日返回南野营，并在9月30日写给周保中、金策的信中记述的这一小分队返回东北战场活动的经历，简要摘记如下：第一路军第一支队于4月9日自南野营出发，向汪清、琿春方向前进。因山区积雪较深，行军十分困难，日行仅10余华里，故在东宁与汪清、琿春边界老黑山、黑瞎子沟一带，滞留多日。5月3日始经绥芬大甸子南方太平沟、石头河子、小汪清到汪清、琿春边界大肚川附近夹皮沟、大荒沟一带。这支小部队在这里分头活动，因为前进方向将要冲过长图、图佳两铁路线和许多公路，绕过许多屯镇，又是长途行军恐有损失，携带无线电器材也不便长途行军，决定将指导员朴德山率同金铁宇等9名留在该地，负责图佳铁路线小城子至图们段以东的汪清、东宁之间地区的联络工作和群众工作，以及调查敌伪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各项情况。金日成继续率其余人员于5月12日由现地出发，

<sup>①</sup> 《周保中、金策给陈翰章、韩义〔仁〕和并转哈绥道南区第一路军负责同志的信》（1941年3月1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61集，第113页。

<sup>①</sup> 《季青给周保中的报告信》（1941年9月27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61集，第361页。季青原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五军政治委员。第五军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五支队时任该支队政委。该部一部同第一支队一起集结于东北抗联南野营。





横过图佳铁路经三岔口、大红崴、沙河掌、黄泥河子，再跨长图铁路，经过敦化二、三道河子、哈尔巴岭山脉，抵达安图与敦化边境的寒葱沟一带（即金日成与魏拯民1940年7月分手之地）。为广泛展开寻找、联络留在这一带的魏拯民的关系及其他部队的关系人员，金日成决定将现有20人再行分为三支小部队：第一队由第一、第二分队长董崇彬、武良本率领，向敦化县附化的二、三道河子、高丽帽子、榆树川、三四道荒沟、马号、六棵松等地寻找；第二队由第一中队长柳兰孙负责向桦甸东部富尔河、夹皮沟、老金厂、会全栈等第一路军总部后方基地一带进发；第三队由金日成自行率领在安图大甸子、大小沙河、和龙县北部、抚松东北部一带活动。但是费时两个月，遍寻无着，确切消息全无。仅从民众中得知魏拯民业已因病逝世，头颅被敌人割下拍成照片到处散发的传闻。也得知尚有些零散部队和人员在延边各地活动，或东去中苏边境等消息。同时，各队还协助恢复了一些地方的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团体，开展打击民族败类的斗争。尔后，金日成又令第一分队长等一部分队员继续向沙河掌、南湖头、大红崴、大小梨树沟、小城子、北蛤蟆塘一带寻找；金日成率一支部队向延吉、倒木沟、大小明月沟、四方台、大小百草沟、南蛤蟆塘一带去年7月魏拯民指挥警卫旅活动区寻找。然而又未获任何结果，各队遂于7月28日在汪清、珲春边境夹皮沟、大荒沟、大肚川与留在此地区的部队会合。然后经研究讨论决定：由指导员朴德山率一部队员向图们、石岘附近活动；由第一中队长柳兰孙率一部队员留置汪清车站附近活动，监视敌人动向；由金日成率领一部分队员向香水河子、大甸子北部老母猪河一带联络后来出发的安吉部队，以便通过其联络抗联第五支队，决定今后活动计划。但仍无结果，故在8月19日于大甸子南部集合全体人员自行研究决定今后行动。金日成为报告此行结果并听取抗联野营对今后工作的指示率同金铁宇等10人，于21日自大甸子南方20公里处出发，

28日晚返回双城子。其余人员暂时仍留在图们至汪清附近活动。这支小部队直至11月12日才由重行过界的金日成带回野营。

同年7月25日，鉴于由金日成率领于4月9日出发的小部队未有消息，抗联野营负责人周保中给南野营抗联第二路军第五支队柴世荣、季青写信，令速组一支由第一、第二路军人员共同参加的小部队出发中东铁路南部，要求“努力恢复和建立道南各地地下党的组织，建立新的群众组织，展开宁（安）牡（丹江）穆（棱）敦（化）额（穆）汪（清）延（吉）各地的游击活动，尽可能给予日寇侧后方以扰乱牵制，破坏敌人交通运输、通讯联络、桥梁隧道”，并命令要尽一切可能寻找魏拯民副司令和4月上旬出发的小部队。这支小部队由季青、陶净非率领的16人组成。其中有原第一路军第十四团团团长崔贤参加。这一小部队8月11日出发，24日到达汪清大甸子，依据老母猪河进行活动，但同金日成率领的小部队错过了联络的时机。9月1日，其中部分队员向宁安二、三道河子活动，11月2日，小部队同返野营。

1942年3月，东北抗联野营负责人周保中令南野营中的第一、第二路军队员编制7个分遣队和1个预备队，继续向吉东、延边以至哈东各老游击区派遣，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群众工作、侦察敌情。并指示：

在各分遣队出发终了以后，金日成同志应该担负B野营<sup>①</sup>游击队全部留守人员的军事领导和党的领导。<sup>②</sup>

① B野营，即东北抗日联军南野营，位于乌苏里斯克（双城子）附近。北野营亦称A野营，位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

② 《周保中给季青、柴世荣、金日成、安吉、崔贤、朴德山、郭池山的信》（1942年3月31日）。





1942年6月18日，在《金日成给周保中同志的信》中，具体记述了南野营方面延边地区派遣小部队的情况，大要如下：

陶净非等5人于3月20日出发，目的地为五常。任务是到五常与第二、第五军残留部队取得联络后，在当地尽一切可能开辟群众工作，并建立几处能够过冬以及将来游击队能作为依据的根据地。然后转向与季清、安吉等小部队取得联络，再行决定以后的方针。

季青带领11人于3月25日向宁安出发，并已有一次无线电联络，正活动于宁安、汪清之间。

崔贤带领10人于4月27日出发，向长图铁路敦化至延吉段两侧活动。已有数次无线电联络，并于5月16日来电，称业已突过图宁铁路向三道湾方向前进。

朴德山、郭池山率21人于5月13日出发，向桦甸、和龙开进，目的是抵达桦甸夹皮沟后，尽一切可能恢复旧有的群众关系，一方面寻找到通化、抚松、和龙方面的第一路军残留部队，予以收容一起活动，尽可能开辟至桦甸北部、吉林南部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南去和龙图们江岸，大胆地到朝鲜人的散在的“集团部落”里面进行工作。他们尽可能的设法在当地准备过冬。信中并说，这一小队行军途中在大甸子已有一次联络。安吉带领22人于5月29日向汪清出发。

后来在历史文件记载中说明：陶净非小部队9月5日返回野营，但陶净非等2人牺牲。季青小部队于11月9日最后返回野营。崔贤小部队于11月10日返抵野营。安吉小部队于11月5日返回，牺牲1人，失踪1人。朴德山小部队于10月28日返回野营后报告说：5月14日越境经大甸子、汪清，通过图佳铁路、长图铁路，6月24日到达延吉天宝山，翌日派郭池山等4人到桦甸夹

皮沟一带找过去部队的关系，并担负准备过冬的任务。7月3日，朴德山带领3名队员到中朝边境开山屯一带寻找过去的群众关系。其余人员林春秋、金成国、董崇斌等在天宝山一带，负责建立无线电联络。后来郭池山等在规定时期未返回天宝山约定地点，小部队在8月26日始向东行，9月10日到大甸子一带又停留一个多月时间仍无消息，遂率队返回野营。后来得知郭池山等2人牺牲。<sup>①</sup>

1942年8月1日，经苏联方面同意，所有过境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统一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亦称国际旅独立第八十八旅，对外番号是八四六一步兵特别旅。原东北抗日联军人员约700余人。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张寿钱，副参谋长崔石泉。该旅共设4个教导营，2个直属教导连，后又增设一自动枪教导营。其中，以原第一路军人员为基干组成的教导第一营，由金日成任营长，安吉任政治副营长。

9月13日，东北抗联教导旅正式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选举周保中、张寿钱、崔石泉、金日成、彭施鲁、王明贵、金策、王效明、安吉、季青、金京石等为执行委员，由崔石泉任书记，金日成任副书记。从此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

此后，东北抗联教导旅的主要任务，除陆续向东北战场派遣小部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外，即是集结进行军事训练、政治和文化学习，待机重返东北战场。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后，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东北抗联教导旅为配合苏军打回东北消灭日本侵略军，积极进行了紧张训练和各项准备。7月末，为适应今后形势的发展，

<sup>①</sup> 《朴德山给周保中的报告》（1942年12月2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65集，第39—41页。





决定中共东北党委会进行改选，新选出周保中、冯仲云、张寿篈等为执行委员，周保中任书记。朝鲜共产主义者单独组建朝鲜工作团，准备返回朝鲜祖国作战。

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东北抗联部队返回东北战场。以金日成为首的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部队亦直接返回自己的祖国朝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即战败投降。

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抗日战士在长期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斗争中，用鲜血凝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金日成在两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两国抗日战争胜利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又揭开了新的篇章。

## （二）崔石泉参与或率领抗日武装在虎饶地区的斗争

### 1. 饶河反日游击队时期的斗争

饶河县原属旧吉林省管辖，位于东北部边陲。南邻虎林县，西接宝清、富锦县，北靠同江、抚远县，东至乌苏里江与苏联（今俄罗斯）隔江相望。居民包括汉、赫哲、朝鲜、满、蒙古等民族，属民族杂居县份。全县3万余人口中，朝鲜居民占7000人，其中大多为贫苦的自朝鲜移来的农民。早期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也在这一地区开展过活动。

如前所述，1930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派金志刚等前往松花江下游各县，在前朝共党人和其他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开展工作，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同在满朝共各派总局有关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的决定，宣传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加中国革命事业与继续从事朝鲜解放斗争的一致性及其重要意义。并且经过个别申请和审查等手续，相继在通河、依兰、宝清、饶河等地吸收了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相应地

在各地建立了党的组织。

金志刚，又名金石泉、崔石泉、崔庸健，朝鲜人。1900年6月21日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的一个贫农家庭。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殖民统治的事实，激发了青少年时期金志刚的爱国思想。在中学时代因参加和组织学生反日运动，曾被日本殖民警察逮捕入狱两年之久。1922年，为寻求救国的真理和正确的革命道路而流亡到中国，后于云南讲武堂毕业。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于黄埔军校，于1925年曾担任该校第5期第6区队长。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当时参加中共的少数朝鲜共产主义者之一。中国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2月他参加了广州起义。之后，被迫前来东北，并在北满参加了朝鲜共产党组织，曾担任设在阿城附近的朝共满洲总局的军事部长，长期在通河、勃利、汤原、宝清、饶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为在北满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并在松花江下游各县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做出重大贡献。

1931年初，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建立后，金志刚便留在饶河、宝清一带从事革命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饶河、虎林地处东北一隅，日本侵略军尚未侵占这里，民心虽然忐忑不安，社会秩序仍算平静。1932年1月，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第廿四旅旅长李杜宣布成立吉林自卫军，指挥哈尔滨保卫战，并下令各县原所属部队一律改编为自卫军或自卫团。当时任虎林县城附近独木河自卫团团总的高玉山，即被委为虎林县战时自卫团第九大队大队长。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自密山、佳木斯、富锦南北夹击退守宝清、饶河、虎林的吉林自卫军，李杜率军退往苏联，丁超等投敌。虎林失陷后，日本侵略者拼组伪政权，委任高玉山为县伪警察大队的中队长。但他并不甘心事敌，因孤掌难鸣，只好虚与委蛇，伺机抗日。不久，高部爱国青年乘伪警察大队外出镇压抗日活动之机，枪杀伪县署日





本参事官和警察队指导官。高玉山立即率队响应，占领县城并宣布起义抗日，组成国民救国军并接连收复饶河、抚远县城。一时之间，东北边城三县抗日旗帜高挂，人民热情欢迎。

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在九一八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抗日号召和满洲省委的指示，迅即带领所属饶河、虎林、宝清、抚远等地 120 名党员，积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反日工作，广泛发展反日会组织。其中，以共产党员李春阳和爱国青年李学福为首的饶河县反日会最为活跃。反日会组织遍及饶河镇、三义屯、爆马顶子、关门咀子、大岱河、新兴洞、大小别拉坑、小佳河等穷乡僻壤，并在义顺号、三人班举行过成百上千人规模的反日集会和示威游行。

1932 年夏，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便积极筹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武装抗日斗争。首先在宝清县小城子沟里开办了军政讲习所，由崔石泉（即金志刚）主持。学员 30 名，全部由各县共产党组织选送，经过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为各地建立抗日武装培养了骨干。同年秋，饶河中心县委迁到饶河，并决定着手创建反日游击队，令崔石泉、金文亨等 6 名共产党员用仅有的一支手枪组成了特务队。特务队为筹备枪支、扩大队伍，立即以饶河为中心，在虎林、抚远等地开展从民团、商团手中夺取枪支子弹的斗争。经过数月的努力，特务队竟发展到 40 余人。饶河中心县委于 1933 年 4 月 21 日在大叶子沟正式成立了饶河农工义勇军，任命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崔石泉为队长、金文亨为政治部主任。农工义勇军共编成 3 个小队。从此在饶河产生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5 月，饶河中心县委为了继续发展并提高农工义勇军的军事和政治的素质，在抗日活动较为活跃的三义屯，再次举办军事训练班，仍由崔石泉任训练班主任，由入党不久的李学福任班长、崔石锋为指导员。训练班共 70 余人，经两个月训练后，几乎全部参加了农工义勇军。

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早就注意沟通与国民救国军的联系，使高玉山同意与农工义勇军的合作，允许中共领导的反日会组织公开存在和发展；饶河中心县委还先后派出 20 余名党团员和反日会会员进入救国军中去开展工作。但农工义勇军在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同救国军的个别部队发生某些磨擦。例如在农工义勇军的活动区，抗日群众本已自动出款、捐粮、支援了农工义勇军，救国军部队仍然向这些农民募款征粮，从而发生某些磨擦。同时，由于农工义勇军指战员全部由朝鲜人组成，很难吸收汉族人入伍，并难以在汉族居住区活动。何况一些参加救国军的部队还欲图强行合并这只抗日武装。于是经过饶河中心县委的慎重考虑，最后决定：在保持政治上、军事上独立的条件下加入国民救国军。

后来，通过派人与高玉山部救国军第一旅王惠卿参谋长协商，于 1933 年下半年将饶河农工义勇军编为国民救国军第一旅特务营。由金文亨任营长，崔石泉任参谋长、朴振宇任政委。全营共约 100 余人。同时，经特务营的请求，救国军派出汉族青年许资善等人到特务营工作，获特务营的热情欢迎。以后，经过崔石泉等人的热心关怀、培养许资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部队的骨干。

8 月下旬，日伪重陷虎林，国民救国军退守独木河。1934 年 1 月 28 日，高玉山率救国军 1 000 余官兵再行进攻虎林县城。特务营全体官兵参加了攻城战斗，其中第三连并成为攻城的先头部队首先攻入城中。后来虎林城即将被攻克之时，敌援军赶到，战事突然逆转，救国军转胜为败，急退独木河。特务营第三连和救国军一部尚陷城中，最后除少数人突围外，几乎全部壮烈战死。其中特务营第三连即牺牲连长等 25 人，另特务营营长金文亨负重伤。

高玉山率部进攻虎林失利，救国军军心动摇，大部队匆忙过界入苏，后被转送新疆。此时，高部第一旅参谋长王惠卿转告特





务营、救国军残部中有的部队欲乘机加害特务营，并建议该营速离虎林与救国军脱离关系。时机紧迫，经崔石泉同朴振宇等当机立断，迅速撤离驻地独立行动，转移到日伪军尚未占据的饶河县大岱河一带重整队伍。

1934年2月3日，特务营共产党组织在大岱河召集会议。会议决定把特务营重新改编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部队当时60余人，编为两个中队。由崔石泉代理游击队队长，朴振宇任政治指导员。会议确定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打击日伪统治，开辟游击区。

不久，中共吉东局派人到饶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决议。饶河中心县委当即于2月下旬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总结过去工作，认为过去虽然对救国军进行联合工作，共同抗日，但仍然存在某些民族隔阂，对于救国军与保卫团的某些部队还有强行缴械的现象，结果使自己的处境比较孤立，说明必须加深对中央关于目前在东北地区所采取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继续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会议决定改组中心县委，加强领导；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各族人民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加紧对救国军残部和山林队进行工作，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加强反日游击队工作，积极筹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成立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2月15日，反日游击队为重创经常追击游击队的一支伪军，事先在十八垸地选好地形伏击敌人。当伪军200余人被诱到伏击地点后，游击队出其不意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射击，伪军当场被毙伤30余人，余者仓皇逃走。4月，反日游击队在在大叶子沟建立根据地，又向大叶子沟顽固不化的反动民团发起进攻获胜，并进驻该地。

5月，春耕前夕，密山的人民抗日革命军代理政治委员张文偕

受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派遣，辗转到达饶河中心县委和反日游击队驻地大叶子沟。张文偕根据吉东局的指示将饶河反日游击队领导机构重新进行了调整，宣布由张文偕担任游击队队长，崔石泉改任政治部主任，朴振宇任政治指导员，李学福任军需长。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90余人。此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周围的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更加靠拢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饶河地区抗日武装迅速发展。

为了消灭盘踞在小佳河爆马顶子和大别拉坑两地破坏抗日并残害群众的苑福堂、李喜山两股敌伪武装，6月3日，由崔石泉率领的游击队的一个中队，乘夜袭击了大别拉坑，击溃李喜山反动武装，缴枪10余支。同时由张文偕率领的另一中队游击队和其他抗日部队也一举击溃苑福堂反动武装，占领爆马顶子。

爆马顶子地势险要，易于防守，距饶河县城较远，周围敌军薄弱。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和反日游击队即决定以此地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心县委也由大叶子沟迁至此地。从此爆马顶子便成了包括十八垸子、大叶子沟方圆40公里的饶河中心抗日游击根据地。

这一时期，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为贯彻中心县委2月扩大会议有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在游击队内加强宣传与教育工作，使游击队员深入了解到国内各民族只有团结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共同获得解放，只有各个阶级、各种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获得国家独立等道理。从而，不但使游击队内部增加了各种民族成分，明显地改变了过去队内存在的单一朝鲜人的状况，而且使分散在饶河、虎林等地的大小抗日武装如“西久星”、“九龙”、“得胜”、“常山”、“振山”、“鲁司令”等部队也纷纷靠近游击队，与游击队建立了密切联合的关系。其中“得胜”、“常山”等几支队伍甚至自愿在游击队的领导下，对敌作战，要求改编为游击队。游击队为团结广





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7月中旬，在宝清县义顺号召集了饶河反日游击队与其他各抗日部队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与会者中有“姜尚平”、“访贤”、“九龙”、“得胜”等首领，代表300余名抗日武装人员。会议一致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救国；没收日伪走狗财产，战利品按部队人数分配；不许损害群众利益；有投敌行为者各部随时可予以缴械。会上，张文偕、崔石泉对迫切要求加入游击队者，根据各队的实际表现仅选择少数部队编入游击队基本队内，其余列为游击队收编队。从此形成了以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为中心的饶河地区反日统一战线。

会后，张文偕、崔石泉率领反日游击队和收编联合部队前往虎林县境开展游击战争。在部队欲进攻三人班时，因行动不慎被敌人发现目标，为敌军包围，部队陷入不利境地。经6小时战斗后，张文偕队长在掩护部队转移时不幸壮烈牺牲。游击队誓为队长报仇。第二天，在崔石泉指挥下，终于将三人班攻下，敌兵溃逃。然后，崔石泉指挥部队回师突袭雾林洞伪军，歼敌10余名，重返游击区。9月7日，游击队又夜袭小佳河伪军一个连和大排队一部获胜。通过这一时期的实战锻炼，游击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数量扩达200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饶河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与领导者。

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队长张文偕牺牲之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决定由李学福继任队长职务，崔石泉仍任政治部主任，密切协助新任队长指挥部队进行新的战斗。由于游击队经过紧张战斗后，决定进行休整和训练，崔石泉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使部队进一步提高了士气。

1934年11月，饶河敌军发动了冬季“大讨伐”，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以重新夺取爆马顶子为主要目标。饶河游击队正分兵守卫在爆马顶子、大叶子沟、十八垸地、大佳河等地，进行训练和深入群众工作，军力分散。因此，当得知敌军进攻后，李学福、崔

石泉虽然指挥70余名战士主动出击敌军，力图阻敌前进，但终因敌强我弱，爆马顶子根据地被敌军占领。然而，饶河反日游击队并未被暂时的战斗失利所吓倒，立即采取广泛开展游击战这一拿手好戏，各地各部游击队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到处袭击敌军，使敌军迅速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结果，敌军不但未实现消灭游击队的预期目的，自己反而受到歼灭性打击，除占据爆马顶子外，一无所获。敌人不甘心于失败，在1935年1月29日又从佳木斯等地调来800余名日军精锐的步骑兵，重新进攻游击区抗日武装。游击队在李学福、崔石泉指挥下，以逸待劳，迅速将部队埋伏到敌军必经之路中不利于敌人的地段。同时又令若干游击队员足蹬滑雪板这一有力工具，埋伏在积雪较深的险要地段，以便出奇制胜。然后派出少许部队诱敌深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游击队突然发起猛烈袭击，迫使敌人散开、后退，滑雪队员趁机勇猛冲杀，敌人顿时兵慌马乱。战斗持续一天，敌军死伤达100余人，只好狼狈逃窜。游击队乘胜于2月10日夜袭爆马顶子，全歼守敌60余人，重新收复了爆马顶子根据地。

至此，敌人的冬季“讨伐”便不得不暂时收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不但保住了根据地，而且数量增加到250余人，战斗力大大提高。饶河游击队反“讨伐”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群众和其他抗日部队的抗日斗志和胜利的信心，在饶河地区树立了一面胜利的旗帜。

1935年6月，游击队决定扩大游击区，将游击战争从山区推向山外，并由北部向南部虎林县境扩展，同时解决夏季服装和补充子弹。部队在虎林的腰营沟、兴隆沟、三人班等地，向包括伪军、伪警察在内的各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们敬仰或敬畏反日游击队的抗日战绩和威力，表示热情欢迎，自愿支援给养、子弹以至款项。游击队只对那些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侵略者、敢于顽抗的伪军才坚决予以打击。7月2日，游击队突然攻克虎林六区马鞍





山，将敢于顽抗的 21 名伪军解除武装。7 月中旬，反日游击队分兵两路，一路攻袭黑咀子，一路去乌苏里江畔虎头一带活动。进攻黑咀子的游击队联合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武洋”、“君子仁”、“马占”、“长兴”等部队共同行动，并在进军途中与一支 150 余人的日伪军发生遭遇战，抗日部队充分利用地形地物灵活机动射击敌军，激战竟日，日伪军死伤 13 名。最后，敌人在援兵接应下撤走。7 月下旬，部队重返饶河游击区。

## 2.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和第二师时期的抗日斗争

在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迅速成长。1935 年 5 月 11 日《中共吉东特委致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

饶河中心县委依据……他们的书面报告与口头报告，（饶河游击队）队伍约有×××<sup>①</sup>人，中韩人各占半数……作战力甚强，只是也曾犯了破坏统一战线之错误。吉东特委准备将第四军之一部到宝清与饶（河）队伍相汇合，并拟将饶河游击队编为第四军第□师第四团，或编为第四军之独立团。<sup>②</sup>

1935 年 8 月中旬，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全部集中在饶河大叶子沟。8 月 20 日，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在同一地点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接受吉东特委关于将饶河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的指示，将游击队进行了改编。历史文献记载如下：

游击队自去年大会到现在，发展了一倍的队员，获得敌人很多的枪械，增加了群众的信仰和拥护，与日满匪军作过

<sup>①</sup> 原文如此。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5 集，第 57 页。

几次战争，得到了不少的胜利，同时也遭几次小的失败……

大队今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大会根据上级机关的指示，特委李学福为团长，朴振宇为副团长，金石泉<sup>①</sup>为参谋长，崔荣华为书记长，玄求学为军需处长，李斗文为政治部主任……。<sup>②</sup>

大会还决定由中共吉东特委特派员吴福林任第四军第四团的党委书记。

该团下设四个连，另设一保安连。部队官兵共 250 余人。

不久，发表《饶河游击队为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告民众书》，宣布：饶河游击队“已经不是一个枪械简单，势力微小的队伍”，而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抗日武装。并且，从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之后，“更要加倍我们的精神，去夺取新的胜利”<sup>③</sup>。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建立后，按照中共吉东特委关于在乌苏里江左岸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并与第四军主力打通联络的指示，9 月 20 日，李学福、崔石泉等带领第四团主力部队 150 余人向抚远县境开进。沿途攻袭小南河、小西山等大排队获胜。途中得知驻团山子日军一部将乘船经乌苏里江、松花江去哈尔滨的消息，第四团当即决定直趋乌苏里江畔新兴洞截击敌人船只。但行动被敌人察觉，9 月 26 日，第四团在行军途中，突然遭到 100 余名敌军的袭击，接着伪军第三十五团 300 余人也加入战争，使第四团腹背受敌。后经全团官兵英勇奋战，并向伪军喊话：“中国

<sup>①</sup> 金石泉，即崔庸健。

<sup>②</sup> 《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第三次扩大委员会决议案》（1935 年 8 月 20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39 集，第 149、151 页。

<sup>③</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 45 集，第 231 页。





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专打日本鬼子”，一些伪军便只朝天开枪不向第四团射击，第四团即行乘机突围。结果，日军指挥官高木多作中尉以下12名日军被击毙，17人负伤，另有伪军死伤10余人。第四团在激烈的战斗中，副团长朴振宇和政治部主任李斗文等16人壮烈牺牲，另有10人负伤。经历这场恶战，第四团敢于同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日伪军作战，并给予日伪军以重大杀伤，这是饶河地区抗日战争史上的壮举，从而既鼓舞第四团和其他抗日部队的斗志和增强战胜日本侵略军的信心，又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的声威传到四方。新兴洞战斗后不久，即有50余名爱国群众参加第四团，不少抗日义勇军坚决要求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经李学福与崔石泉商定又接受邹其昌等武装入队，从而使第四团由原有的4个连扩大为7个连。11月7日，又在大别拉坑，将积极要求入队的“九省”、“庄稼人”部抗日武装收编为独立营，置于第四团的领导之下。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的迅速发展，引起日伪统治者的极大不安。11月21日，敌人纠集了来自佳木斯、富锦、同江和附近抚远、虎林、宝清，以及饶河本地的日伪军1500余名兵力，开始冬季“讨伐”。敌军集中目标在爆马顶子、大叶子沟一带抗日根据地，沿途穷凶极恶，大肆烧杀，妄图一举毁灭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为保存实力，待机破敌，第四团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新任政治部主任崔荣华带领第一、四两连北去抚远游击；一路由参谋长崔石泉率领第四团主力向南突围转战虎林；一路由团长李学福率领少量兵力采取飘忽不定，声东击西战术，同敌人兜圈子，伺机打击敌人。第四团欲图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牵制并调动敌军，迫使其退兵。结果大批敌军在游击区瞎闯两个多月，未发现第四团踪迹，反而被拖得疲惫不堪，不得不宣告结束“讨伐”。

1936年3月20日，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根据吉东特委以吉东

省委名义<sup>①</sup>指示，将饶河中心县委改为中共下江特委，下设饶河、虎林两个县委，由朴文彬任特委书记。25日，根据3月12日吉东特委用吉东省委名义给当时饶河中心县委和第四军第四团的信中将第四团改编为第四军第二师的指示，在关门咀子宣布将原第四团正式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任命在中共吉东特委训练归来的郑鲁岩为师长，李学福任副师长兼第四团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不久，将邹其昌部抗日部队改编为第五团。此时第二师下设两个团。

同年春，日伪在饶河、虎林地区加紧归屯并户，修筑“集团部落”，并动用大批兵力进行不间断“讨伐”，对业已拥有500余名兵力的第二师部队构成威胁。为此，第二师即按上级指示再次分兵三路活动：由崔石泉率150余名进军同江、富锦地区。该部抵达这一地区后，分别向群众和大排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继而组织二龙山伪警察队40余人实行哗变，使其中20余人加入人民革命军。6月15日，在同江头道林子与日伪军发生的一次遭遇战中，在崔石泉指挥下部队发动政治攻势，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道理瓦解伪军斗志，结果尽管敌强我弱，却能一举歼敌50余名。第二师部队的胜利战绩，鼓舞同江、富锦爱国群众踊跃参加人民革命军，在两个月的活动期间接受60余人入伍。由师长郑鲁岩率领一支部队前往虎林，在黑咀子、倒木河、大黄山等地共歼敌100余人。李学福虽带领少量部队坚持饶河游击区的斗争，却团结“九省”等许多抗日武装联合对敌作战，并将其扩编为第二师的第六、第七、第八团。同年初冬，游击同江、富锦和转战虎林的两支部队，相继返回饶河爆马顶子、大叶子沟抗日根据地，进

<sup>①</sup>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11月已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另行分设南满、吉东等省委。但吉东省委到1937年3月始行成立，在此以前中共吉东特委有时即用吉东省委名义发出文件。





行休整。

### 3. 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时期的斗争

经过半年多的反“讨伐”战斗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部队数量扩大，战斗力提高，业已成长为活跃于饶河、虎林、宝清、抚远、同江、富锦、绥滨等县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下江地区共产党组织也有相应的发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也已初具规模。

1936年10月26日，由中共下江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第四军第二师召集的各抗日部队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尽早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的决定。不久，第二师主力部队分别返回根据地，11月15日，在关门咀子附近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正式宣布成立。军长一职由刚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归来的第四军干部陈荣久担任，参谋长崔石泉。第七军编为3个师，第一师师长由陈荣久兼任，第二师师长李学福，第三师师长景乐亭。全军700余人。

东北抗联第七军成立不久，由于领导干部内部矛盾较多，影响了斗争的开展。1937年3月5日，军长陈荣久率第七军一部前往小南河天津班会见几支抗日部队首领时，被混入军内的奸细罗英事先勾结的大批伪军所包围，在部队突围时军长陈荣久不幸壮烈牺牲。不久，第七军为整顿内部，充实领导，在爆马顶子召开了全军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决定：由崔石泉担任中共第七军党委书记并代理军长职务。部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然后分别进行活动。

4月23日，崔石泉指挥第七军第一师和小南村红枪会武装，袭击了西林子伪警察署，歼敌20余名。从此第七军在饶虎地区开展了新的战斗。在此期间，为积极团结其他抗日义勇军共同战斗，成立了虎饶反日游击指挥部，协调各抗日部队的对敌作战。5月，崔石泉先后派出战士混入大顶子山佛寿宫一连伪军内部，协助伪

军内要求参加抗联的士兵，实行里应外合举行哗变。结果哗变成功，日人连长被击毙，共缴轻机枪2挺、步枪80余支和大批子弹。参加哗变的伪军士兵大部参加了第七军。与此同时，由李学福等率领的第一、第三师部队在同江、富锦同敌军作战中，也取得了许多胜利，并且在该地区也建立了联合反日指挥部，团结各抗日武装共同对敌作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联第七军为配合全国抗日战争，除了在部队所到之地积极向人民群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新的侵略罪行，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外，还动员全军积极筹备粮食、准备冬装，迎接日伪军的冬季“讨伐”。11月，崔石泉率主力部队600余人转战抚远，借以调动敌军，减轻敌人对饶河抗日游击区的压力。12月12日，第七军一部同第五军一部联合突袭七星河镇，歼敌伪军一连，缴枪200余支。敌人冬季对饶河第七军等抗日武装的“讨伐”未获任何结果，自行结束。崔石泉率部队又重返饶河山区根据地。至1937年底，第七军部队已达1500余人。

12月15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应中共下江特委的请求从宝清抵达饶河，从同年末至翌年1月5日，在十八垌地召开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会议通过认真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下江特委和第七军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改组了特委，整顿了军队。会议确定下江特委和第七军党委受中共吉东省委领导，指定由张文清、崔石泉等组成下江特委临时工委，选举崔石泉、李学福等为第七军党委委员，由崔石泉任书记。决定由李学福任第七军军长，在李学福患病期间由崔石泉代理军长，崔石泉还兼任参谋长。师级领导人也有所更动。从此，第七军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38年春，敌人在对松花江下游的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加紧进攻的同时，对处在中苏边境虎林、饶河地区的抗联第七军也以重兵进行“讨伐”，欲图压缩抗日游击区，消灭或挤走第七军。同时





在政治上对抗日部队实行分化瓦解，在经济上进行全面封锁，断绝粮食和军需补给来源，破坏第七军的一切生存条件。

为冲破敌人围歼抗联第七军于乌苏里江畔并卡死中苏边境的图谋，第七军根据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的指示，决定由崔石泉带领军部留在饶河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其余第一、第二师去同江、富锦游击；第三师移师宝清，联合第五军部队共同对敌作战，借以牵制、分散日伪军进攻饶河的兵力。3月，伪军第三十一、三十五团和由虎林调来的500名骑兵，进逼第七军后方基地小南河、十八垌地、关门咀子等地。代理军长崔石泉指挥军部直属部队采用游击战术，避开敌锋，巧妙地与敌周旋，伺机打击敌人。7月，再次指挥部队到佛寿宫突袭一支伪军，缴枪60余支，遂即用以武装起一个少年连。9月下旬，当第七军军部获悉有一名日本高级官员从抚远乘船前来饶河小佳河视察“集团部落”时，崔石泉立即率领军部直属部队赶到敌船必经之地饶力河下游西风咀子进行伏击。当敌人汽艇返航抚远时，立即遭到第七军的猛烈袭击，当场击毙伪军政部日野武雄少将等39名官兵。此次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发出“满洲国防将星殒落一个”的哀鸣。

在1938年的艰苦斗争中，抗联第七军也遭受相当损失，部队明显减员，活动日益困难。1939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下江三人团在虎林县老秃顶子召开第七军党的特委常委会，决定崔石泉任第七军党的特委书记兼军参谋长，由第三师师长景乐亭代理军长。为了生存并坚持斗争，抗联第七军除在邻县活动的部队外，曾用相当的部队在山区从事农业生产，借以补充给养。9月，敌人又调集日伪军3000余人对抗联第七军进行“讨伐”。为保存力量，第七军决定化整为零，在虎林、饶河毗邻山区游击。11月末，崔石泉等率第七军第一师部队迅速向抚远转移、战斗，曾先后在抚远县新屯和同江西砬子与日伪军进行重大战斗，共歼敌90名。但是，虎、饶抗日游击区几乎到处驻扎了敌军，抗联第七军陷入极端困

难境地，部队严重减员。

1940年1月，抗联第七军根据中共吉东省委指示，部队实施缩编，由原有15个团缩编为3个团，仍保留3个师的番号。崔石泉暂时代理军长。3月下旬，第一次伯力会议后，周保中返抵虎林小穆河北部与第七军部队会合。4月，宣布将抗联第七军改编为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并宣布将崔石泉调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参谋长。同年底，崔石泉随抗联第二路军总部转移到苏联伯力附近东北抗联野营工作，并参加了第二次伯力会议。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苏联远东正式组建完成。崔石泉被选举为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执行委员，并在接着举行的第一届执委会上被选为书记，负责教导旅的党务工作，保障教导旅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任务的完成。194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配合苏军解放中国在即，朝鲜共产主义者也要反攻朝鲜，原有中共东北党委会重新选举组成周保中为书记的新的一届东北党委员会。崔石泉因是前一届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反攻东北后还需要参加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和移交党的关系的活动，暂时未能随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部队一同反攻朝鲜。10月，崔石泉同周保中一起到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作了汇报，并将东北党委员会的全部关系、档案和党费等全部移交给东北局之后，由前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成员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主要负责人之一冯仲云派人，经安东（丹东）把他送回朝鲜。

崔石泉（崔庸健）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东北从事革命工作和抗日斗争长达17年之久，为中朝两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 (三) 金策参与或指导抗日武装在北满地区的斗争

#### 1. 参加中共前后的革命工作

金策，曾用名金洪启、金印、金印植、罗东贤。1902 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鹤上面棒杵村的一个中农家庭。父亲金智模是农民。后来举家移民吉林省延吉县平岗基成村。金策和长兄、三弟自幼务农。金策仅是利用冬季农闲时在基成村夜校断续读过书，平时靠自学增长知识。目睹祖国沦丧和移居中国东北后朝鲜农民继续遭受日本殖民主义者、中国军阀的压迫，金策在青年时代便萌发了爱国意识，到处寻求进步书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抽空阅读，逐渐提高理性认识，并参加反日活动。1925 年延吉县龙井成立朝鲜“东满青年总同盟”时，即行加入该青年同盟及其活动。1926 年 5 月，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正式成立，10 月，朝共满洲总局东满区域局在龙井附近的勇智乡三里村建立，并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金策是在居住地基成村经李周和介绍加入朝鲜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7 年，该村朝共党支部书记金万兴分配金策主持革命互济会工作。由于工作中积极肯干，同年 9 月，金策被朝共满洲总局直接选拔为朝共满洲总局北满区域局执行委员，并预定担任组织部长职务。但金策在龙井准备去北满区域局所在地——宁安工作时，不幸被龙井日本领事馆警察所逮捕，同时被捕者共有 40 余人。金策等人经日本警察拷打审问后迅即被押送朝鲜汉城西大门监狱关押 3 年。1930 年 1 月，金策刑满出狱，返回延吉县平岗区基成村。当时，金策全家已北迁吉林省宁安县东京城居住，只好孤身一人生活。当时村民热情推选他担任该村小学教师工作。但不过半个月，金策和其他村民同本村一朝鲜天道教团体发生冲突，并发展成相互械斗。在双方械斗中，金策等将对方一元姓教徒殴打，被控告于龙井中国地方政府法庭。金策随即被押在拘留所一个半月，最后被判罚金 120 元而出狱。该

天道教团体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进行掩饰、辩解的组织，早已引起朝鲜爱国村民的不满，才引发了这场械斗。因而金策被罚之款也由村民自愿捐助交出。

金策被释放不久，正值中国共产党延边特支联合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延边各地掀起“红五月”斗争。金策当然毫不例外地参与了这场激烈的斗争，但迅即遭到龙井日本警察的追究，他只好在革命同志的掩护下躲到宁安县东京城父母家中。此时，中共满洲省委及宁安县委领导宁安各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也欲图通过这场斗争考验每一个申请加入中共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这时，金策的长兄金城（金洪善）和三弟金重熙正在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并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金策也不甘落后，一起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并于 1930 年 7 月 27 日经中共宁安县委东京城支部书记崔洪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金策加入中共后，被分配担任中共东京城支部的组织干事工作。8 月，宁安县委决定将东京城支部扩大为东京城区委时，金策又被县委选任为中共东京城区委书记。10 月，中共宁安县委被中共北满特别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共宁安行动委员会时，金策在宁安县中共与共青团县委以及各区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共宁安县行动委员会书记。11 月中旬，又兼任宁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1 月 28 日，金策等 6 人又被宁安反动军队逮捕，被押送哈尔滨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拘留所，被拘留 8 个月，1931 年 8 月移送吉林监狱，未几又被移至奉天监狱被判刑 8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经过中共满洲省委的大力营救，于 11 月被释放出狱。不久，去哈尔滨找到中共北满特委兼哈尔滨市委，并于 1932 年 1 月被派到宾县任中共宾县特支书记工作，领导宾县城乡反日斗争。同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金策同另一同志亲自携带大量传单到宾县城里散发时，被反动大排队查出身上藏的一束传单而被捕，随即在该大排大队部经简单审问即刻决定枪决。但金策在被 20 余





名大排队押送刑场路经县城西门时，一驻军队长向押送人员了解案情后产生同情，该驻军队长即向押送人员说情，认为金策反对日本侵略无罪，是爱国行为，应予以释放。反动大排队内本有人同情抗日，又见是驻军队长说情，便将金策就地释放。金策又一次脱离了危险。

同年秋，经中共满洲省委派遣，金策去珠河中心县委报到，由中心县委派往蚂蚁河东任支部书记。蚂蚁河东是朝鲜居民稠密的地方，1928年初便有朝鲜共产党在这里活动。经过1930年“红五月”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吸收了几名朝鲜共产主义者入党，同年8月建立了珠河县的第一个党的支部。1932年9月建立的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机关也设在这里。1933年初，吉林自卫军和吉林救国军将领相继退入苏联，余部溃散，珠河一带一些小股山林队也在动荡之中。日伪军时常在此地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对共产党组织实行“大检举”<sup>①</sup>。5月，当日伪军警在蚂蚁河东进行突然“大检举”时，金策为免于被捕躲避了7天，事后，中心县委便以对敌人“恐惧错误”，撤销其党支部书记职务。6月，珠河中心县委改组，调金策到县委机关秘书处工作，专门刻写油印文件和传单。后来任中心县委秘书长工作。1934年5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张寿钱到珠河中心县委视察工作，认为金策有自由主义和“派争观念”，又撤销其中心县委秘书长工作。6月28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时，经珠河中心县委同意，金策被调到哈东支队第三大队任政治指导员工作。7月，又被调至哈东支队司令部任军需处长。

哈东支队编成后，下设3个总队，每个总队又分设3个大队，总兵力450余人，原有珠河反日游击队的9个中队180人为基本部队。军需处的任务是收集、分配和保存军队所必需的粮食、服

<sup>①</sup> 即突击大搜捕。

装、枪支、子弹等物资，以保障军队的行动。军需处筹集这些物资的办法和来源，主要是在游击队攻取敌人城镇时，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财产充作军费，或者在战场上缴获日伪军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进行补给。因此，哈东支队每次战斗、每次攻城略镇，金策都要指挥军需处人员打扫战场和收集资材。例如，同年9月，哈东支队在攻克珠河南部五常县重镇五常堡时，除缴获90余支枪外，还按政策仅没收一家敌伪开设的当铺和一家商号的财物，部队军需处即得到了一大批布匹、胶鞋和面粉等物资，其余秋毫无犯，颇得群众称颂。此次战后，哈东支队将布匹运回四道河子根据地，除发动群众为部队制做冬装外，又将其一部分分给当地农民群众，一部分送回三股流抗日根据地给儿童团、妇女会和地方工作人员做冬衣。其余的途径即是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内，通过共产党和农民委员会、反日会组织，动员和依靠广大农民捐献粮食和钱款，办法是由农民委员会、反日会代收反日特捐和地亩税。此外，哈东支队和农民委员会在三股流根据地开办了简易的兵工厂、被服厂和印刷厂、后方医院等，以补充军需。这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金策百般操劳，努力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 2.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抗联第三军时期的战斗

1934年10月，哈尔滨以东各县被日伪列为“第二期讨伐”重点区域，主要矛头对准中共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和以珠河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区。

哈东支队在赵尚志司令和张寿钱政委的领导下，针锋相对地制订了扫除敌人设在游击区附近的军事据点、军用农场，将抗日游击区扩展到方正县境的计划，以打退敌人的“讨伐”。

大批伪军约3000余名首先扑向中东铁路以南的抗日根据地，但哈东支队一部已及时转移。赵尚志指挥另一支部队直驱大青川，将日本稻田公司供日军食用的2000石稻子尽行焚毁，然后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北上宾县，再转延寿、方正边境，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使伪军尾追其后接连扑空，疲于奔命。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部队南返道南游击区的途中，在学田地突遭大批日伪军重重围攻。哈东支队在经过8小时奋战之后，终于冲出重围，并毙伤敌军120余名。敌人惊呼哈东支队此役“必有名将指挥”，只好草草结束这次冬季“讨伐”。

在此期间，中共满洲省委派遣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珠河代表省委领导哈东地区的抗日工作，并同珠河中心县委、哈东支队一起筹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在1935年1月28日上海抗战3周年纪念日，由冯仲云、赵尚志主持，在珠河县南部半截河，正式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组建第三军司令部，将部队暂编为第一师，由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任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师下设三个团，其中，第一团，团长刘海涛，政治部主任张寿钱；第二团，团长李熙山（后王惠同），政治部主任金策；第三团，团长张连科（后李泰、侯启刚）。部队划分区域活动：第一团在方正一带，第二团在中东铁路以北和宾县、延寿一带；第三团在道南至五常一带。赵尚志率司令部直属部队机动游击，指挥作战。

同年春节前夕，日伪军又以1000余名兵力进攻第三军，目标集中在道北第一、第二团活动区。为粉碎敌人的这一新的进攻，军长赵尚志率第三军一部自珠河南部绕经双城、阿城、宾县、延寿，直趋方正，横扫沿途敌军；第二团在金策指挥下，在亮珠河与伪军孙团激战，击毙其参谋长；第一团在延寿中和镇与敌伪军大战，一举击毙敌军数十名。第三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讨伐”，使周围抗日武装纷纷靠拢。经各方协商，3月初，组建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后来又分别成立了延方、路南、路北三个联合军指挥部，由各个抗日部队分区保卫抗日游击区。

此时，金策被调往第三军第一团任政治部主任。

3月下旬，日伪军又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发动了“春季大讨伐”，重点围攻第三军司令部和第一团。第三军司令部便率第一团部队和其他抗日部队自延寿、方正冲破伪军设在蚂蚁河东的防线，东向苇沙河远征，使敌军寻歼第三军主力的计划破产。

4月23日，金策随同第三军司令部和第一团部队，实行反戈一击，回师方正，并汇合其他抗日部队联合攻进方正县境内的大罗勒密，然后主动撤出，再返延寿休整。

5月下旬，日伪军又发动了“夏季讨伐”。第三军为调动敌军，开辟新的游击区，决定由司令部、第一团部队联合几支其他抗日部队东向牡丹江沿岸一带敌伪据点进攻。金策指挥第一团行动。部队东进途中，连克小罗勒密、半截街、新开道、老五团局所。5月23日，攻占苇河县楼山镇。然后翻越老爷岭到达三道河子满天星。这时，敌人乘虚而入，在珠河游击区疯狂推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政策，敌人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沿山一带几乎成了一片废墟。不久，第三军东征部队返回珠河，发现已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鉴于哈东各县游击区业已被敌人全部破坏，继续集中大部兵力于此已经不利，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与第三军司令部共同决定，只在旧游击区留置少量部队坚持斗争，第三军主力部队迅速向松花江北转移，去依兰、通河、汤原县境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为适应这一新的斗争需要，第三军进行了扩编，增编第四、第五、第六团。金策被调到第四团任政治部主任，团长为郝贵林。

随同第三军司令部远征的部队除第一团已在依兰、勃利地区外，还有第四、第五团参加。11月，第三军和第四军李延禄部以及其他抗日部队会师于勃利县青山里，并决定赵尚志率第五团和第四军等部队一起北跨松花江，协助汤原反日游击队改编为第六军。第四团由金策、郝贵林带领向勃利、密山、依兰、桦川毗连地带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并与第五军取得联络。1935年





冬、第三军各团扩编为师。第四团即扩编为第四师，全师3个团，由原来70余人发展至150余人。金策担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郝贵林任师长。1936年1月，第四师攻入七台河煤矿，使其停产，扫除了人民革命军在这一地区活动的障碍。5月，第三军第四师与第四军转战密山县境哈达河，采用里应外合手段俘虏伪军第二十六团团长和士兵一部，缴枪150余支，被俘伪军中有40余人自愿参加第四师抗日。不久，第四师又增编两个团，全师达600余人。6月，金策率领第四师和第四军一起向宝清远征。途中金策协助第四军在部队内部开展政治工作，使之稳定下来。7月下旬，金策等带领部队向饶河进军欲图打通与第四军第二师部队的联络，未果，返回富锦开展游击战斗。

第三军第四师在师政治部主任金策与师长郝贵林的紧密配合下，抓紧部队内部的政治教育工作，使部队政治热情饱满，纪律严明，同人民群众和友军的关系保持融洽，故有“第三军模范队”之称，从而保证了远离军司令部实行独立活动的任务的完成。

1936年8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下设10个师，共约6000余人，其中基本队1500余人。9月1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赵尚志、冯仲云、金策、郝贵林等被选为执委会委员，由冯仲云任常委和书记。此后，东北抗联第三军主力部队开始陆续西征海伦等地，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该军第四师在金策等率领下继续在富锦、宝清和勃利一带活动，声援西征部队的行动。1937年6月，师长郝贵林在勃利县保安屯的作战中英勇牺牲，由陆希田继任师长。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第四师继续活跃在密山、虎林边境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取得许多胜利。

此时，第三军内部因政治工作一度削弱而发生某些动荡，一些原有收编的部队出现叛逃事件。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为加强部队内的政治工作，将金策调离第三军第四师，返回省委另行分配工

作，派于保合去第四师负责政治工作。1937年10月，金策被北满临时省委任命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之职，以整顿并加强部队内部政治教育工作。11月，又担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

这一时期，正是北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始进入困难阶段。

从1937年冬季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它早已制定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将军事“讨伐”的重点从南满转向北满的伪三江省地区。因为，卢沟桥事变后，在这一地区集聚了东北抗日联军全部11个军中的8个军，即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各军。他们纵横驰骋在松花江下游、牡丹江下游和张广才岭以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以西、中东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形成了若干抗日游击区，建立了许多基地和密营。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驻在这一地区的伪军普遍动摇，其中一部先后反正投向抗日联军。日本侵略者哀叹“三江省已变成共党乐土”。敌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被严重削弱。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卢沟桥事变前夕，便决定在伪三江省开展“特别治安肃清工作”，并组织“特别治安维持会”进行统筹。还将在南满富有“讨伐”经验的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澂调至佳木斯任伪第四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组成以于琛澂为总司令、日本军官北部大佐为顾问、包括前敌总指挥朱榕等在内的“讨伐”军司令部，共动用了日军3个师团、伪靖安军4个团和伪兴安军一部共5万余兵力，从1937年冬季开始分区“讨伐”，历时达一年半之久，妄图围歼这一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各军部队。

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临时省委早已预料到敌人必将采取的这一图谋，原则上议定了应敌的方针。1937年6月28日，在汤旺河，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邀请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参加的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共同分析了敌人在松花江下游企图“聚歼”东北抗





联各军的险恶形势。在此前，北满和吉东方面便已了解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指令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已到达陕北并东征的抗日红军打通联络的内容。因此，这次会议制定了北满与吉东抗联部队的行动方针，即各军必须主动地分别脱离险区，转移到外线作战，向黑龙江省的嫩江平原、吉林省的五常、舒兰、榆树一带突击，以便相互声援并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聚歼”抗联部队于松花江下游的图谋破产，决不能将各军的大量部队集中于下江，给敌人造成便于“聚歼”的机会。不久，由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东北抗日战争出现迅速高涨的形势，加以各军认识上的不尽一致，这一方针才迟迟未能大规模执行，只是各派部队进行了某些试探。

1938年春，敌人对下江的大规模“讨伐”业已开始，局势迅速恶化。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经过整顿之后，总指挥部根据中共吉东省委的决定，下达“西征”命令，即以第四军、第五军主力部队向五常、舒兰一带的东北抗联第十军游击区突进，实行“旧区新活动”，以便牵制敌人对下江的“讨伐”，并相机打通与南满抗联第一路军以及已挺进河北方面八路军的联络。西征部队7月2日正式出发；8月下旬抵达预定地区五常，但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中迅速失败，部队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

同一时期，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由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北满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赵尚志前往苏联远东，企图通过苏联方向打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1938年1月下旬，张寿篈代表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协同抗联第六军军长戴鸿滨率领第三、第六军一部护送赵尚志过界入苏。之后，戴鸿滨所率部队因遭敌追击，也被迫越境入苏。出人意料，赵尚志、戴鸿滨却被苏联边防军予以监禁，一同过界的抗联部队500余人也被遣送新疆，使东北抗联北满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北满抗联各军，由于敌军的“讨伐”，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抗联第三军

已减员至900余人，第六军也仅余700人，第九军剩下不足500人，第十一军大量减员。为扭转这一危险局面，1938年6月初，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通河召集第八次常委会议。会议认为，为保存抗联部队实力，冲出敌人设在下江的包围圈，另行开辟新的游击区的行动已经刻不容缓。因此会议决定即刻组织西征。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各军除留部分部队在老区坚持斗争外，其他主力部队分批翻越小兴安岭向嫩江地区西征。

黑龙江省嫩江地区，位于大、小兴安岭之间嫩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敌伪统治较为薄弱，尚未大量修筑“集团部落”。九一八事变后，这里曾经是马占山等部抗日义勇军活跃的地方。抗联第三、第六军部队于1936年曾先后在这一地区的东部和北部进行过活动，并且第三军一部仍坚持在海伦、铁骊一带进行抗日游击斗争。这里的群众条件也比较好。

北满抗联各军立即进行了西征的准备工作，并分别集中到西征的出发地。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先后到第六军、第十一军进行动员。第三军则由金策负责将在下江地区的第三、第四、第十师各部加以动员、整顿。原来，金策虽然在1937年秋即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但并未能立即动身。因为，由于日伪军在下江地区发动的进攻，使远离第三、第六军军部的第三、第六军在下江的各师一时陷于群龙无首状态，不仅难以统一应付敌人的军事“讨伐”，而且也使人民感到军头太多，难以供应，负担太重。因此，经北满临时省委和第三军司令部同意，由金策组织东北抗联第三军下江游击司令部并担任该司令部的主任职务。金策在下江不但协调第三军第三、第四、第十师部队的行动，并且还要协调同一地区第六军各师的行动。12月8日，金策与第六军第一师师长马德山、政治部主任徐光海达成临时建立抗联第三、第六军模范师的协议，并向北满临时省委和第三、第六军军队发出请求批示的报告。1938年初，抗联第三军第三、第四师部队从依兰东部





向富锦、宝清、萝北一带转移时，在花马街基附近联合第六军第一、第二师、第十一军一部，击溃日军屯垦团富锦第四学兵连。3月17日，第三军第三、第四师在赵家屯与敌军发生的激战中，第四师师长陆希田在指挥部队突围时牺牲。从此该师分散游击。5月，该军第十师第三十八团从富锦梨树园子出发，途中在同伪军第二十六团发生的遭遇战中被击溃。第三军和其他各军在下江的部队处境每况愈下。

金策在得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关于欲组织部队西征的消息后，为动员下江各抗联部队西征，曾进行了许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当时，第三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曾给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下江游击司令部主任金策写信，表示对1938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悲观估计，认为“如果1938年没有大事变，东北游击运动可能有毁灭的危险”，因而提议部队应蹲山沟以保存实力。金策接到信后，强忍病痛立即给侯启刚复信。信中明确地指出侯启刚的悲观观点和消极的建议是错误的。认为1938年日伪的“讨伐”较之历年“当然更严重”，但是回顾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可以得知：“毫无疑问的日‘满’统治力量及军事布置，尤其‘讨伐’军的布置的不平衡”性，即日伪统治者对战略上重要地区、抗日武装积极活动的区域，当然要进行重点进攻，但同时必然还有其不实行重点“讨伐”的薄弱环节。“必须估计清楚，决不能东北、江南、江北任何地方都这样严重。最近根据可靠的消息，凡是中东铁路西（段）很多地方敌人松而不紧，如果我们不据这种条件下不去灵活行动，如果不拿布尔塞维克的高度的决心和意志去突开新局面，如果据你估计，只采用你所提出的敦〔蹲〕山里的方法的话，那就不但不能保存实力，而且有危险的”。金策坚信，根据国内国外革命力量与反革命的对比，依据共产党和抗日军队过去积累的丰富经验，依靠“中共中央策略路线”，抗日游击武装力量，一定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从而要求“第

三师今后立刻准备举师远征”。<sup>①</sup>

北满抗日联军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的西征，先后共约800人参加。统一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之下，由张寿篪、金策等具体负责进行。西征部队先后分3批出发。

第一批西征部队为第六军军部及该军第一、第二师各一部，以及第三军政治保安师、第九军第二师等。自6月出发，至11月抵达海伦。

第二批西征部队为第三军第三师、第六军第一师一部和第三师等部。这支部队的主要指挥人员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六军第三师师长王明贵等。这些部队在同年8月中旬，分别从富锦、宝清渡过松花江向萝北县境集中。9月6日出发，冒雨在沼泽地行军，极度困苦。进入汤原老游击区，在群众的热情支援下进展加速。途中在石场沟阻击并摆脱追敌。到汤旺河左岸时第三、第六军部队又分兵前进，以便缩小目标和易于解决给养。第三军部队在侯启刚率领下沿铁骊、庆城方向前进；金策、王明贵指挥第六军部队沿海伦、通北方向前进。两支部队穿过人迹罕见的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于10月上旬先后到达海伦白马石。

金策在率队抵达海伦后不久，给尚在松花江下游的第三军第四师师长陈云升等写的信中，对这次西征有所记述。他写道：

三、六军200余名，在1300余华里之长途雨季行军中，存在许多困难与复杂情况自然在所难免。渡江后，在到达绥滨之一、二、三区时，更是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此处为一颇为狭窄之三角地带，尤其是一个无山林的平原，而且要同追击、阻截的满军两个团及多数的国境日军、警察等不断地进行战斗。但是，我们以最高速度的急行军，才逐步脱离了

<sup>①</sup>《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51集，第447、448、449页。





如此严重险恶之境地)。由于先后曾数次断绝粮秣及雨天行军,故将士足部糜烂、生病、负伤者继续不断。在700余里满是荆棘的道路上行军的困难,实在是口笔都难以形容。但是,只要有共产党,就能突破一切难关。所以三、六军远征部队的所有军政指挥员和绝大多数战斗员们却未有任何动摇,而是坚定的继续前进。<sup>①</sup>

第三批西征部队,由张寿钱等率领第六军教导队和第十一军第一师部队,自12月7日至12月29日到达海伦与前头部队会合。张寿钱和他的战友们在1938年率领北满各抗联部队西征进军途中,谱写下著名的诗篇——《露营之歌》,即是对于这一重大西征行动的真实描绘。

北满抗联部队胜利地完成了西征的第一阶段的任务,保存了主力,使敌人“聚歼”抗联于下江的图谋落空,并且开辟嫩江地区新的抗日游击区,为广泛点燃这一地区的游击战火创造了条件。

第二批西征部队到达海伦后,10月15日,由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东北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主持召开了第一、二批西征部队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在黑龙江省嫩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同时,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确定由许亨植(李熙山)负责筹备组建“江省西北临时指挥部”,以加强对新开辟的抗日游击区抗联各军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会议还决定,为加强地方工作,派出干部去讷河、绥化、庆城、肇州等地开辟群众工作和地下秘密工作。会后,即抽调第三、第六军各一部共100余人组成“江省西北远征队”,继续向德都、嫩江一带挺进,开辟新区,以便为第二阶段的西征开拓道路。

<sup>①</sup> 《金策给第三军第四师师长陈云升等的信》(1939年1月5日),译自伪治安部警务司出版的《满洲党并抗联匪团关系文献集》第2分册,第1、2页。

### 3. 在中共北满省委时期的工作

到达小兴安岭西麓的北满抗联西征部队分编4个支队,分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会,会议对北满党组织和军队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1)改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为北满省委,选出金策等三人为常委,由金策任书记、张寿钱为组织部长、冯仲云为宣传部长;(2)为加强对第三、第六军的领导,决定由许亨植任第三军军长、张寿钱任第六军军长;(3)决定由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各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由张寿钱任总指挥、许亨植任总参谋长。

1939年5月,北满抗日联军总兵力共约1000人。它的游击战争方向:西北嫩江、西南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索伦山以及三肇地区,力图与八路军挺进冀、热的部队打通联系。

为筹建东北抗联第三路军,金策自中共北满省委所在地通北山区向铁骊进发,并被委托为第三路军的建立起草宣言和口号。

1939年6月初,前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张兰生始将省委的工作完全移交给新任北满省委书记金策。金策从这时起开始全面承担起省委的领导工作,并将省委机关设置在庆城山区。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游击战争年代,北满省委常委虽由3人组成,但其中张寿钱作为省委代表和第三路军总指挥,被派往龙北领导抗日联军的作战和地方工作;另一名常委冯仲云作为省委代表又被派赴下江游击区领导留在当地的部队的斗争,因此,北满省省长时期只能由金策一人负起全部工作重担。

金策开始工作,首先,力求打通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络,以便及时获得党的上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和指示。这是由于自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各地党的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各部同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关系突然中断。东北各地党的组织和抗联部队(包括北满地区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在





内)曾想尽一切办法,做出各种努力,去恢复与中央的联系,都未能如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长时期处于孤悬敌后、与关内战场隔绝的状态,处境万分艰难。因此,金策担任北满省委书记后即将打通与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联络的工作列为工作的首位。6月15日,由金策主持起草了《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系统地汇报了自1938年5月至1939年6月北满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工作和作战情况、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的现状,请求指示。这个报告是经由下江交通转送的。1940年3月13日,金策又以北满省委名义起草《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全面地汇报了第三路军及其对敌作战的现状、北满地区党的工作等。7月7日,金策又起草一封信,请苏联远东有关方面设法转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迫切地表达了打通与中共中央联系希望。为此,在1939年5月当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作为省委代表去下江工作时,他同意冯仲云寻求机会过境设法同苏联有关方面联系,请求协助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金策为整顿北满党的队伍,开始共产党员的登记工作和征收党费工作,以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同时,加强党内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使党员树立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抗日胜利的信心,坚决纠正不良作风,号召向党内存在的消极和悲观情绪进行斗争。

金策在主持北满省委工作期间,坚持提倡在主要领导干部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达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团结和步调的一致,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调和主义错误,继续克服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以便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的抗日任务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但是,对于中共北满省委错误地处理赵尚志党籍问题,金策是负有责任的。赵尚志是一位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赵尚志身为中共北满临时省执委会主席、北满抗联总司令、抗联第三军军长,

抗日立场坚定,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指挥有方,战功卓著,最后死于敌人的枪口下,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不愧为民族英雄。但是,在当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赵尚志身居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党内生活不正常,缺乏监督机制,加以其自身长期缺少自我批评,以致染上严重的军阀作风,在处理党内斗争和处理抗日军队之间的关系、军民关系等问题上,犯有极为严重的错误。中共临时省委在1940年1月28日举行的第十次常委会上决定永远开除赵尚志的党籍。这次会议是在金策主持下进行的。金策在对待过去北满临时省委处理赵尚志问题上,本来是持慎重态度的,认为在清理赵尚志在长期工作中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等重大问题时,赵尚志不在国内,不能当场申诉,是不正常的。对于北满省委后来继续批判赵尚志执行的路线问题时,始终以党内问题对待。对于1939年夏以后,赵尚志被苏联远东当局释放后以东北抗联总司令名义带队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行为,表示予以理解。但是,在北满省委听信一部分人关于赵尚志欲借“奸细”之名论罪,企图捕杀现北满省委常委和执委时,却未进行彻底核查,未能听取其本人的申诉,便同意将赵尚志永远清除出党,金策是有责任的。后来,经过赵尚志书面申诉和党内、军内一些重要负责人建议保留赵尚志的党籍,北满省委常委于1941年2月17日决定修正1940年1月28日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为开除赵尚志党籍。

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的条件下,中共中央组织部要求由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对赵尚志党籍问题进行调查并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之后,经过认真复查,中共黑龙江省委终于在1982年6月8日作出决定,认为赵尚志“不存在反对中央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问题,更不存在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问题”。认为赵尚志的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





献，直至献出生命。决定撤销1940年2月北满省委《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恢复名誉。

金策在主持北满省委工作期间，对于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开展嫩江地区游击战争，以及部队继续西征，打通与挺进热河、察哈尔的八路军的联系的工作，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并一再进行督促。金策在同年7月的一封信中指出：

热河方面游击战非常激烈，他都与关里战线有密切关系，说他之势波及到索伦山、老头山一带，继续向东征中。惋惜得很，西北远征被遭〔阻〕碍，因此，远征暂受到牵制，但我们以不摇不移的精神，为实现这个方向，而继续重整前进。<sup>①</sup>

这一西征第二阶段的目的，不久在冯仲云抵达苏联伯力后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表述得更为清楚。摘要如下：

嫩、讷的部队在经过一个相当时期，在地方群众工作有了相当的开展，队伍努力扩充人数之后，即继续向西北挺进，到达西兴安岭，即以兴安岭为出入之依据展开活动，继续向西挺进，以王爷庙之索伦山为未来之目标。以便迎接马占山游击师<sup>②</sup>及八路军东北挺进部队。

同时以最大努力在肇州、扎兰屯各处创造新游击队伍，以便配合和呼应。

① 《中共北满省委给冯仲云、高禹民的信》（1939年7月19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5集，第59页。

② 马占山退出东北经苏联辗转关里后，1937年8月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委任为东北挺进军司令，率所部在绥远抗战。

努力与上级取得联系，取得援助，与国内抗战取得联系，消灭东北与国内抗日运动之隔离性。<sup>①</sup>

当时，正值日本关东军挑起“诺门罕事件”，公然向蒙古和苏联进行新的一次武力试探。金策即以中共北满省委名义发表《告北满全党同志书》，为第三路军的继续西征赋予新的意义。指出：

现在我们在这样严重关头下，东北抗日的各党、各军及各抗日的团体，不仅响应国内抗战，也不仅响应挺进军出关抗日，而同时（还）必须响应外蒙古人民反日自卫战争。<sup>②</sup>

1939年9月，诺门罕战争以日本侵略军之失败而告结束，金策督促抗联第三路军继续执行西南远征行动却从未稍懈。同年冬，金策以北满省委名义给第三路军总指挥的信中指出：

你们将要执行的远征路程分成两段来实现。第一段，阴（历）来年一月以前越过嫩江，在江西及甘南一带必须一个时期迂回战，建立较（可）靠的游击战，开辟新区，组织新队，团结在我军周围，并组织地方群众反日团体，与江东游击区连成一片；第二段，来年五月前后又征进，向碾子山站沟里、李三店、景星县一带开辟新区，将该区为基础，逐渐前进到苏〔索〕伦山左右，这是东北游击运动战略上最有意义的区

① 《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1939年10月12日），《东北地区革命文件汇集》甲第25集，第143—145页。

② 《中共北满省委告北满全党同志书》（1939年8月1日），《东北地区革命文件汇集》甲第25集，第62页。



夸克扫描王

极速扫描，就是高效



域，并将该游击区和江西游击区亦连成一片而斗争。<sup>③</sup>

实际上，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自1940年春开始，在嫩江地区已有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即陆续派出部队分头向西南王爷庙和索伦山地区远征。

1940年初，抗联龙北部队即奉命派遣第二支队由龙北指挥部指挥冯治纲率队跨过嫩江，向西南深入莫尔达瓦、巴彦、阿荣等旗一带，打击日伪军。不久，抗联第三路军重新改编4个支队（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队）之后，坚持向西南远征。10月，由王明贵支队长率领的第三支队在参与攻陷克山之后，即行西渡嫩江，再跨中东铁路西段至景星、泰来和洮南一带，后因受阻北返。同年8月上旬，抗联第十二支队奉命自庆城地区出发远征三肇地区。该地区位于嫩江平原南部，西进可达洮南、索伦山。第十二支队在这一地区纵横驰骋，攻城略镇，曾攻克肇源县城，与正在由北向泰贲、洮南进攻的第三支队遥相呼应。后来在日伪军警重兵围攻之下，于1941年初始返回木兰县境蒙古山。1941年5月，第三支队又奉命西渡嫩江，在江西内蒙各县广泛游击，仅因敌军重兵防守中东铁路沿线而无法实现续行西南远征的目的，至1942年2月始返抵大兴安岭北麓。第三路军第九支队一部在参谋长郭铁坚指挥下，于1941年8月又横渡嫩江至阿荣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同正在内蒙大兴安岭山区活动的第三支队互为呼应，后因遭敌突袭，部队损失严重被迫东返。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各支队再接再厉继续向西南远征，欲同华北八路军挺进绥远、热河的部队打通联系的军事行动，终因强敌所阻未能实现。但是，这一行动却反映了长期孤悬敌后奋战的中

共党组织和抗联部队指战员欲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联系，配合全国抗战的强烈愿望，使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铁蹄之下的东北人民深受鼓舞。

金策在注重游击战争的同时，对日伪统治区的工作也十分关心。他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现在北满党整个任务中的中心一环是白区的工作。只有有健全的白区党的组织、有斗争力量的群众组织，才能顺利解决其他任务……这是北省屡次会议事日程上，每次成为中心悬案”。他指出：“1934、1935年三军惊人的发展，是得到珠河（党）组织的有力帮助的原因。1936、1937年六军惊人的发展，是得到下特<sup>①</sup>的有力帮助的缘故。当这个时候三、六军不仅数量上发展，而且政治方面（取得）极有意义的军事胜利。当这个时候，三、六军还有组织过著名满军哗变，扩大游击战争，这都是由于较比有的地方组织（予）以帮助的结果。”<sup>②</sup>其实早在北满抗联西征部队抵达小兴安岭西麓、即将开始嫩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之际，中共北满省委于1939年1月即成立省委嫩海地区代表团，由张寿钱负责。不久开始筹建中共讷河县委，负责领导嫩江、布西、克山、德都、讷河等县的工作。同年秋，北满省委又派刚从下江到来的原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专门负责龙北地方工作。龙南的地方工作由金策直接负责，从1940年初，组建龙江工委，先后派遣徐泽民、张文廉、高吉良等到肇州开辟工作，筹建肇州县委。

在敌伪统治区开展地方工作时，金策强调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认为既要严守秘密工作的纪律，防止敌人破坏，又必须根据不同的政治形势和各地的社会状况，“尽可能争取公开活动

<sup>③</sup> 《中共北满省委给张寿钱并转龙北全体同志的指示信》（1939年11月2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5集，第173页。

<sup>①</sup> 即中共下江特委。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5集，第174页。





与公开工作的机会”<sup>①</sup>。主张普遍建立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等公开、和半公开民众反日团体，争取各种主张或同情反日的团体、教会、红枪会，“根据他们旧的传统和习惯，根据他们的团结力和觉悟程度如何，来用不同的方法与方式联合他们，共同促进与组织北满反日的统一团体，以扩大反日统一战线，而争取最后的胜利”<sup>②</sup>。

至1939年秋，由于中共讷河县委大力开展地方工作的结果，在讷河、嫩江和克山等城乡都相继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还建立了一支拥有30余人枪的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这一群众武装。9月18日夜，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二支队在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取讷河县城，从此打开了嫩江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在金策的领导下，到1940年7月为止，经过中共龙江工委的积极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和救国会组织，使三肇地区工作有了相当的成绩。其中，肇州县内已有抗日救国分会4个，另有3个小组，会员45名。该县东部的金山奎救国会分会和大同镇分会，工作均十分活跃，包括教员、村长、村办事员，还有一些爱国的士绅，都秘密地参加了抗日救国会。肇州县城有救国会职员分会和街道分会。肇东县建立了一个救国会分会，会员12人。肇源县建立了两个救国会分会和一个小组，共有会员30人。该县东部八家子抗日救国会分会工作最好，会员多为贫苦农民，他们迫切要求“武装起来干”。中共龙江工委在肇州、肇原、肇东、安达、龙江等县还积极开展联合抗日山林队的工作，准备迎接抗联部队到达后配合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11月8日夜，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即是在联合当地义勇军一部100余名、并由城内抗日救国会会员出城接应、引导之下，乘敌人沉浸于“剿匪祝捷”狂欢酒

醉之际，突击肇源县城，取得重大胜利的。

1939年春至1940年秋，抗联第三路军各个支队在中共北满省委和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活跃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30余县、旗，攻城破镇，袭击伪警察所，拔除敌人据点，破袭“集团部落”，攻击日本开拓团，歼灭大量日伪军警，缴获大量武器、子弹，给日伪统治以有力的打击。金策在这些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国际局势一直动荡不安，特别是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除远离欧亚大陆的南北美洲外，世界各地都日益感受到侵略战争的威胁。苏联的欧洲与远东的边界随时都有遭受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侵犯的危险。

苏联远东当局援用1940年春与中国共产党吉东、北满组织和抗联部队的代表达成的协议，于9月末发出邀请信，请中国东北各地中共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代表再次赴伯力集会，并声称届时将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会议，解决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各种问题。久盼和中共中央重建联系的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联部队领导机关获得这一消息后，当然万分高兴，并迅速由吉东和北满方面分别派出周保中、崔石泉、柴世荣、王效明、季青和金策、张寿钱、冯仲云等前往与会。南满方面，此时因杨靖宇已牺牲，魏拯民正患重病，未能派出正式代表，而是从正在苏联的抗联南野营的第一路军中，另行邀请金日成、安吉、徐哲等参加会议。但是，会议因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仅是东北各地共产党组织和抗联部队代表们相互之间交流斗争经验，共同达成某些协议，便决定返回东北战场，继续战斗。

此时，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因需要继续等待中共中央代表的到来，未有立刻返回东北，而由北满省委常委张寿钱先行返回北满，领导抗联部队继续战斗。

<sup>①</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5集，第65页。

<sup>②</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5集，第66页。





1941年11月初，金策终于返抵绥棱、海伦地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嫩江地区斗争环境极度恶化。为保存实力，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六、第九、第十二等支队各一部，在张寿钱率领下越境至抗联北野营整训。

金策此时除担任北满省委书记职务外，又肩负起抗联第三路军总政治委员的重担。此时，北满嫩江地区的抗日群众组织大部已被敌人破坏，第三路军各支队主力先后去抗联野营整训，仅有第三支队正在大兴安岭北麓苦战，北满的抗日斗争形势已转入低潮。金策同北满省委执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等人，毫不气馁，立即重整旗鼓，积极工作，力图恢复抗日斗争的原有局面。1941年11月10日，金策以中共北满省委名义发表《告北满党员同志书》，号召全体党员深入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暴动，开展抗日局面。金策、许亨植四处收集、联络散在各地的抗联第三路军第九、第十二支队人员和相继由设在苏联的抗联北野营重返东北的小部队，重新整顿，坚持在铁骊、庆城、东兴、巴彦、木兰一带，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942年5月，抗联第十二支队由钮景芳率一支仅有5人的小部队，自铁骊前往木兰、东兴活动，22日夜袭东兴大肚川日本武装开拓团。9月11日，第六支队政治部主任朴吉松率一支30余人的小部队夜袭木兰县城西北的大贵屯警察分驻所。10月间，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召集在龙南地区活动的各部负责人会议，决定将几支小部队划分成三个区域分头活动：由抗联野营返回的于天放小部队到海伦、绥棱边界山区活动；由朴吉松率一支小部队至庆城、铁骊交界山区活动；由钮景芳、张瑞麟带一支小部队在巴彦、木兰、东兴一带活动。这些小部队除开展游击战外，还在分担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深厚的群众工作基础，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使抗联小部队得到民众的有力支持与掩护。

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中共北满省委于1941年11月7日拟定了《东北抗日救国会纲领草案》，要求会员必须“尽忠国家民族，驱逐日寇汉奸”；“拥护国共合作，收复一切失地”；“促进全国团结，积极参加抗战”；“努力抗日工作，实现民族解放”<sup>①</sup>。北满省委和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组织抗联部队指战员深入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进行抗日教育，团结各抗日阶层，建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开展群众性抗日斗争。早在同年10月25日，北满省委在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就已经着重指出了在此抗日斗争艰难时期群众工作异常重要性，认为：“过去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游击队上，而实际上把群众工作放在次要方面。但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精力（应）主要放在群众工作上。只有健全的群众组织的配合，才能有胜利的游击运动。”<sup>②</sup>从此，各小部队都积极进行了这一工作。实际上，这时第三路军的几支小部队业已成为武装工作队了。

不久，巴彦、木兰、东兴地区抗日救国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会员达600余人。张瑞麟等在凤山县城乡以三道河子韩把头炭窑为据点，深入群众，宣传救国主张，在这一带山区的炭窑工人中成立了最早的抗日救国会组织，至1942年6月又发展了许多救国会组织，会员约有100余人，打下了群众工作的良好基础。通过群众不但使部队及时掌握了敌人的动态，而且还筹集、购买了许多粮食，解决了抗联部队的需要。同年7月下旬，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到巴彦、木兰、东兴地区检查工作时，充分肯定了这里群众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8月3日，许亨植于继续巡视途中，在邵凌河河套突遭敌人“讨伐队”的袭击，不幸于激战中壮烈牺牲。这位著名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

①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7集，第195—200页。

②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27集，第33页。





朝人民共同的抗日事业。年末，朴吉松小部队也惨遭失败，朴吉松负伤被俘后被日军杀害。

1943年，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兼抗联三路军总政治委员金策带领小部队辗转龙南地区，在各处后方密营继续领导抗联小部队和民众的抗日斗争。1944年初，经东北抗联教导旅方面的再三命令和敦促，金策与张瑞麟等方带领一支20余人的队伍，长途跋涉，披荆斩棘，自凤山县穿过茫茫林海越境到达野营，参加休整和训练。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之后，金策随同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部队迅速返回祖国朝鲜，进行新的战斗。

金策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在中国东北从事革命工作和抗日斗争事业近20年，为中朝两国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书选题原列入东北师范大学1990年度科研规划。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经得到许多党史部门和学者的帮助与支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历史研究所、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牡丹江市史志办公室、中共宁安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学者韩俊光向我提供了所需资料。金字钟研究员阅读了本书部分书稿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书稿交出版社后，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周绍文先生认真审读了专题送审的该书稿，给予了客观评价，提出了宝贵的修订建议。于此，我要向所有支持、帮助本书写作、出版的单位和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引用的一些文献资料中，原文即有错、别、衍、漏之处。为了保持原文，为帮助读者了解引文的原意，著者在引文中凡认为明显错、别字之处均用〔〕中适当的字予以更正，凡衍、漏字均用（）中适当的字予以删除或补充。同时，对引文中难解之处，著者均以脚注予以说明。此外，书稿中引用的有些文献，原为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同志或者属前朝鲜共产党组织所起草，故与中文（汉语）的行文、用词和文法多有不同。还有部分引文是著者由日文或日译文转译的。请读者注意。

本书内容涉及中外历史问题很多，囿于著者学识，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鸿文

1995年12月

263

